

民主台灣



Lekki '86

39期

1986年8月15日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 出版



台灣民主運動

早已是多事之秋的台灣局勢，這幾個月來更是愈演愈烈，不僅在事件數量上不遜往日，在事件的內容與其顯示的意義上，也推陳出新。就發生在台灣內部的事件而言，至少有四類事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

第一類是有關台灣公害與環境的重大事件。蘇聯車諾比爾核電廠意外事件再度引起人們對台灣核電安全的顧慮。反對建設核四廠的要求激起民間廣大的回響。台中三晃農藥廠放毒為害附近居民，民間成立防止公害組織、自力自救。美國杜邦公司要到鹿港設立高污染二氧化鈦工廠引起鹿港居民、台灣大學生及台灣輿論的強烈反對。這三個事件只是近年來台灣無數公害事件的例子。它充份說明台灣的生態問題已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由於官方無心也無力去解決、民間自救行動已蔚為一個新的群眾運動。這股新起的群眾運動不僅向國民黨挑戰，也向黨外挑戰；不僅在政治層面上挑戰，也在經濟層面上挑戰，挑戰盲目追求高速成長的經濟政策。

第二類是學生爭取普選權事件。台灣最高學府台大的學生代表團體：「代聯會」長期實行間接選舉。這種為便於校方（或黨方）控制、藐視學生自治能力的選舉方式，實在是開民主的倒車。民主已成為台灣人民的普遍要求。台大學生也開始覺醒，他們起來爭取學生應有的學生權、他們要求「普選」。這個天經地義，最起碼最平常的要求竟然招致校方沉重的打擊。一位力主普選的政治系四年級學生李文忠終於在他畢業前夕被勒令退學了——當然是借用其他的藉口。李文忠的遭遇激起他身邊友好同學的抗議，他們在台大傳鐘下舉行絕食示威、舉行提早徵召入伍的告別示威，喚醒更多學生。

第三類是黨外運動的繼續發展。在五月十九日國府宣佈戒嚴日，全台黨外人士聚集台北龍山寺，進行和平示威。這個以綠色為標識的戒嚴遊行，未出龍山寺即被國民黨軍警人員重重圍堵封鎖，雙方僵持十多小時。黨外人士雖被包圍，却受到聞訊而來的民衆支持。台灣宣佈戒嚴已達三十多年，創下世界紀錄。廢除戒嚴，是台灣民主運動長期以來追求的目標。康寧祥領導的「首都公政會」也提出「憲政實施時間表」，訂出一九八七年為廢除戒嚴年。公政會各地方分會的紛紛成立，標示著黨外組織化的更進一步成長。黨禁的廢除也提到黨外奮鬥的日程表上了。

第四類事件乃屬國民黨上層人事的變動。蔣孝武外放新加坡反映了反對蔣家世代相傳的壓力沛然難拒，蔣經國不得不略作姿態。然而，最近又傳蔣緯國出任國安會秘書長，不無托孤之意。隨著蔣經國必然地將從權力中心消逝，各方力量正各自部署、準備逐鹿中心。

台灣形勢的急速變化，也引起海外各方力量的重視與相應的舉動。這期間，最引人注意的有：一、黃順興、張春男分別前往北京；二、許信良、謝聰敏、林水泉等人發起籌組台灣民主黨，準備於年底前成立並遷黨回台。

黃、張等人前往北京長住，與中共探討台灣與中國的統一問題，促使中共了解台灣人民

動的轉換點

的意願、改正中共錯誤的對台政策。此舉顯示台灣黨外人士開始有人重視與中共直接的對話。鑑於國民黨長期的反共、恐共政策，加上中共內政的不如人意以及對台政策的偏差，乃在台灣的反對運動中形成一股極力要與中共劃清界限的氣氛。黃、張二氏此行若能產生正面的成果，將能削弱這股不正常的氣氛，從而有利於打破國民黨長期壟斷海峽兩岸關係的局面，並有助於糾正中共長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反人民政策。反之，中共若僅表面上禮遇黃、張二氏，然對其反映的看法却僅泛泛地聊備一格，與衆多僕僕於北京道上親國民黨人士的建言等量齊觀，那麼黃、張二氏勇敢的創舉將被侏儒化，所謂「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將被證明只是一句空話。最近，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答覆美國訪客時一再強調要與國民黨談判以解決台灣問題。他對於台灣人民的力量不僅未予重視反而暗示其有台獨的成份而必須加以反對。這顯示中共與國民黨和談政策根深蒂固。目前，台灣內外關心人士都在密切注視中共如何因應黃、張二氏之行。

許信良等人宣佈將籌建台灣民主黨，預定在年底前成立並遷黨回台，這是近幾年來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中最轟動的事件；由於渠等所提五點綱領十分低調，任何支持台灣民主運動人士都不會反對，很快就得到相當廣泛的支持。許信良在海外幾年一直鼓吹暴力革命，如今改弦易張，從事合法民主運動，不能不說是巨大轉變；加以許信良是國府的通緝犯，回台命運難卜。要作如此巨大轉變，克服回台困難，顯然有其更重大的原因。這個重大原因，歸根究底地說，是台灣局勢在急劇轉變中，一個政治人物不能長期離開自己的土地。台灣近鄰菲律賓與南韓反對人士毅然衝破禁令回國，造成該國民主運動重大發展，都是很大的啓示。不論許信良等人建黨遷台之舉能否成功，對於台灣內部都已造成重大影響。黨外公政會地方分會的積極成立，國民黨中常委十二人小組研擬解除戒嚴，允許成立「忠誠反對黨」等等都不無受到民主黨建黨事件影響；在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近幾年膠着低潮的情況也有了轉機，投身回台將成風氣。

台灣內外重大事件層出不窮，一方面由於有關人民福祉權益的問題（公害污染、民主權利等）日益嚴重，另一方面由於形勢激化下各種社會力量動起來，有意識地或不知不覺地推動歷史滾動的車輪。許多關心台灣人士，依據各自的認識、身處的條件，從不同的角度參與推動這輛歷史的列車。他們或從事防制公害，或爭取民主權力、或組織反對黨、或向中共、美國遊說（黃、張及美國的FAPA）等等，不一而足，呈現了台灣人民對自己鄉土的關懷與使命感。

台灣問題不只是政權的轉移，而是涉及近兩千萬人民的福祉，存在著各種環境、社會以及政治、經濟問題。因此，台灣問題的解決，必須以人民的廣泛覺醒與參與，以社會力量的動員為前提，而以社會的改造為目標，幾個月來各種事件的發生力量開始在動起來。我們呼籲讀者們，支援會朋友們，認識這些事件背後呈現社會力量開始動起來的意義，積極支援或投身加入這場社會改造的事業中。

言論

- 1 台灣民主運動的轉換點……………本社
5 一九八六年夏令營簡報……………中報

保釣專輯

- 8 保釣十五年回顧……………王平
11 紀念保衛釣魚台運動十五周年——
民主台灣訪問當年參與保釣的留學生
——昨日、今日與明日……………本社
13 ——為紀念釣運而寫……………路林
16 ——訪陳光宇……………本社
19 ——訪夏沛然……………本社
21 ——訪張才……………本社

瞭解台灣 與 探討中國

- 27 台灣當前的重大危機與解決之道……………張春男
36 台灣社會不動員性之研究……………南方朔
47 我們能為台灣做什麼……………林景雲
66 回鄉見聞……………惠群
43 比較台灣與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王平

藝文

- 49 淺談龍應台「野火集」的文學效果……………沈鴻
50 看「人生」這部電影……………張益農
52 旁觀者……………周昀
53 法國「新小說」淺談……………沈鴻
55 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史民

思想

- 59 沙米·阿敏小傳及其重要著作(上)
——一位阿拉伯經濟學人的心路歷程……………戴三

編輯報告

總編輯： 陳杏村
編輯委員： 林孝信，陳忠雄，陳勁行，
黃樹民，熊建劬，嚴敬

繼去年江南案、十信案等一連串醜聞之後，台灣島內之危機更加深化、廣化與表面化。環境污染嚴重，公害猖獗，核能廠事故頻傳，杜邦陽謀輸入毒廠已引起了草根性的大反對。這一切反映了在虛浮的「經濟繁榮」後面在為子孫萬代幸福所繫之生態環境及人民健康上所付出之慘重代價。台灣社會必須要改造，而台灣內外各種問題的解決有賴於人民力量的壯大及台灣人民能真正當家作主。

黃順興、張春男兩位先後經美、日突破國民黨乖謬的「三不政策」之封鎖抵達北京。在此海峽兩岸「關係極不正常」下有其積極作用。誠如張春男先生所說，任何關心台灣前途的政治人物都不能將中國大陸的因素置之度外，他願盡力於改變中共錯誤之對台政策，我們對此致以敬意。黃順興、張春男兩位都是有一定群眾基礎及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且拭目以待口聲聲「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中共當局如何對待。「台灣當前的重大危機及解決之道」一文是根據張春男先生在今年三月十五日「台灣與世界」及「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在大紐約區合辦的演講會之錄音摘要整理而成。

七〇年代初期以愛國保土為緣由，風起雲湧於北美各校園的保衛釣魚台運動轉眼已過了十五個年頭，當年充滿理想主義情操的青年參與者，現該是中年人。十五年是一不長不短的歲月，正適合於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們組織了一些對當年參與保釣運動的留學生之訪問記，從本期開始將以文章、或訪問記的形式陸續刊出。我們的目的不在懷舊而更在展望將來，希望能引起更多的回響與共鳴。是否當年的「理想主義者」能有一「中年後之再出發」？

南方朔先生之台灣社會之政治不動員論，初稿在一九八五年「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在克里夫蘭之夏令營及在芝加哥第一屆台灣研究國際研討會上發表，是分析台灣內部政治、能量、態勢與動向的力作。現由作者再加潤飾整理交本刊發表；是對台灣內部政治動向關心者不可不讀之佳作。

在思想與理論方面，本期有二篇文章，其一為熊三先生繼上期介紹阿敏的主要理論著作「世界範圍之資本積累及中心與邊陲經濟發展模式說」後更進一步介紹該位埃及學者早年對西非洲的一些國家如象牙海岸、塞內加爾、加納、幾內亞、馬利、毛利塔里亞及北非馬格里布三國（摩納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所作的實證調查研究，為其後之理論巨著提供了實證基礎。

另外一篇史民的「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一文則指出，傳統「約俗會慧」以為如英、法等國隨著資產階級領導之革命成功，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確立後經濟發展往往與民主政治攜手並進的現象，在廿世紀後半才工業化的許多「邊陲資本主義」國家如南朝鮮、菲律賓等則並未發生。

有關「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今年七月初在新澤西州舉行的夏令營，因為「民主台灣」本期已大部編妥，（正在）打字付印中，無法做詳細的報導，僅摘錄一些海外報紙的報導，希望能為未能參加的朋友對今年夏令營的情景有一初步的了解。

保釣憶往·精神未泯

當年遭到投機份子播弄

學生運動不幸發生質變

今後仍將為中國人奉獻

中報 1986.7.8

【本報訊】經過十五年之後，參加「保衛釣魚台運動」的一些當年台灣留學生，四日在新澤西州聚會，回顧當年的盛況，並感歎由於當時一些投機份子的播弄，使得一場充滿理想主義的學生運動，發生質變，終至煙消雲散。

「保釣憶往」是「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夏令營一項別開生面的酒會。由「北京故事」電影導演王正方博士主持該晚會。幾十位曾參加釣運的台灣留學生和一些未參與釣運的年輕學生及來自中國大陸「台聯會」和「台灣研究所」的幾位成員參加了該晚會。

據於運人士說，當時的盛況是，不參加釣運的人需要作出解釋。他們認為張系國有關釣運的小說「昨日之怒」是一部對實情不了解的作品；是一部令當事者看了要發怒的作品。王正方說，有鑑於此，已有當年從事釣運的人，正在着手寫一部當年釣運的歷史。

王正方說，保衛釣魚台運動的興起是因國民黨對留學生群眾的估計太低促成的。運動的衰敗也是因中共對海外留學生

估計太低造成。

中國大陸「台聯會」副會長郭平坦說，當年中共對待保釣運動是因文革極左的錯誤影響。他說，「政協主席」鄧穎超於一九八四年已明言要肯定保釣運動，並主張對過去參加釣運的愛國人士表示關心與慰問。

會中有人指出，日前在台灣舉行的紀念活動者，竟就是當年在芝加哥專門替國民黨打小報告的學生特務，他憤嘆這是歷史的諷刺。

多位人士認為，釣運純粹是自發的，由釣運轉為統運之後，有些運動的領導人因和中國駐外代表交往頻仍，並盼望從中獲取好處，因而使運動發生質變，喪失理想主義的色彩。多位老保釣人士表示，歷經保釣之後，生活雖有得失，但從不後悔曾經參與過釣運。更有人認為釣運的理想主義精神並未在胸中泯滅，他們表示還要看以後卅年。他們認為參與釣運的一代，還有可能為大陸、台灣和香港的人民作出無私的奉獻。

【本報訊】作家江南的遺孀崔蓉芝五日在「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的夏令營上表示，從江南去世以來一年八個月台灣政局的發展，可以說江南的死為台灣的民主與人權帶來一些進步，她認為從這個意義上看，江南的血沒有白流，他死而重於泰山。

一支援會——在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舉行的夏令營上，特別邀請崔蓉芝專題報告「江南事件」的影響與意義及最新發展。崔蓉芝說，江南於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遭國府派竹聯幫的兇手刺殺後，一年八個月以來，台灣政局

已逐漸出現非家族化的情況。她說，國府的外交人員抱怨長年在外交上的努力，所積累的成果被江命事一件一次就揮霍完畢。她說，台灣政府為了改善形象，對島內人民追求的民主自由多了一些寬容。同時，在美華人亦因江南命案受到美國政府的漠視，而喚醒民權意識。

【本報休士頓記者沈梅報導】台大教授張國龍五日在美的場演說中指出：台灣是世界上最不適合興建核能電廠的地方。他呼籲海外的台灣同胞設法阻止核四廠的建立。

在德州聖馬可士舉行的一九八六年美南台灣人夏令會中，由北美台灣教授協會主辦了一場「核能問題」討論會。張國龍教授應邀擔任這場座談會的主講人，座談會吸引了滿場關心台灣核能問題的學者、專家及同鄉。應邀來美的台灣省議員余玲雅及謝三升亦參加了這場討論會。

張國龍指出，台灣位處地震頻繁的斷層地帶，沿海地區更有許多斷層，由於核電廠須大量的冷卻水，因此均瀕海而設，其風險可以想見。而且台灣亦地處颱風帶，極易因風災而造成水循環的困難，台灣在地理條件上不適宜建核電廠，其理甚明。

張國龍進一步指出，台灣為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二，一旦發生核子災難，疏散將極困難。他說，蘇聯這次的核子意外發生後，花了八天時間才把十八哩方圓內的九萬兩千居民撤離；在台灣，同樣的十八哩方圓內即有六百萬人口，萬一有了事故，豈不是要坐以待斃。

張春男指台灣在一國兩制統一情況下 如仍由國民黨統治台灣人民將難接受

【本報訊】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夏令營兩天政治討論會，由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加拿大、美國的人士探討中國和港台的民主前途，背景立場殊異的人士，在會上針對統獨、民主的問題，作廣泛而深入的意見交流。

【本報訊】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夏令營兩天政治討論會，由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加拿大、美國的人士探討中國和港台的民主前途，背景立場殊異的人士，在會上針對統獨、民主的問題，作廣泛而深入的意見交流。

天主教大學社會系主任李哲夫主持。出席座談會的主講員包括：一、來自台灣的黨外理論家陳忠信，他介紹了台灣黨外近十年來發展和分化的情況。二、馬嶺山，他是來自加拿大的台灣革命黨成員，他主講「從意識型態看台灣政治運動」。三、

張春男，他由北京受遠前來演講，他仍表示前往北京的目的是要影響中共改變目前側重國民黨的對台政策。他認為台灣在一國兩制的統一情況下，如果仍由國民黨統治，台灣人民將不能接受統一。四、郭平坦，他介紹中國大陸目前正迫切的施行民

主法治，在政治上發展民主，經濟上進行改革，他並說中國領導人普遍認為若沒有充份發揚民主，四個現代化將難以去。五、陳曉登，她目前任職紐約中報副總編輯，她在會上強調香港人對民主統一的積極態度。

一九八六年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夏令營簡報

【本報記者陳國坤訊】旅美台灣學者張國龍五日在新州羅吉斯大學「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夏令營的演講會上，指出台灣的核能廠充滿潛在的危機，若不及時檢討台灣的核能政策，則台灣人民的安全將備受威脅。

刻在波士頓進行研究工作的台大物理系教授張國龍，以多幅幻燈圖表，介紹台灣核能廠目前的運作情況。他說，國營的台灣電力公司，發電量的設施比台灣實際需電量多，增設核能廠實是台灣的一種浪費。

他認為，台灣是地窄人稠的地方，負擔不起任何核意外事件，且台灣缺乏訓練有素的核技術人員，在核能廠的操作上，經常出現缺失。他指出，台電核能廠曾有一年發電機緊急煞車五、六十次的記錄，而平常超過三次已是危險紀錄。

台灣幾座核能廠離大城市都最近，台電亦缺乏核意外的疏散計劃，且無疏散能力。他擔憂如果台灣發生類似蘇聯的核意外事件，則整個台灣將陷於癱瘓。

張國龍認為台灣已需要全面檢討核能政策的時候，他呼籲海外關心台灣的鄉親應敦促國府採取適當措施，防範意外事件於未然。

在美國紐約州賓漢頓大學攻讀社會學的台灣黨外社會運動家蘇慶榮，目前剛由台灣返回美國，她亦在會場透露台灣正在醞釀成立一反核組織，要求國府有關當局：一、立即永遠停止核四廠及其他擬建的核能廠。二、公佈核三廠事實真相。三、必須在短期內對核一、二、三廠重新進行安全評估。四、擬定核意外事件緊急疏散計劃。五、對民眾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核意外教育。六、妥善處理核廢料。

據悉，海外台灣同鄉及華人社團，將展開簽名，以響應這個請願運動。

主持這次演講會「發展與環境研究會」會長張明杰說，以人類目前的科技水平，核能工業絕對是未成熟的工業。台灣不宜大搞核能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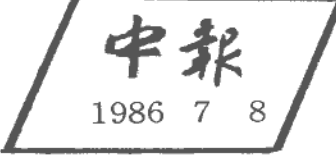
在台灣多年從事關心環境運動的黃立禾先生，亦在演講上展示多幅幻燈片，暴露台灣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情況。由於台灣環境保護的無政府狀態，已使有美麗島之稱的台灣，飽受污染之害，與會多位離鄉多年的海外台灣同鄉，面對那些幻燈片，唏噓不已。

【本報訊】為增進對台灣社會近況的了解，「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於四日至六日在新澤西州羅吉斯大學舉行夏令營，有一百多位來自中國大陸、台灣和美國、加拿大各地關心台灣問題的人士參加。

支援會第五屆夏令營，這次在三天的會期中，安排了九項緊湊的節目，包括：一、介紹台灣目前生態環境污染的狀況；二、台灣核能廠運作的現況；三、台灣勞工問題；四、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的最近動態；五、保釣運動回顧；六、經濟座談會；七、大陸與台灣文學討論會；八、婦女問題座談會；九、中國大陸、台灣與香港政治前途討論會。

除了緊湊的專題討論之外，大會還播放了最近在台灣轟動一時的社會事件的錄影帶，包括：一、台大學生李文忠為抗議政治迫害遭退學，在台大校園進行抗議的實況錄影；二、五一九綠色行動；三、三鬼農藥廠的公害事件。此外並放映十幾部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優秀電影，這些影片讓與會觀眾對目前台灣民眾要求民主的熱烈情況留下深刻的印象。

「支援會」會長林孝信在夏令營閉幕時致答辭說，台灣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在於台灣內部人民民主力量的增長，海外人士關心台灣表現不在於爭辯統獨問題的是非，而應是利用海外方便的資訊，深入研究台灣的具體問題。他呼籲與會人士在明年夏令營再見時，能帶着研究成果與眾人分享，並歡迎各種見解、立場不同的人參加。



國民黨不能拒台灣人於門外 謝聰敏許信良重申決心 台灣民主黨應紮根本土

【本報訊】「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主要成員之一的謝聰敏在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所辦的夏令營表示，若中國表現支持該會的心意，他亦表示歡迎。

在被詢及他們可能面對回台的困難時，謝聰敏說，該委員會的三位主要成員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皆持台灣護照，其中林水泉已是非法居留美國，只要自動向移民局報到即會被遣返返台。他和許信良皆以政治庇護的身份居留。而許信良是國府的通緝犯，通緝犯自動投案當局沒有拒收的理由，而謝聰敏將送許信良返台，他說：「我送一個通緝犯回去，國民黨不能抓我，我這還有獎金可拿。」

他說：「到目前為止，國民黨希望我們不要回去，但沒有正式公佈我們不能回去。」

半年前到中國大陸定居的前台灣黨外副代表張春男，四日亦前來美國應邀參加「支援會」的夏令營，他在會上充份肯定謝聰敏等人行動的決心，並表示現在正是還黨回台的時候。他並當場捐助一百美元。

當謝聰敏表示歡迎中國支持「民主黨」時，與會的中國大陸「台聯會」副會長郭平坦隨即起立發言說：「我們倒希望知道你們想和我們談什麼？有什麼具體要求？」

謝聰敏表示該會對中國的具體要求將留待黨員大會討論。但他說：「我們希望中國尊重人民的自由。」

美三大夏令營對台灣政治前途的共識

中報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一日

陳國坤



全美三千餘名關心台灣社會和民主政治發展的人士，於七月下旬美國國慶週末，分別在美東康乃爾大學、羅吉斯大學和德州聖馬可士舉辦夏令營，這些盛大空前的夏令營，為海外關心台灣民主運動的人士，掀開政治熱季的序幕。各個夏令營不只在人數上創下了空前的紀錄，而且在對問題的關注上，也有其

探討解決台灣具體問題

過去海外台灣人社團，關心台灣政治前途的焦點，經常流於統獨問題的爭辯，這種意識型態之爭歷廿年而不絕，且由於個別團體主觀意識的不同而妨礙了在具體問題上的合作。在統獨問題的是非爭辯之外，過去兩、三年主張台獨的一些台灣同鄉，又有左右派的分裂。「台獨聯盟」和「台灣革命黨」的公開決裂，亦在台灣同鄉之間進行了長期的辯論。這些屬於意識型態的爭執，往年常是各大夏令營的「熱門秀」，各團體常出動最優秀的人選，展現辯才和機智，並在會場中爭取可能的支持者。但是，今年這些流於形式的政治秀已不再吸引群眾，取而代之的是對島內具體問題的關心。

各地夏令營的最大特色是直接由島內來的反對派人士人數增多，這些人不全是在政治上的黨外人士，他們分別從文學、生態環境、勞工、核能廠等諸多角度，探討台灣社會的具體問題。而且由於他們原都是具備專門知識的專才，以準備充分的資料、幻燈片和錄像帶讓與會的海外鄉親，去感受第一手的台灣現實。例如出席美東台灣人夏令營的高俊明、呂秀蓮、林雙不、林文義，出席美南台灣人夏令營的陳永興，以及出席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的陳忠信、蘇慶黎、黃立禾等

他們提出問題，但不是把問題的解決，簡單的訴諸情緒性的抨擊國民黨，而是邀請海內外的台灣鄉親共同關心問題、研究並提供解決的方法。

致力消除意識型態差異

台大物理系教授張國龍更是風塵僕僕地連續趕場參加三個夏令營，呼籲海外同鄉關心台灣核能廠所潛存的危機。就在他憂心忡忡地到處演說之際，台灣又傳出核二廠發生事故。他痛心地指陳，一旦台灣發生類似基輔的核意外事件，海外鄉親就要永遠和故鄉親人道別了。

今年夏令營所展現的是對非政治問題的更深沉的關懷，這種對具體問題的關懷，應該可以成為海外台灣人士回饋故鄉的主流運動。台灣民衆的知識水平日益提高，空洞的政治口號和濫情的以地方意識作為某類運動的號召，可能會逐漸行不通。

這次各地夏令營亦可見到主辦單位努力在消除地方意識所造成的省籍隔閡和統獨意識型態的差異。例如美東夏令營的主要講員高俊明牧師就呼籲台灣同鄉不要排斥講國語的外省人。同時，身為「外省人」的江南遺孀崔秀芝在美東夏令營和在「支援會」演講時，都受到與會聽眾的熱烈支持與鼓勵。台灣革命黨的主要成員之一馬鎮山亦應邀參加「支援會」的夏令營。這些發展所傳達的訊息是，過去被戴上統獨帽子且早就予人以刻板印象的團體，事實上都在力求從具體工作中，突破過去的格局。

如何促進台灣民主運動

即以探討統獨問題的政治討論來說，今年在李哲夫教授所主持的「支援會」政治討論會中，亦有較突出之處。在澄清問題的概念之後，與會人士緊接着就問具體能做什麼？今年夏令營可能標示着統獨問題的清

談時代已告結束。不論來自大陸、台灣或美國的與會者，最後總要問，在自己的崗位上，能為台灣人民做出什麼樣的貢獻？怎樣做才是有利於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

今年中國大陸台聯會、台盟、台研同學會、台研研究所等機構派出來廿多位人士，參加各地的夏令營。在不同的場合，他們除了經常為中共對台政策，是否關懷台灣人民辯護之外，亦當反省中共應怎麼做才能真正有利於台灣人民在統一後的當家作主。他們渴望從海外人士口中聽到具體意見和具體做法。他們亦不斷表現出關心蔣經國身後台灣政局的可能演變，渴望從海外和島內人士口中了解「後蔣經國時代」的民心向背和國民黨的實力。

從他們所提和所關心問題的一貫性，海外人士似亦可嗅到中共對台政策未來可能調整的方向。他們不斷強調中共將「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而這樣的方向，只有台灣人民的民主力量不斷發展才有意義。

許信良等人籌組的「台灣民主黨」在各地夏令營亦備受矚目，受到許多支持與鼓勵。從這裏也可反映出在海外空談的時代已告結束。很多鄉親含着眼淚嘉許他們遷黨返台的決心。

支援黨外民間各種活動

今年各地台灣人夏令營所顯示的，也許就是一個海外台灣人運動新階段的開始，這項新階段可能標誌着海外台灣人意識形態及意氣之爭的結束，而重新以較寬廣的思想視野面向台灣，支援島內黨外和民間人士在社會各層面所進行的政治民主化運動以及環境保護等社會運動。



保釣十五年回顧



明報月刊 65期
(1971年5月)

二千多個留學生與學人向美國國務院出發示威

王平

十五年不算是很短的時間。十五年前嗷嗷待哺的嬰兒，現在該已成長、自立。十五年前參加集會、遊行，徹夜不眠寫海報、發通訊的保釣運動成員，現在大都已變成美國中產階級裏的「上班族」，為個人事業、前途拼搏。

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一個歷史事件？更具體的說，保釣運動到底具有什麼實際的社會意義？它對海外華人社會及中國、台灣產生過甚麼樣的影響？

對許多目前尚就學的青年而言，一九七一年在美國以台灣留學生為主，加上台灣島內大學生一齊推動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似乎已是一樁陳舊的歷史事件。他們或許聽過這個事件，認識某人的兄長曾參與過保釣，也隱隱感受到一些影響。但總的來說，他們大概會認為這個運動已是明日黃花，與現實生活扯不上關連，因而沒有瞭解的必要。

另一種更極端的看法，則出現於一些對政治有興趣的在學青年之中。他們認為當年保釣運動發展的方向，在意識形態上不夠激進，因此在先天上限制了它的發展。要打破這個框框，就得先切掉這根臍帶，忍受生育的痛苦，宣告「保釣已死」，來取得新生。

在一九八一年一個紀念保釣十週年的聚會上，香港「九十年代」的總編輯李怡作了演講。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保釣已死。」我們在保釣運動發生十五年後的今天，再來回顧一下這個歷史事件，大概會能更冷靜、客觀的歸結出它的特徵及性質，並回答前面所提出的那些問題。以下本文就試圖從幾個不同角度來探討此一事件。

一、從抗議到對抗

從本質上來看，保釣運動是一個單純的抗議運動（Protest Movement）。由於國民黨當局顛預無能，為了保住聯合國的席位，而默認日本對台灣東北部釣魚台列島的主權。當留美的台灣學生及島內的學生知道這個消息後，開始聚會討論，以各種方法向國府當局反映、施壓力，敦促國府不可喪權辱國。

這個抗議運動的對象，一直是國府當局。這反映出保釣運動初期一些參與運動的活躍份子，在心態上還是認同國府當局，承認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作為一種社會抗議運動而言，保釣運動在當初確實反映了許多海外留學生對國府「恨鐵不成金」的心理，希望發揮一些言責，督促國府在面臨外交困境之下，能全面整頓、振作。

這樣一個抗議運動，在任何民主國家都可視為稀鬆平常的事。但國府當局對此事件的反應及處理方式失策，很快就將保釣從抗議運動導入對抗運動（Antagonistic Movement）的形態。國府當局的失策，主要見於下列各方面：其一是派遣不學無術的黨官到海外「疏導」留學生；其二是利用國民黨黨國機構干擾島內外保釣運動的集會；其三是在台灣的情治單位出面恐嚇保釣運動中活躍份子的家屬。

對熟悉國民黨統治術的人來說，國府當局會採取上述對抗性措施，是絲毫不足為怪的事。由於當時若干特殊的歷史條件，已經塑造出國民黨退縮、因循的「黨格」。這件歷史條件，包括國民黨當時在台施行軍事統治已超過二十年，整個官僚系統已明顯呈現出老化、僵化現象；其次是當時國民黨已徹底將台灣島內的主要反對勢力（像五十年代的自由中國集團及六十年代的文星集團）消除殆盡。在這種和風細雨，內外和諧的狀況下，國民黨最高統治者自然冀望能維持現狀，享怡天年。

一個退縮、因循的政權，自然無法發展出新穎、靈活的策略來應付問題。國民黨這種黨格，不僅

見諸於七〇年代初期應付保釣運動時如此，即便是在十五年後的今天，應付各種國際危機時，也再三出現圖窮匕現的窘態，就可見一斑。

國民黨最大的錯誤，就在於以為可以將島內的一些統治手腕施展到國外。在島內，國民黨藉戒嚴法、廣泛分佈的特務眼線，自然很容易將所有異己份子排除，壓制抗議之聲。由於國府當局在台灣偏安已久，便以為青年學生都對政治冷漠，易受國民黨的支配。

當保釣運動一發生，美國各大校園內台灣留學生紛紛聚會抗議時，國府當局始而手足無措，無法判斷這個運動的性質。在這種情形下，就出現了指使留學生內黨團小組參與運動、爭取主導權的現象。其次再加上國民黨黨官到美國進行疏導。這些作法都是在根本上假定國民黨在台灣成功統御青年學生的手法、策略，可以如法泡製，全套施展到美國來。

國府試圖將台灣的專制統治作風，全盤套到在美國已經歷過些許民主參與薰陶的台灣留學生頭上，大概是造成保釣成員對國民黨最大反感之處。哀莫大於心死。許多美國保釣份子在看到國民黨頻頻製造鬧劇、認清國民黨當局始終將青年學子視為可操縱、玩弄於掌中的工具之後，就很快從認同——抗議的心態，轉變為背離——對抗的立場。這個轉變，從一九七一年下半年到七二年上半年之間最為明顯。瞬息間，各大校園的保釣團體都打出了反國民黨旗幟。更激進的一些保釣份子，則走上了統運的路線，轉而認同中國大陸。

二、左傾與非共

對國民黨當權黨官而言，保釣運動是一個不幸事件。在短短數年內，多年經營的美國留學生團體紛紛倒戈相向。「叛離」了國府當局。在此情形下，「共匪統戰陰謀」的說法，就層運而出。如果我

們站在這些黨官的立場上看問題，大概也會不得不乞諸於這個萬靈丹來解釋這個困境。否則，台灣那些負責文教、黨務、海外工作的黨官，又如何能保住他們的烏紗帽呢？

不過，將保釣運動視為是受左傾份子支使、控制的反國民黨陰謀這種說法，却忽略了幾個重要現象。第一，當時推動、領導保釣運動的主要成員，幾乎全是在台灣出生或成長，受完大學教育之後才來美國的留學生。若是這些「吃國民黨奶水長大」的留學生，會突然全面向左轉，那豈不是更顯得國民黨在台教育的失敗？第二，當時積極參與保釣的一些成員裏，包括一部份國府高級黨官的大弟。若說這些人也生來左傾，我們如何解釋這種「自來紅」的現象？第三，從台灣到美國的留學生，歷來是以理工科為主。雖然在六〇年代末期以後，美國大學文法科的左傾勢力已出現，但還不成熟。台灣留美學生中，對馬列、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各門各派有所涉獵的人更少。在此情形下，很難說明保釣運動的反國民黨取向，是受到左派的影響或控制。

平心而論，當年在保釣運動中確實有沒有左派力量參與呢？大致而言是有的，但是左派在人數及影響力上，都是極小，不成為主流，即使是在左派陣營中，真正對社會主義理論、實際運作有所認識的，更是少數。

許多保釣運動成員從反國民黨到左傾，進而鼓吹統一，是受到若干因素的影響。其中最明顯的一個因素，是在受國民黨打擊之後，自然選擇對抗的立場。這點在前面已討論過，不再重述。其次一個重要因素，可說是受當時美國環境的影響。六〇年代後期到七〇年代的反越戰運動，不可避免的也感染到台灣留美學生。當留學生目睹他們的美國同學能以直接參與、抗議的手段，而改變國家政策時，他們也自然有意模仿這種成功的例子。

美國現時一些保守派的論點，認為美國當年反越戰是受左傾份子控制，而作出錯誤政策的看法，是和國民黨一樣出自同樣的駝鳥精神。反越戰的主要精神，並不在認識或支持胡志明的越南共產革命，而是在防止對越南人造成更多傷害。如果將反越

戰主流，即自由主義的人道精神，誤解為共產主義的革命先驅，那就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了。

拿越戰的左派份子與保釣的左派做個類比，是有其特殊意義的。保釣運動一些積極成員中，本質上是受到自由主義的人道精神影響，更甚於受到馬列共產黨學說的影響。在這個自由主義核心上，當然有些人更披上了民族主義、或機會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外衣。

即便是保釣運動中，對馬列著作有所涉獵的正統左傾份子，他們瞭解、吸收馬列理論的立足點還是自由主義者的欣賞、批判精神，而非革命、鬥爭的犧牲。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就很容易瞭解何以當年左傾氣息甚濃的一些保釣積極份子，始終無法與中國共產黨認同。（當然，那些純粹以做生意、謀特權為主的投機份子，是不包括在內。）早期許多去過中國大陸的保釣份子，發現他們從一個專制腐敗的國民黨政權脫身，轉向一個極權獨裁的共產黨政權時，就急流勇退，不再參與實際政治活動。這就適足以反映出兩者在本質上的差異。

三、結語

從積極面來看，一九七一年的保釣運動打破了國民黨封鎖學生參政的禁忌。其後在台灣校園中推展開的鄉土文學運動、社會服務運動等，大致可說是直接受到保釣衝擊之下所產生的結果。

相形之下，海外以台灣留學生為主的保釣運動。除了效果不彰的統一運動之外，却似乎不見其它具體的影響。保釣左翼勢力中真正回到社會主義中國的人數極少。釣魚台列島也已從國民黨與日本做政治交易中的暗碼，轉為中共與日本政治交易的暗碼。唯一較明顯的影響，大概可說是當年參加保釣運動成員，經過這次具體參與之後，能更清楚理解政治過程的複雜性，進而發揮個人的社會批判（Social Critique）作用。

紀念保衛釣魚台運動十五周年

民主台灣訪問當年

參與保釣的留學生

昨日·今日與明日

本社

七〇年代初期由保衛釣魚台引起，風起雲湧，橫掃北美校園留學界的「學生運動」，其本來面目一直未能與台灣、香港更大的讀者群見面。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官方有意的歪曲、誣蔑與打擊；參與者基於怕影響在台親友或自己以後回台的問題或不願「出風頭」的原因往往不能「現身說法」暢所欲言；而運動的複雜性也使一些想做一全面徹底的描述與檢討的有心人在寧缺勿濫的心理下裹足不前。這一切使得此一中國留學生史中最重要歷史事件的事蹟即將隨如流水之時間而逝去。

保釣運動有人將其與「五四運動」相提並論，而另外一個極端是將其看作已是昨日黃花的茶杯中之風波。而真情大概介於兩者之間。而關於當年積極參與保釣運動者的心路歷程却一直未有一全面報導。

因為受到台灣官方說法的影響，這些年來有些留學生仍對釣運是「共匪統戰陰謀」半信半疑。而另有一些人則稱其對釣運的了解大多來自一部題為「昨日之怒」的小說。我們同意該書作者在其後後記所云他是並不頂有資格來寫釣運的「報導小說」，原因並不是因為他自以為的「立場」或「銜譯」的問題。「昨日之怒」的最大失敗乃是深度不夠，真正參加過釣運者讀了該書後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該書作者當時大概只是一位站在旁邊說風涼話者。

另有一篇關於釣運人心路歷程較有系統的報導要算「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先生在其宣稱「釣運已死」之後於一九八一年訪問了七位最具代表性的釣運人士題為「昨日之路」，既稱釣運已死，那也許該算是「驗屍報告」吧。

但我們認為「昨日之怒」加上「昨日之路」對釣運的描述不但不夠全面，甚至不能夠表達釣運精神的一半。李怡訪問記的毛病出在他訪問的釣運人「太具」代表性；而釣運的真正中堅却是一些平凡的普普通通的留學生，「沈默的」大多數。十五年來他們的見解與言論往往散見於從事學生運動者的客廳之中，而很少形成文字而見諸報刊雜誌，或以言論的形式在各個探討台灣前途的各個討論會上發表。這些言論與見解常甚為精闢，甚至給人一種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的感覺，其所以不見諸文字，除了前述「安全」的考慮外，另外一個原因當然

與華人圈中之「左、中、右、獨」各派之號稱「主流者」之「比立場」，訴諸情緒與「比口號響亮」之風大盛有關。

我們組織這些訪問記的目的是多方面的：

～其一：將保衛釣魚台運動的真實經過介紹給未能適逢其會的更年輕讀者。

～其二：讓當年參與保釣運動中「沉默的大多數」之心路歷程能與更廣大的讀者見面。

～其三：十五年前廿～卅歲的青年人，現該是卅五～四十五歲的中年人，在被宣判「運動已死」或做為「昨日」之「怒」或是之「路」的體裁外，釣運人對今日、與明日要說些什麼呢？

任何曾參加過釣運現在仍有話想說且願接受本刊訪問都在歡迎之列。這期只是一個開始，希望能引起更多的迴響與反應。那麼我們將連載下去。



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廣場上的示威人羣，最左下角的是紐約聯絡人之一，紐約市大學（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的教授袁祥。

明報月刊65期
(1971年5月)

爲紀念釣運而寫

舊金山示威人羣中，左側面者即黨總領事周彤華。



明報月刊 63期 (一九七二年三月)

路 林

作者是台灣大學物理系六七屆畢業生。七〇年在加拿大讀完碩士後，轉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第二年初釣運開始，即參加釣運，並參加學運直到七八年。現在美國某大公司任職工程師。

釣運前的留學生

釣運開始之前，在美中國留學生的思想狀況，嚴格來說，並非完全一致。我想這與以後釣運快速的自發性發展，以及與所謂左中右分家的時刻與原因都有關係。如果粗略分一下，當時的學生似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來美時間較長，較注意思想文史問題的一群。他們對台灣不易接觸到的一些進步

思想或事物已有接觸，對中國近五十年的歷史開始有較全面的了解，而其思想本身已經突破了台灣國府的封鎖線。第二類則是來美不久，樂於甚至渴於接觸並接受新的思潮，因為他們對過去在台灣所被強加的思想及文史教育抱著懷疑與不滿。他們本身的思想在新舊相錯的環境中尚未成形，仍在摸索的階段中。第三類則是對思想問題、歷史人文比較不敏感，安於在台灣成長期所受之教育，而本身較專注於與切身利益有關的學業與生活出路問題的一群。釣運一開始的領導群（主要是思想領導，可說是以為數並不多的第一類為主。第二類則屬於釣運的熱衷參與者，或說基本骨幹與群眾。而第三類恐怕包括了較多的以後所謂的中間或右派。當然，在第二類中亦不乏許多中間派。其實，所謂中間派，是包括了許多在思想上同情贊助釣運主要方向，而在行動上「不便」參與者。從當時的情況來說，我個人是屬於第二類。

釣運導發了青年們向獨裁統治正面反抗

釣運從最初一開始的「愛國保土」出發，很快地就「追本溯源」地發展到對事件本質的探討上去了。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事件本質及國民黨政府當時的反應方式所引起的，而為自發的領導群所帶動的；但實際上，我以為是不可避免的歷史潮流在成熟的环境中促成的一個必然產物。左派的人說釣運「變了質」。中間派的人責怪釣運「走的太快」，而國民黨政府乾脆說是「共匪操縱」。其實，釣運祇是一個導火線。確切一點說，釣魚台事件是一個導火線。它突破了國民黨政府長期在台灣實行的思想禁錮與封鎖的嚴密措施，導發了七〇年代迄今青年們向獨裁統治正面反抗及思想覺醒的開始。

一九四九年之後到一九六九年，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採取了高壓的白色恐怖統治，鎮壓了所有異己的思想者，對青少年則採取了矇蔽欺騙兼以高壓恐怖的教育手腕。它的這種政策，是和它自一九二七年之後，即國共第一次合作分裂之後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這種政策，當然是有鑑於在大陸時期的「歷史教訓」。但是歷史總是無情的。在歷史的真象面前，一種對土地、民族和人民的感情和對真象的追求，起於對任何政黨或政府的感情。國府廿年在台灣費盡心血把「黨」與「國」變成同義字的一切苦心，在一個覺醒了，有理智與熱情的青年面前，剎那間盡付東流。釣運當時，幾乎所有美國知名的學府裏，都有一批批優秀的台灣留學生參加了運動，並成為釣運的骨幹及領導份子。他們毅然地站了出來，正面與國民黨政府相對抗，置一切國民黨可能加諸於他們本身與親屬的罪名與處罰於不顧，這是需要很大的決心與勇氣。在此，歷史同時帶來另一個教訓：對青年不提供一個客觀真實的思想啟發與歷史教育，而僅知實行愚民高壓的教育政策，遲早會有走火與爆發以致不可收拾的一天。

六〇年代末期的美國學生反戰民主運動，給了當時的中國留學生很大的教育與衝擊。而美國學生運動的矛頭是直接指向美國政府在亞洲的政策。在高壓政策面前，一種象徵著平等、人道的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在西方社會自然抬頭，這種理想主義與亞洲當時殘酷的戰爭現實分不開。而這種理想主義的精神堡壘則來自中國大陸。配合當時高壓緊張的亞洲局勢所產生的反抗意識，在台灣廿年受到的那種沒有民族獨立自尊，高壓欺騙的統治所產生的反抗意識，以及一種尋找民族歷史文化被切斷的根源和民族尊嚴的渴望，被釣魚台事件點燃並激發了。對已覺醒的青年來說，是對國府以及其所依附的外國勢力宣戰。（當時最響亮的一個口號就是沿用五四運動的口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對尚未完全覺醒的青年來說，是看到了自己追求的一線曙光，而積極忘我地投身到這一個運動中去。而當時的一個遙遠而又模糊的理想主義境界，却其實是來自一個自己最親近却又陌生的祖國。身為中國留學生，面對這樣一個早已渴望與尋找的理想主義，於是就毫不猶豫地去追求了。而就在這個時候，中國在大多數國家的支持下，進入了聯合國。中國的社會主義始更直接地進入釣運群眾的生活圈，成為想要了解與對抗的題目。

釣運是思想變化的導火線

當一九七二年，釣運開始一年有餘，國府的本質通過釣魚台事件為大多數學生進一步認清了之後，釣運在經過一個短暫的分裂重組之後，即走入了所謂「統運」的階段。各地釣運的主力絕大部份仍然留在這一個新的運動階段中。而各地匯集的一批釣運骨幹則更直接地參加了支援中國的聯合國工作

中去。這一新的階段是一段持續很長的校園學生運動。主要目標是圍繞著重新認識中國現代史與現代中國及對台灣國民黨政府的重新認識與批判，這兩大題目的自我教育與宣傳。直到中美建交及中國政局轉變才逐漸停止校園上的活動。因此，可以說，釣運是一個開始。是繼卅年代之後，又一次青年學生（海外與台港）思想覺醒的開始。由於它廣泛的運動範圍包括了以北美為主各地知名的校園，從這一範圍影響到的無論是左、中、右的學生與教職員及社會人士，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衝擊。這一衝擊轉而對台灣或香港產生刺激與震盪，從而加深當地本身的釣運影響。我沒有看到較完整介紹釣運在台灣所生影響的報告。但相信，在台灣，釣運為青年學生面向社會，面向農村開了路，並為以後十多年台灣蓬勃的民主運動做了很多的準備工作，不論是思想上的鍛鍊或人才的培養。

「壓力差」促成變化

從物理學的角度來看，也許這樣一個比喻並非太過離譜：釣運是在高度密封壓力情況下，自然與人為發展出來的一個突破點，通過壓力差，分子群通過並擴大這一個突破點，產生瞬變期狀態，每一個分子或多或少都受到衝擊，做最大的運動。而當壓力差逐漸減少之後，分子的運動也相對的變小，而逐漸以擴散為主。七一年至七九年是這個瞬變期的主要階段，而目前則屬於運動量低的時期。但是一個更廣泛更大面積的擴散活動却正在進行中。（指大陸與台灣在文化經濟與人民接觸的互相滲透，進步思想與落後或反動思想的互相滲透，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優點與缺點的互相滲透）。這個擴散活動本身即醞釀著下一次更劇烈的變動。物理學的比喻是不足的。因為它並沒有說明一個重要的變化：那就是每一個分子在這個運動之後，他們的「思想」都起了或多或少的變化。這個變化主觀方面的導火線就是釣魚台事件。它對於促進中國人關心政治、參與政治，促進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起了功不可沒絕對性的作用。

因此，總的來看，釣運是在當時國際國內（指台灣地區）環境下，中國青年突破思想封鎖、反對國際政治經濟勢力壓迫及依附在這個勢力上的本國腐敗政權的壓迫，要求民族獨立，特別是愛國主義的一個思想覺醒運動的開始。它也是配合了六〇年代末，國際上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反抗壓迫的這一個歷史潮流的。

釣運（學運）的缺點

但是，反省一下釣運以來在美學運的發展，它也不是沒有缺點的。這些缺點的主要原因就是由於它是源自一種意識型態上的理想主義的學生運動，以及脫離了它本身的土地與人民大眾的運動——一個很難避免的缺點。由於理想主義的影響，以及由於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缺乏切身的利害感受經驗，因此，對中國社會主義當時發展實際情況，瞭解很不深刻，這個缺點，使得學運對中國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在許多方面脫節認識不夠，單方面過多地稱頌社會主義好的一面，却不能冷靜仔細地去探討研究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行的一些缺點。甚至基於擁護保護社會主義的理由，以所謂「主流」與「支流」的說詞，去說服自己不要太過強調缺點。這一方面，使得學運的發展在社會上並不能得到更廣大的熱情支援，甚至還得到一些反面的打擊，而當中國政局在一九七八年發生極大的轉變之後，學運也就面臨了很大的挫折。這都是與學運的高度的理想主義色彩分不開的。理想主義太濃，往往就會有不切實際的毛病，其實這也是「學生運動」和「政治運動」一個很大不同的地方。釣運與統運始終基本上是維持在一個學生運動的層面。它對於一些非理想的實際政治操作無法完全了解或認同，對於「政治利益」反應很小或毫無，而對於一種理想或理論則很容易去接觸去接納，一旦這種理論遇到挑戰或破裂的時候，則往往也就隨之而受到挫折，並忠誠地把它挫折表現出來。此外，由於它的運動環境並非是一個和其本人與廣大民眾切身利害相關的社會

，它的缺點往往不會為群眾與社會所能立刻指出與更正。這以上所說的是釣運以來統運的主要缺點。自一九七九年以後，中美建交促成了大批中國官方人士及大陸留學生來美，以及不斷的文化交流活動。學運過去在美各地所扮演的「介紹中國」的角色，在實際上已必須由前者來取代。從這個角度說，統運也走完了「打前鋒」介紹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而必須以更充實的內涵才能延續這個行動。統運自一九七九年之後逐漸停頓，至少有著上述兩種原因。

正視現實，繼續為理想獻身

釣運以來的學運主要方向是一個歷史必然。歷史必然未必是十全十美的。正如同我自己看待自己

過去從參加釣運到從事學運這些年的經歷一樣。我們生於這樣一個歷史時期，這樣一個歷史環境中，祇能在這個基礎上去追尋合理與正義，並付出代價。中國的過去，說明了她必須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而爭取獨立，應該實行一個符合最大多數人利益的一個民主社會制度。理想主義是我們在這些年中從事學運的一個重要意識型態的組成部份。這並沒有錯。沒有它，我們不會犧牲個人利益去追求中國一個更美好的明天。也許在這幾年運動低潮的沉思期所帶給我們的啟示，就是怎樣去堅持理想，正視現實，並在更實際的基礎上，繼續去做我們理想的事業。

「釣運人」，在過去這十多年來，在各層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可說是海外愛國力量的中堅。今後是否能集中原有的力量發揮更多的力量，如何為中華民族長遠利益，為海峽兩岸最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包括政治與經濟的），這兩大原則再做一點事，值得我們深思與探討。

訪 陳光宇

一九七一年、耶魯大學保衛釣魚台委員會負責人之一。

現職：美國紐澤西州立羅吉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化學系副教授。

這篇訪問記是以書面的方式進行，下面是被訪問者的背景簡介。

陳光宇，一九六七年畢業於台大化學系。隔年得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獎學金就讀於化學系。畢業後，在耶魯大學醫學院做博士後研究員（Post-Doctoral Fellow）。一九七七年至羅吉斯大學化學為助教授，現職為副教授。

問：請先談談您參加保釣運動的經過。

答：耶魯大學的中國同學會在一九七〇年年底的座談會中開始討論釣魚台事件；琉球歸日在即加上日本蠻橫的宣佈釣魚台列島將於一九七二年一併歸日，使人感到八年抗戰，血債未償，屍骨猶寒，新仇又至，於是舊恨新仇，一併爆發，釣魚台運動在留學界就像星火燎原似的展開。參加一月三十日（一九七一年）的紐約示威，給我震動很大，當天的日記很簡略的寫道：「早上趕到四十二街同 1st Ave 交口的哈瑪紹廣場，一下車，見到都是中國人，興奮的很，示威從十一點半開始，演講，遊行；二千多中國人分從匹茲堡，康奈爾，紐約，Yale，Syracuse，Stony Brook……群集於此，留學生史上如此規模的團結與遊行，應屬少見；天氣尚佳，溫度却在零下，同學高舉標語，旗幟，唱着滿江紅，從四十二街走到日本領事館，再至日航公司，場面令人感動……」。這次示威的成功大大鼓舞了許多同學，各個學校的中國留學生成立的保衛釣魚台委員會（保釣會）頗像雨後春筍。這之後，基本上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底，在耶魯大學關心國事的同學教授，幾乎每週至少相聚一次，出版通訊，與各地聯絡，籌備四月的華府大示威及七月的安娜堡國是討論會。

華府示威之後紐約時報上說：「如果以中國人在美國的總人數來講的話，四月十日的保衛釣魚台示威，相當於數百萬美國學生參加示威……」。這些活動的成功，幾乎鼓動起全球華人界的保釣運動，當時同耶魯保釣會聯絡的地區，除美國各學校外，包括加拿大、菲律賓、香港、比利時、法國、英國及台灣；這種規模在近數十年來可說是空前的；基本上我自己投入這洪流後，個人的實驗室工作頗為停頓了一段時間。

問：在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二年急風驟雨式的「大運動」過後有些什麼後繼活動。並請談談釣運後期「左、中、右」分家及留美學生及學人界之左、中、右、統、獨的分裂現象。

答：從一九七二之後，基本上耶魯的保釣會仍以座談會的形式保留下來，討論的題目圍繞著中國現代史，第三世界，大陸與台灣的現狀等，我基本上一直參加這種座談活動，以迄一九七七離開耶魯。

保釣運動在七十年代中給留學生不同層次，不同程度的影響，雖然後來可能走的路不同或者產生了不同的動機，當時基本的出發點只有四個字：愛國保土。在運動過程中，像開會、出版刊物、聯絡、討論，不斷的與其他人接觸；很引起有心人的進一步反省與深思，基於個人的經驗，早期一同參加保釣示威座談的，慢慢分裂成政治觀點較為鮮明對立的小團體，似乎是很自然的演變。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陰影膨脹之際，中國的領土被強權瓜分之際，中國人不論左中右還是有共同立場、共同語言的。但是當釣魚台的影子漸漸淡去之時，留學生的愛國情操很自然的同現存的政治實體聯繫起來，看來我們這一代還是跳不出六十年來國共相爭的窠臼。

問：參加保衛釣魚台運動對你自己的意義何在，你認為「保釣運動」的歷史意義何在？

答：釣運當年如火如荼，而今隨著世局的變化，無復當年盛況，但是可以斷言的是參加過，或接觸過釣運的朋友，是不會忘掉那一段心路歷程的。每個人走的路，或有不同，釣運的經驗與自省或多或少對於將來所走的路一定會發生影響的。至於釣運在歷史上的意義何在，目前很難預料。主要看兩點：一、釣運對這一代中國人，特別是留學生的影響是什麼，打的是什麼烙印。二、這一代留學生將來對中國，對華族的貢獻是什麼？我自己感到遺憾的是這樣規模的愛國保土運動與知識份子的自省不能與中國本土的知識份子結成聲氣。無論台灣或大陸基本上的青年自覺的團體行動都有杯弓蛇影之感，可嘆！可嘆。

問：十五年來，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政局都有很大的變化，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毛澤東逝世後政經局勢有極大之轉變，而台灣自中壢事件，美麗島高雄事件以至黨外民主運動如火如荼之展開，您對這些有什麼看法，如能談談這些年來您自己的心路歷程就更好了。

答：近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經由各種途徑，求取強國之道，國族有盛有衰，從清末以迄抗戰，中華民族可以說達到了「丕極」，不過丕極之後，似乎也沒有泰來。左派、右派，實際上代表兩種救國的途徑。左派的思想根源理論基礎來自蘇聯，東歐。右派則著眼歐美。國共兩個政權雖然水火不容，仔細考察他們還是有共同點的：一、兩派的精英份子（指早期的）肯定是愛國的，有志救中國的。二、兩派基本上面對所謂傳統都持否定的態度。胡適給中國文化下的定義就是小腳、鴉片煙。魯迅、毛澤東對中國文化的好感也不多，在左右陣營之中好像都格格不入，留學歐美的要搬歐美的一套來改造中國，留學蘇聯的要搬蘇聯的一套來改造中國。孔子是何等人物，始則打倒孔家店，繼之以打倒孔老二，要不然就是大拜拜似的祭孔一番。中國的文化，國族的傳統成了口號，旗幟，成了知識份子打筆戰打混戰的彈藥或靶子。追根究底，我覺得一百年來的知識份子，急功近利的多，切切實實下苦功做學問（此處所指的學問著重思想經濟文化），為國族指出路，能承先啓後的提供保證，在這前提下，如何讓國族個人集體的智慧才能做最大的發揮，才是當務之急。我個人對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尚有信心，只要國族的生命力在，統一遲早的事。過去我頗執著於統一分裂問題，如今看來，聯邦式的統一要遠勝過集權的統一。同時我相信中國文化的力量，在聯邦分權的狀況之下，也無須要擔心分裂的問題。

問：鈞運時廿五歲的青年人，十五年後的現在應是四十歲的中年人了，展望將來，您有些什麼看法，不論是對世界局勢，台灣與大陸前途或是您個人的一些計劃（Project）請隨意發揮。

答：人到中年，回首過往，瞻望未來，我感到我對中國所知太少。現在世上所有存在的文明，基本上都是宗教文明，中國文化（或者應該說漢文化）是世界上少有的非宗教文化，更是世界上七個所謂起源文明（Primary Civilization）中唯一能進入二十世紀的一個。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中國文化的這兩個特色，很值得注意，鑑往知來，我希望能多瞭解中國文化的生命力何在？以及如何能讓這生命力做最大的發揮。鈞運在留學生界，除了轟轟烈烈的示威之外，在座談，在出版刊物，在連串過程中，希望能有一代肯思想的知識份子，對國族能有貢獻。



明報月刊 63期 (一九七二年三月)

訪夏沛然

一九七一年：芝加哥「釣魚台快訊」負責人之一

現職：聯合國秘書處任職翻譯

訪問是以通信的方式進行的。

夏沛然一九六〇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政治系，一九六二年赴美，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比較政治，得碩士學位；一九六七年到芝加哥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一九七一年在芝加哥參加保衛釣魚台運動，參加過的活動包括：中西部各校在芝加哥的一·廿九遊行，華盛頓的四·十大遊行。麥迪生討論會及安娜堡國事大會等。其後一直參加芝加哥「釣魚台快訊」的工作。一九七五年初到紐約聯合國秘書處工作。

問：釣魚後期有所謂「左、中、右」的分家，其後在留美學界及一般華人圈中也有「左、中、右」分裂的現象，你有些什麼意見與看法。

答：保釣運動出現左右派分裂對抗的現象，可以說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產物。這可以從幾個角度來分析：

右派的基礎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1 國民黨的職業學生或忠貞黨員，這些人或者與台灣的情報機構有聯繫，或者是定期參加國民黨的小組會議。他們參加保釣運動，本來就是別有用心，一旦發現運動出現反國民黨的傾向，自然會大肆反對。反對不成就分裂出去。

2 另一些人，在台灣有較好的家庭或社會背景，譬如父母擔任黨政要職，或是在台灣有殷實的產業，因此他們不願意運動變得過於激烈，心裏也很有顧忌。

3 還有很多一部份學生，受的是港、台兩地的反共教育，對任何讚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言論都深有戒心。這些人除了專心讀書，努力於取得學位，也熱心於參加查經班、同鄉會、跳舞會等活動。他們多半在參加保釣運動後不久就很快退出。

左派學生來自幾個不同的背景：

1 六十年代美國青年反傳統價值、反既存體制的思潮以及後來遍佈美國各大學的反越戰運動，給港、台留學生帶來很大的衝擊。雖然台、港留學生直接參加美國學生運動的人並不多，但耳濡目染，在思想和行動上都肯定受到許多啓發和鼓勵。

2 台、港來的學生到美國後接觸到大陸書刊，開始拋棄舊的那一套反共八股。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不但帶動了西方各國的青年運動，而且被西方知識界普遍推崇為人類的新希望。許多人因此開始研讀馬列著作和毛澤東選集。

保釣運動向左轉，是左、右兩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運動初期，右派學生在校園裏多方阻撓破壞，公開或私下恐嚇威脅，造謠污蔑種種手段，把許多留學生逼上梁山，走上與台灣政府對立衝突的道路。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華盛頓大示威之後，由於許多人對台灣政府普遍感到失望，左派學生趁機提出認識新中國，學習社會主義，統一回歸等主張，遂使運動全面左轉。右派和中間立場的參加者紛紛退出。運動也就此無疾而終。

有人認為保釣運動如果不是走得那麼左，那麼快，也許還可能吸引更多一些人參加，維持較長一段時間，造成更大的聲勢。這種看法其實不一定正確。

保釣是一個學生運動，就像一般學生運動一樣，通常都是為著一些具體目的而採取疾風暴雨式的激烈行動，一旦目的達到，更常見的情形是一旦發現目的不可能馬上達到，參加的人就會逐漸退出。比較堅決的一些人也會逐漸轉移方向，著手一些其他的活動。從這個角度看，保釣的主要活動延續了一年多時間，已經很難得了。

值得提出的一點是：無論是右派、左派都沒有堅實的思想基礎，都沒有什麼完整的理論體系。左右劃分的標準只是認同那一個政黨或政權：擁護國民黨的是右派，贊成共產黨的是左派。右派基本上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擁護國民黨，希望在運動中表現出忠黨愛國的樣子，回台灣立功頒獎，飛黃騰達。左派在開始時多半沒有這樣的功利想法；因為當時在美國贊成中共，絕沒有什麼好處可言。他們共同的思想背景是對國民黨的失望反感和對新中國的不切實際的嚮往憧憬。但是到了運動後期，中共進入聯合國和在美國設立聯絡處之後，左派裏面也出現了不少奔走鑽營、告密誣陷，打倒別人以提高自己的人。左、右派之間的意識型態差別不甚明顯而行動作為却往往近似。所以有一些人原來是國民黨的活躍份子，一變而成保釣的左派健將，再度而又回到賺錢享樂，麻將舞會的生活方式，絲毫不會有無法適應的問題，自然更談不上思想改造的痛苦。

問：保釣運動有人將比做「五四運動」以來，海外留學生界最重要的學生運動，而另外一個極端是將其看做已是昨日黃花的茶杯中之風波。請談談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保釣對參與者及對歷史的意義何在？

答：保釣運動的直接目的可以說只成功了一半：釣魚台的主權問題暫時擱置起來，留待以後解決，所以釣魚台只能說沒有丟掉，但也沒有完全保住。

另一方面，保釣產生了許多間接影響，對參加和反對運動的人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現在能看得到的影響包括下面幾個方面。

首先是一些港台留學生衝破了反共的禁諱，公開宣佈擁護北京政府。隨著北京取代了台北在聯合國的席位，中美關係逐漸改善，以及美國學術界和新聞傳播興起的中國熱，這些學生在推動海外華人的認同回歸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這種認同和回歸自然帶著許多幼稚的狂熱和虛妄的幻想。在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台，文化大革命初徹底否定之後，認同回歸的熱潮也跟著冷靜下來。不過，在經過檢討反思，重新認識之後，大多數人雖然拋棄了對中共的幻想，但也沒有丟下對國民黨的失望和厭棄。許多人變得憤世嫉俗，不願沾染現實政治，但也有人以同情和批判的眼光正視中國的現實，從海外華人的立場希望對中國人民和中國社會作出一點貢獻。目前不少回大陸研究講學和經商投資的人，都還是保釣運動的餘緒。

另一方面，保釣也使一些親國民黨或反共的人組織起來，成立了反共愛國聯盟等團體。這些團體在推動留學生回台灣工作、研究、投資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美國自七十年代以後就業市場不景氣自然也是個客觀因素），並且在台灣黨政和教育文化界形成一股勢力。這批留學生在台灣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是個值得研究的題目。

訪張才

一九七一年，西南地區釣魚台聯合會首屆聯絡人。

現職：美國德州休士頓，貝勒醫學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生理及分子生物物理系副教授。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物理系兼任副教授。

全美華人協會，休士頓分會會長。（一九八五～一九八六）

這篇訪問記是以電話訪問的方式進行，下面是有關被訪問人的背景介紹。

張才，一九四二年出生於廣東深圳，一九六一年香港中學畢業後進入台灣大學攻讀物理。一九六五年台大畢業，當年秋天到美國入Rice 大學物理系研究所。在學期間與同學一起成立Rice 大學中國同學會，當選為首任會長。一九七〇年得到博士學位後，留校當博士後研究員（Post-doctor）。

一九七一年通過林孝信和一些台大校友的聯絡，注意到釣魚台事件的發展，於二月廿四日在Rice 大學舉辦了第一次「保釣討論會」，並馬上成立「Rice 保釣工作會」出版《Rice 釣魚台通訊》。後來又擴大成為「休士頓地區保釣行動會」。曾代表休士頓參加四月十日的華盛頓保釣示威。後來德州路易士安那及奧克拉荷馬三個州裏的八所大學的保釣會合作組成「西南地區釣魚台聯合會」出版《西南保釣通訊》，由各校輪流主編。

在這以後的幾年一直在做些群眾運動工作，包括辦刊物，搞討論會，在圖書館裏陳列資料，支援外地保釣（及以後的「統運」）放中國電影及向美國政界及報界寫信等。一九七四年與朋友合辦一份油印雜誌「新苗」。發行量不多，但斷斷續續地，也辦了廿九期到一九七九年才停刊。

一九七六年春天中國大力推行「反右傾翻案風」運動，張才持不同意見，曾擬了一篇《關於批判「三項指示為綱」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文章對大陸當時的方向提出質疑。他在六月初把文稿帶到美東去跟那裏的釣運人士討論。聽說因此幾乎成了當時留學生中的「左派」（如「統一雜誌」等）批判的目標。

曾於一九七四年到中國大陸參觀訪問，一九七八年到中國去從事科技交流活動並於一九八一年在北京大學講學三個月，在該校生物系教一門「生物物理學專題」的課。

在過去十五年裏，張才在釣運及統運上花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但他在專業上仍然有相當突出的成就。他發表了大量的論文，曾在好幾次國際性學術會議中擔任主席和小組主席，又為Plenum 出版公司主編過一部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Excitable Cell 的專著。並名列American Man and Woman of Science（美國科學界名人錄）及Who's Who in Fronti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前衛科技名人錄）。

問：首先想請你談談參加「保衛釣魚台運動」對你個人意義何在，又你認為釣運的歷史意義何在？

答：釣運對我個人最大的意義在於能夠投身在一次愛國、愛民族的運動裏，體驗了一次熱血的交流，這種經驗在近代留學生歷史裏是不可多得的。平時如果沒有這種愛國保土的運動當然也會交到一些學術上及社交上的朋友，但保釣運動為有理想主義情操的一群人提供了特殊的環境。在運動裏交友不是基於個人之間的利益或喜好，而是基於共通的理想和對國家前途的關心，這種機會是不容易碰到的。

關於「釣運」對歷史的作用，我們大概不能期望得太高。至少在原來「保衛釣魚台」這個目的上我們產生不了多大的作用。這一點當然並不意外。學生運動從來就很少能夠對歷史產生有效而直接的影響，在與日本爭議釣魚台主權這個問題上台海峽兩邊的政府都沒有採取強勢的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來與日本據理力爭。不論當時我們如何叫喊，兩邊的政府不會因我們而改變他們的既定政策。我們雖能憑自己的一腔熱血喚起了一些人對國是的注意，但對釣魚台問題本身並不能產生多少實質的作用。至於「保衛釣魚台運動」在廣義上對大陸和台灣產生了什麼影響呢？大概也不能高估。到目前為止「保釣」對大陸政局的影響幾近於零。對台灣的情形我不太清楚，也許影響會稍大一點。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愛國保土發展出來的留學生運動往往在很多當事人心中留下了一些火種。這些火種到了適當的時機可能會點燃出一些新的火炬，在某種環境下說不定會造成燎原之勢。所以我認為「保衛釣魚台」運動及其後發展出之愛國運動對歷史可能有間接的影響力。但這是一個未知之數，到目前還不能估計。

下面的幾個問題都是由於張才在一九七六年對大陸推行「反右傾翻案風」運動，持不同意見，並擬一篇《關於批判「三項指示為綱」的幾個理論》一文而引出。此文在十年後的今天看來可能不覺得什麼，但不要忘记張才寫文時還是四人幫當道的時代，他敢公開發表反對意見至少反映了兩點：第一、他對社會主義理論有相當研究，而且對自己的認識有一定的信心。第二、他有相當的勇氣；當時也許有其他的人對中國大陸的政治情況與張才有相同的看法，但在那四人幫當道的環境，很少有人願寫成白紙黑字的文章來表達與當時國內「政策」不同的意見。張才這樣做須要有一定的勇氣和魄力。下面幾個問題環繞著這篇文章。

問：你的專業是學理工的，似乎對社會主義理論滿有研究，是不是先請你談談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是從何而來？

答：這一點可能與許多參加「釣運」者沒有兩樣。以前大學時代念的政治理論只有三民主義，主要為了應付考試，不能算數。在釣運後期慢慢轉變到認同中國，因而自然而然的想到要認真的認識社會主義。另外一個因素是當時美國校園因為越戰的關係左翼思潮非常膨動，自己也受到一點衝擊，然後是中美外交突破，中國參加聯合國。而在參加「保衛釣魚台」運動的過程中，很容易看出國家分裂對所有中國人之不利。受到這一系列問題的衝擊，大家開始深入研討問題，看一些書，開討論會，二週到一月一次定期學習。另外，保釣時，常有各地朋友「串連」常徹夜長談一連幾個晚上。所以對社會主義理論的認識算是慢慢積蓄起來。基本上從七二年到七六年算是一個「業餘搞文法者」。而另外正是因為「業餘」以及人在國外沒有統治組織的管制，不像在台灣或大陸可能是被迫「照本宣科」，限在一個圈圍裏，自發的探討反而念得比較深入。

問：聽說你的文章寫出來後，當時未能在「新苗」上發表，你將草稿拿去美國東部時，又被「統一雜誌」批為毒草，可否談談這一段經過。

答：也不能完全這樣說，並不是說「新苗」的朋友反對這篇文章的內容，而是有些同事認為應該採謹慎的態度，認為沒有必要與中國當時的官方政策作對，免得造成某些不方便，甚至引起與其他「統運」團體的決裂。至於我當時何以會與「統運」「左派」主流採取不同的意見？那也有幾個因素。一是念理工者比較實事求是，而我們這種業餘為興趣而搞理論的也比較不受權威的影響。凡事表現尋根究底。並且在美南還有個好處就是「天高皇帝遠」，與中國的官方代表沒有直接的交往，受的影響較小，有利於自己獨立思考看問題。至於「統一雜誌」對我的批判，那只是根據聽來的消息，沒有形諸文字。所以我不想強調我們看法的分歧。而且在當時那個環境，他們假如真的要大張旗鼓的來組織批判的話也不奇怪。因為當時緊跟「兩報一刊」是一種時尚，不能苛責那些「主流」派的朋友。

問：從張系國的「昨日之怒」及李怡之「釣運十周年專訪」中，讀者很容易得出一個印象：那就是在「紅與專的矛盾」下，很多參加保衛釣魚台運動的留學生走上了「棄學從運」的路。你顯然花了很多精力去搞運動，但在科技上仍然很有成就。可否談談你是如何解決此「紅與專」的矛盾的？

答：「紅」與「專」的矛盾的確是一個大問題，不容易解決的。我認得有些同學，他們曾經在「釣運」高潮時拋棄了學業，專心搞群眾工作或者改行做社會工作。但是作這種斷然選擇的，畢竟是運動中的少數。大部份人還是盡力要把自己的學業完成，把專業維持下去。我自己也不是沒有經過選擇

的苦惱。有兩點原因使我始終沒有放棄專業。一、我對自己的科學研究有很深的興趣，科研對我不僅是維持生活的職業，而更是一種有深遠意義的求知活動。二、在運動過程中一直看不出一條明顯的路能夠讓個人的獻身為社會帶來重大的（起碼是有意義的）改變。相形之下，似乎是搞科學的人類有更大的貢獻。

但是，一面要研究社會，關心社會，一面要在科研中競爭，那是十分辛苦。你也很清楚，在美國搞科研，競爭和淘汰都十分激烈。那是須要全心全意投入的全職工作。而搞群眾活動也必須身心俱赴的去做。所以在七一至七八那幾年裏，我幾乎承擔兩個專業工作。白天上班搞科研，晚上及週末搞運動。家庭生活和休閒時間都被擠掉了。

而且，人的頭腦不是像機器一樣隨便轉換操作（像TV按下鈕便換上別的電台節目）。許多事情是須要十分專心才能做的。不管「紅」與「專」的矛盾也好，兩種「專業」的矛盾也好，「一心二用」的結果往往是兩種事情都不容易做好，故常有事倍功半之感，很累！參加過運動的朋友大概都有這種體會。在現代社會裏，要「紅」與「專」兼顧是十分的困難。除了要有不斷的毅力外，運氣也不能太差，體質也得不錯。

問：這些年來，你回過台灣、大陸嗎？是短期訪問，旅遊還是短期或長期服務，都有些什麼感想？

答：台灣還未能回去過，大陸則去過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七四年隨保釣團去短期參觀訪問，其安排與其他「保釣團」大同小異，從南到北，從大城到農村，從公社到工廠；從幼兒園、小學到中學大學。也就是說對大陸上整個中國社會的橫切面做一觀察。由於時間很短，難免有走馬看花的感覺，但是受益仍然是很多的，因為親身直接觀察到底與從

報章雜誌上讀來的不一樣，大概就是百聞不如一見吧。那次訪問的印象大概與當時其他保釣團的人相差並不太遠。覺得大陸上人民的基本生活雖然還算過的去，但是宣傳中所謂社會主義新的精神面貌却見不到。另外文革時那種搞法的毛病也可看出一點。這也是引導出七六年寫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的原因之一。當時我們訪問團成員間意見並不一致，團員之間經常有嚴肅的辯論並向陪同人員提出了很多的問題。

七八年回去正好碰到鄧小平剛上台，「撥亂反正」期間剛開始，雖然有很多地方還是沒有上軌道，但是整個情形較活躍。並且此次去是與洛杉磯的一些專業人員合組一團，目的不在參觀訪問，而在科技交流接觸的大部是國內的專業人員，去過中山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的一些研究所做學術交流。

八一年則去得較長，是在北京大學教了三個月的書。住在校園裏面，與大學的師生經常在一起，蠻有意思的。那次去，時候也碰得正好，我是八一年二月去的，而八〇年冬天北大学生剛剛發動了一次人大代表的選舉，學生參與的很多也很熱烈。他們把政見政綱貼滿牆上，學生中飯時邊吃邊看邊討論。校園裏的民主氣氛很濃。我去北大時還感到這種氣氛的餘味。後來接觸到幾位鼓吹民主的活躍份子，不但思想開放，而且相當有氣魄，他們給我的印象增強了我們中國未來的希望。

我留在北大期間，剛好碰上「苦戀」事件，大概是在四月吧，「解放軍報」登了一篇批「苦戀」的文章，由「北京日報」轉載。當天，北大学生馬上作出反應。有人把當日「北京日報」貼在佈告板上，在旁邊寫了很多批語。我還記得其中一條是「與《批海瑞罷官》何其相似也！」，接著學生又要求「解放軍報」的編轉，「苦戀」的批判者與「苦戀」的作者白樺到北大來舉行一場公開的辯論。這要求雖然沒有成功，但北大学生自己舉行了好幾次反對批「苦戀」的討論會，辦黑板報，熱情很高。看到這種情形，我心裏有一點感觸；不管在臺灣海峽的那一邊總有一批可愛的年輕人，肯為正義而奮鬥的！

問：請談談對中國這些年局勢變動的情形，你對中國認識變動的情形及對中國局勢前景的看法。

答：我對於從七八年以來的改革是十分贊成。這並不是說，現在做的就百分之百對，但大方向是不錯的。我個人覺得社會主義的理想很好，但在建國初期的二、三十年裏做的事情並不完全符合社會主義，有些東西，說得難聽些，甚至跟社會主義精神背道而馳。譬如說對人的思想改造應以改變客觀環境的辦法來進行，而不應靠空洞的宣傳和行政命令不顧客觀條件而強行對人做不實際的要求是不符合唯物主義原則的。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應該是非常尊重人的尊嚴和權利。正因如此馬克思才反對少數人通過控制生產資料的辦法去勞役其他人。但在建國初期之二、三十年有很多辦事方法是採取軍事管理方法。這如僅為一時權宜之計還說得過去。但是後來却將這種軍事手段制度化。不但如此，還將其說成是社會主義該有的樣子。如果有人要求改變這種管理辦法，就會被說成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認為這種講法完全錯誤，使人對社會主義失去興趣。這些人搞這一套只是為了統治方面而不是真正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原則。現在這些錯誤想法有許多已經被扭轉過來，改革帶來了很大的進步。第一：現在做事情比較重視客觀規律，不再亂套教條，比較符合唯物主義的原則。第二，改革的客觀效果是將人民生活改善，生活水平上升，並充實了國家的力量。第三，現在對意識形態的控制較為放鬆很多。這一點是應該的，如果你講的正確，有說服力，別人自然而然會相信，否則強迫也是強迫不來的。而且，生活在一百年前的馬克思和列寧，他們並沒有經驗到現代化的工業發展，如果要完全依靠他們的著作來解決現代中國面臨的問題是不可能的。這一點國內也考慮到，現在推行的經濟改革是很好的。目前急待建立的是一套促進中國現代化的經濟體制及管理制度：第一點考慮是如何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第二點要考慮人民的真正經濟生活是上升還是下降？第三點對以後長期發展是否有利？這些問題都

是很複雜的，需要以比較精細的方法根據客觀情況慢慢摸索出一條道路。如何在現代工業之基礎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前人從未走過的路。現在進行的這些嘗試是相當令人興奮，打破了過去很多不敢碰的禁區。現在的經濟改革是順應人民要求順應時代需要。從這幾年取得的成績來看，這些改革進行得相當有技巧似乎很有步驟。當然這也不是說前途就沒有問題。

問：很多人擔心的是社會主義的理想是否會在經濟改革中被拋棄而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去。

答：這當然是一個很值得關心的問題。近年國內的一些宣傳確實非常混亂，例如前兩年非常強調萬元戶，給人一種印象：發財致富第一優先！與浩然小說「金光大道」中所述正好背道而馳。事實上也不是真有那麼多萬元戶。這有點像大躍進時的高產田。宣傳萬元戶只是為了地方上吹捧其經濟改革的成功。這種宣傳的調調是不對的。只有使人眼睛只看到利潤。比較正確的做法是宣傳某個地區因為生產提高後帶來經濟發展的具體效果。人民的生活在那些方面有具體的改變：譬如說道路改善了，學校建設好了或是人民之平均收入增加等等，而不該片面強調萬元戶。當然最近一兩年也沒有再強調萬元戶了。但由此例還是可見幹部的思想還有相當的混亂。但我個人並不認為大方向有什麼問題。許多思想的混亂主要是宣傳機器不靈光，那是宣傳工作做得差的問題而不是決策的高層要向資本主義走。

我這樣相信的理由在於對下面一些基本問題的看法。我認為在過去建國初期的二、三十年將社會主義定的太死了。譬如在五十年代初期將所有私營工商業經所謂「社會主義改造」一下子完全取消結果造成了現在很多問題。私營企業在社會主義階段裏是否容許存在呢？我個人相信即使走回去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見為準，他們也沒有說在革命後要馬上取消私營企業。他們在著作中屢次提到由私營向公營過渡的具體辦法；例如通過稅收由國家銀行

控制貸款，國家控制原料市場，限制遺產繼承及建立產業軍等辦法來與私營企業競爭。這就表示他們允許私營企業的長期存在。

有人擔心中國在走回頭路，我認為沒有什麼走回頭路不走回頭路的問題。因為走路不但要看方向，還要看當時的處境。譬如你要從一個山頭走到另一個山頭，兩個山頭中間是深溝。你如果畢直走就要掉下深溝去；你可能必須找一條盤旋下山的路繞著山走然後才能走到對面山頭。所以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而不是倒退的問題。

我覺得以今天中國經濟的實際情形而言，私營企業仍然有其優點：第一，它有靈活性可以填補市場空缺。其次容許私有制可以鼓勵創業。當然像鋼鐵、石油等大企業應以公營為佳，但像廚房用具，小的器械，家用消費等沒有理由不可以開放給私營企業製造。舉個例子說，我八一年在北京因皮鞋太緊想買一鞋拔子，但就是買不到。如果開放私營企業，像鞋拔子這類東西一定很快就有人去造，馬上填補市場的空缺。所以我認為私營企業應多開放，尤其是小型的私營企業。假如擔心新的資產階級產生，造成兩極化呢？那可以用財政、稅則，企業管理條例等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來限制私人資本的擴展。我並不是說不要私營企業發展，而是在其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時慢慢加進公有的股份。譬如先增加員工的股份，等發展更大時再增加政府的股份，到最後政府可以擁有超過 51% 的控制股權。所以節制私人資本可以用種種技術的方法來解決。

問：我想這個問題你一定期待了很久，可否請你談談對中國統一與台灣獨立爭論的看法？

答：作為一個中國人總是希望中國是統一的。因為如果台灣成為另一獨立國家對中國是一長遠的損失。台灣有可能被別的國家利用，成為敵對中國的基地。再者，我相信現今世界的趨勢是趨向整合而不是分散。例如歐洲便是由共同市場走向聯邦的趨勢。所以就長遠來說我希望中國能統一起來。

但是不是台灣要馬上在行政上變為中國的一部份呢？我認為這在目前還辦不到。原因有幾點：第一，國共內爭仍在繼續；第二，兩個地方在政治上、經濟上及制度上皆有很大的差距。更大的一個顧慮是，中國大陸正在進行改革，目前最優先的考慮應是如何將中國的經濟搞好，建立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架構，這個工程已夠艱鉅的了，大陸的領導人即使全力以赴也還不一定能成功。在這個時候，台灣問題還是最好擱置。等變化中的中國局勢穩定後再實行統一。現在台灣有很多人是反對與中國大陸統一的，但是一旦大陸的四個現代化搞得有些眉目，內政修明，也許到時統一會變成水到渠成。

最後一個問題：保釣時廿五歲左右的年輕人現在大約是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了，展望將來，你有些什麼計劃。不論是關於個人，中國或是世界局勢，請隨意談談。

答：在西方社會，人到中年有所謂「中年危機」，而在現實社會裏，中年人的確會出現很多問題：可能要面對理想的破滅，婚姻的變化，對事業失去興趣等。我自己還沒有發生中年危機的問題，假

如把人分為樂觀派或悲觀派的話，則我是屬於樂觀派。而且自己對科學研究上還是有很大的興趣！而這是很花時間精力的事，目前我只能在與中國科研交流上盡一點力。其他的事只能以業餘的心情來注意了。其實我覺得在海峽兩岸的社會都在不斷的進步。在大陸上變化尤其顯著。最近做的體制改革相等於一次和平的革命，是歷史上的頭等大事。所以如有適當機會，希望自己能夠有參與的機會，為中國的現代化改革盡一己之力。

在海外的中國人裏，有適當訓練的高級知識份子雖然並不算少，但其中具備中國文化修養，對中國有強烈的認同感，又有奉獻精神的，那數目並不多。當年參加保釣的人，有不少人是符合這些條件。當然，當年保釣不一定現在還關心中國的事情。有些當年曾參與保釣的人士，很可能很灰心甚至心死也說不定。這也怪不得他們，是中國過去種種的錯誤使得他們失望。但保釣陣營中也有一部份人能夠經得起中國這些年政策反反覆覆所澆冷水的冷卻作用。這些人因為經歷多重的挫折而變得愈加堅毅，假如我們能夠把這批人結合起來，則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應該可以起很大的作用。這可以說是一個寶貴的人力資源，這個資源到目前還沒有被充份利用。

左：香港學生二月二十日在日本文化館前示威。(明報月刊1971.3) 右：十八日在日本領事館前示威。



台灣當前的 重大危機 與 解決之道

演講者：張春男
錄音整理：義法

本文是根據台灣黨外人士張春男先生三月十五日在紐約公開演講會（由「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及「台灣與世界」雜誌聯合主辦）摘要整理。因為張春男先生在演講後兩天即離開美國，本文未得他本人過目。

張春男先生在二月間，從台灣假道日本前往北京長期居住，以促進中共對台灣的認識，改進中共對台政策。在反共、恐共的氣氛下，張春男此行引起廣泛的注意。這個演講公開表達了張春男先生選擇這條道路的基本原因。

張春男在演講的前半部指出台灣當前的六大危機：1 國民黨製成第一顆原子彈，要用於內戰；2 核子爐發電廠，除了生態危險外，國民黨在必要時會引發核爆。張春男引述國民黨過去的前科——長沙大火，黃河決堤，說明國民黨什麼事都幹得出來；3 外匯存底私存國外，並且大舉外債，「債是台灣人欠的，存在銀行的錢是我要的」；4 資金外流，經濟走下坡；5 環境污染；6 道德沉淪。由於篇幅有限，張先生對這些危機生動的舉例與細緻的分析只能割愛。後半部演講亦作了些不得已的縮減，特此說明。

反對國民黨的兩股力量

國民黨在台灣做了這些事，當然有很多人反對他的。反對國民黨的力量，基本上有兩股。一股是代表台灣人民意的「黨外」，另一股是從前被國民黨凌辱了很久，但把國民黨趕到台灣去的中國人民與政府。但是這兩股力量現在都還各有問題，所以就讓國民黨問題一直延遲到現在都還沒解決，而且越延越烈。

第一股力量——黨外——被國民黨滲透分化

第一股力量是黨外，但是現在的黨外被國民黨刻意地滲透得很厲害，在高雄事件以前，國民黨對黨外的政策是採取高壓政策，有人敢反抗就被抓。這個政策的最高潮就在高雄事件，幾乎把黨外一網打盡。（只有我沒被抓到，但是一年後還是讓他抓進去了。）但是後來國民黨發現這種做法不切實際，因為台灣的黨外基本上本身並沒有什麼力量，而只是群眾力量的反應。把黨外抓掉了，但群眾的力量還在，它很快地又可以支持別人出來反抗國民黨。由此國民黨發現了這種政策只能使群眾更不喜歡他、更反抗他，黨外的力量更大，所以他就修改了政策，改變成用滲透的方法滲透到黨外裏面去。

「富堡之聲」案

從前國民黨也滲透黨外，但是他滲透的目的只是獲取情報以瞭解黨外的動態。現在他大量地滲透人進去黨外，用各種方法來操縱，使黨外不能團結，而且使黨外活動的方向偏離到對他比較沒有威脅的那個方向去。從前的黨外基本上絕對是反對國民黨的體制的。現在的黨外則被操縱到基本上比較偏向於在體制內改革的方向去。他操縱的方法有時候是很巧妙的。舉個例子來說，高雄事件以前有一段時間，國民黨不讓黨外辦雜誌。當時有一個人叫洪誌良。他有一本農業雜誌，不是政治性的。他就來找黨外，說願意把這份雜誌貢獻給黨外，共同辦。黨外喜出望外，如姚嘉文、陳菊、王拓、黃順興等都跟他合作，辦了那份「富堡之聲」——當時的唯一的一本黨外雜誌，批評國民黨也批評得很凶。

後來，洪誌良因為到大陸去，回來就被國民黨抓去了。之後就爆出一件事情，說洪誌良原來是跟黃信介講好要到大陸上去買鰻苗的，是「通匪」，是黃信介叫他去的，而黃信介又聯絡什麼黨外的「五人小組」做什麼「美麗島」，所以整個「美麗島」雜誌社就是個叛亂組織，因此把整個黨外一網打盡。洪誌良是關鍵性人物。

洪誌良是調查局的人！

洪誌良最近被放出來以後，幾個月前出了一本書，抖出當年的真象。他說他根本就是調查局的人。是國民黨叫他辦黨外雜誌的。那麼洪誌良為什麼要把這個事抖出來呢？因為洪誌良說：「這個戲是你們叫我演的，我一切都是聽命行事的。你判我五年也沒關係，反正是在演戲嘛！但是怎麼可以真地把我關五年？」所以他心裏很不高興，這個戲不能這樣演啊！因此他把整個內幕抖出來，說是要讓這件事情見陽光。結果，這本書一出來第一天就統統收回去。可是正好流露出一本，人家趕快拿來給我看，後來我就把這本書影印，送給黨外的雜誌去。由這件事情可以看出國民黨的滲透方法是很厲害的，幾乎是無孔不入。到現在來講，我們也沒有辦法知道到底有那幾個人是國民黨滲透進來的。要不是洪誌良自己講出來，到現在還有許許多多的雜誌一直把洪誌良當作黨外，以為他的奮鬥如何如何，沒有人會知道他原來是國民黨派來的。

國民黨控制雜誌、挑撥黨外

國民黨基本上絕對有能力操縱黨外，他的幾個措施是絕對有效的。比如說他禁書、禁雜誌（像我申請雜誌就從來不獲准，因為我是跟他為敵的）。那一本雜誌是真正對抗他的就禁掉，禁不掉就沒收。基本上他絕對有力量把他不喜歡的雜誌壓制掉，然後讓那些好像是站在黨外的立場，而實際上是對他有利的雜誌可以賣、可以流傳。他不直接控制，但只要是比較代表黨外立場的雜誌，他就搞得你沒辦法生存。而他在允許存在的雜誌中挑撥黨外。他想反正他的聲望已經夠壞了，再多罵幾句也不會造成多大損害，但是黨外一向聲譽很好，只要罵他一

點點，他就受不了。所以你看現在黨外的雜誌基本上就是這邊咬那邊、那邊咬這邊的情況。大家看得很失望說黨外為什麼變成這樣。其實這不能怪黨外，主要是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他絕對有辦法把你拉制成這個樣子的，不是黨外不爭氣。黨外還是在那邊埋頭苦幹的。

國民黨做票，扶植假黨外

第二個很有效的方法就是做票。一個人要冒頭來就必須在群眾中有聲望、有地位，而當選就是一個聲望與地位的象徵。國民黨可以將他不喜歡的人做票做掉，而讓一些他認為較沒有威脅的、或者基本上暗地裏跟他站在同一個立場的、或者基本上是明的跟他站在同一立場的人高票當選。比如說我們那裏的彰化縣長就是一個例子。他根本就是國民黨的黨友，但國民黨刻意地扶植他，讓這一類人來取代黨外，讓人家以為黨外本來就是跟國民黨合作的，反對國民黨的是沒有理性的黨外、偏激的黨外，但像彰化縣長就是理性型的黨外。現在台灣在國民黨的培養下有很多理性型的黨外漸漸地抬頭，連老康也漸漸地理性起來了。

國民黨這樣的操縱黨外，這樣地滲透黨外，使得黨外變成和過去不一樣，比較沒有力量。所以對於解決台灣問題來講，產生一種比較無力感。

海外台灣人社團也不合作

另外，在海外的台灣人，本來也是反對國民黨的一股很大的力量，但是我來到海外以後，聽說在海外的台灣人的社團沒有合作的情況，也很嚴重。這一點，一方面我感到很遺憾，但是另一方面我覺得這也是必然的。在一個運動中，因為種種因素（也許也有國民黨滲透的因素），意見的不同會造成種種分歧的現象。雖然這是個必然的現象，但也是個我們台灣人必須突破的現象。大家應取得一致的立場。有些不能調和的立場可以各走各的，但是在反國民黨方面應該要取得一致的合作。

綜觀海內外的台灣人的情況，反國民黨的勢力表面上看來是有相當的無力感，但是真象也不一定如此。因為國民黨自己力量一直消退、衰微，所以

原來恨他的人現在都比較敢表現出來。比如說最近的選舉或黨外活動，群眾參與的膽子比較大（參與的熱誠本來就很大），敢參與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了。這一點，基本上是一個好現象。

第二股力量——中國——採取不合理政策

其次，我要講到反國民黨的第二股力量，就是中國。中國這個國家原來是被國民黨蹂躪得很厲害的，所以他把國民黨趕到台灣去了。中國本來應該是反國民黨的一個很重要的力量，但是中國現在也沒有發揮很大的力量。主要的是因為中國現在採取了一種不合理的對台政策。中國原來是很希望能夠把國民黨解決掉的，但是長久以來沒有辦法，就漸漸產生了一種無力感。在這種無力感之下，他就想到一些不合理的方法出來。中國現在的對台政策，基本上就是「一國兩制」。——主要就是說中國本土跟台灣只要統一了，掛一個國旗，在同一個國號之下，台灣可以保持自己的政治、經濟制度，也可以保持自己的軍隊，中國不派軍隊來台灣，也不派政府官員來管台灣。

基本上這個「一國兩制」是個相當明智的政策，因為事實上，除了迷信以外，世界上沒有一種死硬的制度能夠適合各種不同的生活情況。中國原來被國民黨搞到幾乎要亡國的地步，在共產黨解放了中國大陸、國民黨走了以後，基本上那個時候整個中國是很悲慘的，可以說是人人吃不飽、年年餓死人。吃不飽、餓死人用話講起來就兩句話這麼簡單，但是實際上那中間產生的悲慘狀況是很多的。比如說，有些人餓到沒飯吃，什麼賣兒子、賣女兒啦，許多悲慘的事情都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接管了這樣一個地方，他必須把中國救活，所以他施行許多比較特殊的制度，真地就在這幾十年中把中國從瀕臨死亡的邊緣救回來，現在中國已經活起來了，活得好好地，再也沒有死亡的威脅。而且，中國這麼大的地方資源豐富，世界各國都想來侵略，中國必須在國防上能夠防衛自己。這一點長久以來中國都做不到，但是這幾十年的中間，中國共產黨做到了。現在，他基本上已經有全世界第三強的武力，可以不受美國或蘇聯的侵略，他已經有保護自己的能力。就把中國從死亡邊緣救回來跟

在國防上能自立這兩點來講，這幾十年中國施行的制度確實是有了偉大的成就。但是，話說回來，一個人快要死的時候，你讓他吃了一帖很好的藥，這是良藥，但是良藥通常不是美食。這套制度過去曾經發揮了那麼大的功能，但是它不一定適合在今天的台灣，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台灣的程度就比大陸進步了幾十年，是除了日本以外的亞洲最先進的地方，也就是說在亞洲，台灣是排第二位的。再加上美國為了要扶持在台灣的國民黨來對抗中國，又給了它許多美援，讓它經濟復甦，所以現在台灣的情況跟當年大陸的情況是有很大的差別，不能施行同樣的制度，中國的決策人員能看出這點而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確的想法。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但是，中國提出的「一國兩制」是要讓國民黨繼續統治台灣。這是一個非常錯誤、非常沒有道理的構想。

中國的任何一個人應該知道，國民黨在大陸的時候是如何地統治中國人。如果中國人覺得國民黨的統治是很舒服、很合理的，那麼當年就不應該如國民黨所講的那樣「叛亂」，把國民黨趕到台灣去。如果共產黨認為國民黨那套說話真實是很不應該、很不對的，那麼他就沒有權力叫台灣人繼續給國民黨統治。「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嘛！（聽眾鼓掌）

有些人為中國的對台政策提出一些解釋，這些解釋其實也沒有多大道理。我現在對幾個解釋提出來檢討一下。

一個解釋說，或許這只是策略吧！他心裏還是對台灣人好，要把台灣人解救出來的。這個也有道理，我想不只是「也許」，應該是這樣才對。但是，道理說回來，一千九百萬台灣同胞的前途幸福不應該是寄託在這個「也許」的基礎下，而是必須有明確的、肯定的保證才行。

另一個講法，台灣現在是給國民黨管的，不找國民黨談判要找誰呢？這個講起來好像也有道理，其實根本沒有道理。和談我是絕對贊成的，但是以台灣人繼續給國民黨管為條件，這個我是絕對反對的。

另外還有人說，要找台灣人談沒有對象。其實這也是不對的。中國政府如果要找台灣人談和平統一或合作，他是有台灣人可以談的。當然在台灣裏面的台灣人在國民黨控制下，是沒辦法跟他談。但是，在海外有許多台灣人的團體，事實上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代表台灣民意的。中國其實是可以跟這些人談或取得合作的。當然，找國民黨談，我也不反對，應該大家都談，但是不能犧牲台灣人，不能以台灣人繼續讓國民黨統治為條件，這是很重要。

組織流亡政府跟中國談

如果說海外的這些台灣人團體都不願意跟中國談、或者有的覺得這些團體沒有代表性，那麼中國還可以設法。我舉個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佔領了法國，法國淪陷了以後，有一個師長戴高樂就跑到英國去組織了一個流亡政府。如果中國有誠意要談台灣人談的話，我們台灣人也可以組織一個流亡政府跟中國談，其實那都是技術性的問題，只要方向抓正確了以後就可以做了。如果中國不反對的話，我其實很想聯合一些台灣在海外的同胞來組織一個流亡政府來跟中國談「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條件（聽眾鼓掌）（聽眾插問：為什麼一定要中國不反對？張回答因為我現在就要住到中國去跟他們談，如果他們反對的話，根本就不讓我出來，我就連做都不能做了，所以要他們同意才行。）

其實，中國讓台灣保持現在這種狀況是對中國很不利的。中國的領導階層如果比較明智的話，應該可以看到這些不利的。除了原子彈對中國會是個很大的麻煩以外，還有一個問題。

「不沉的航空母艦」受害將最大

國民黨從撤退到台灣以後，就把台灣提供為美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而且到現在還一直希望美國來把我們當成「不沉的航空母艦」。這「不沉的航空母艦」對台灣人來講是個很大的不利。為什麼？因為這個「不沉的航空母艦」是用來對抗中國的，萬一美國跟中國發生戰爭的話，台灣就成為享受炸彈的最可能的地方。因為「母艦」是個很重要的地方，中國即使不能把它炸沉，也要把它炸爛。

此時，台灣人所受的損害一定很大。反過來說，國民黨把台灣當成是反中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對中國來講也是一個很大的損害。國民黨從前一直說汪精衛是漢奸，但老實講，我不知道他們自己想到自己是什麼。他們明明是中國人，（台灣人有些人不承認是中國人，這個講起來多少還有幾分道理。）却跑到台灣來把台灣弄成是對抗祖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

支票抬頭應該給台灣人民

其實，要解決台灣問題、或國民黨問題、或中國的統一問題都很簡單，只是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沒想到。只要中國能夠提出確切的保證，提出的條件能夠讓台灣人接受，讓台灣人的心意、意願與中國連在一起，那麼國民黨不要幾天就倒了。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國民黨是自作孽。他到台灣以後為了要利用矛盾統治而在台灣創造省籍問題，利用外省人欺負台灣人，利用外省人統治台灣人，造成台灣人對外省人不滿，然後他再利用這種不滿而對那些也不喜歡他的外省人講：「二二八事件你們看到了哦！如果你們不支持我，讓台灣人翻起來了的話，我倒了，你們也遭殃。」所以這些外省人即使不喜歡國民黨，也不得不支持他，因為他們怕台灣人報復啊！國民黨是用這種巧妙的手段來統治台灣，這幾十年來享盡了利益。但這也等於自己在挖墳墓。因為當年他這樣做的時候，台灣的幾十萬軍隊是他從大陸上帶過來的，他可以利用這種省籍矛盾去統治。但是到了今天，台灣的軍隊已經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台灣人了，那些大陸來的兵都老了、退役了。現在國民黨又要另一套了。對中國說：「我有五十萬大軍，你來吧？要冒多大的損失，你自己要考慮一下。你要登陸起碼也得要幾倍的兵力，你的損失會有多少呢？」這樣讓中共心裏怕。然後又對台灣人講：「你們說我壞，我的兄弟還比我更壞。你們把我打倒，讓我那兄弟來，你們就知道了！到時候你就不要怨！」這樣，讓台灣人為了怕中國來統一而不得不支持國民黨。如果中國能夠提出讓台灣人覺得滿意的條件，讓台灣人瞭解，有確切的保證，那麼台灣人是願意心向祖國的。基本上，其實對中國來講已經很簡單，因為他開出的條件其實也不錯，他這個「一國兩制」的條件只要把一些細節

31

規定明確，讓台灣人覺得「這樣我們也不錯啊！」（舉個例子來講，將來有朝一日，中國提出來的條件可以讓許瑞豐先生他同意的話，那麼台灣人會覺得跟祖國站在一起是有利的）到那個時候，國民黨就成為黃順興所講的「空心菜」，只是個空架子。兵是台灣人的，真正要打戰的話，他們是不會站在他那邊的。在這種情況下，我想，不必等人家反對他，他就先拜「馬可仕」為師去了。他會先溜的，不會像馬可仕跑得那樣難看。

所以我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明智地把那張支票的抬頭由給國民黨而改為給台灣人民（聽衆鼓掌！）然後把一些細節跟台灣人好好地商討，取得確切的保證，那麼不要多久就整個台灣人都知道了，都會心向祖國。在那種情況下，國民黨問題也就解決了，也就沒有台灣問題、統一問題這些事了。

中國對台灣瞭解不夠

為什麼在中國方面的政策會弄得這麼差呢？我到那邊二十幾天以後，我有一個感覺：主要的是他們好像對台灣的情況瞭解得不夠。不知道台灣人到底有多討厭國民黨。他們只是從報章雜誌上看，以為台灣經濟發達啦，人民過得多好啦，多支持國民黨啦。其實這是不準確的，如果他肯派幾個「匪諜」到台灣去，那麼這種情況是很容易瞭解的。談到這個，我就想到，國民黨槍斃了那麼多匪諜，大部份是冤枉的。如果在台灣真有那麼多匪諜的話，大陸上不至於對台灣這麼不清楚。基於我剛剛的想法，我就覺得台灣實際上應該有人去中國跟他們溝通、聯絡、建立友誼，去提供他們意見，讓他們瞭解台灣的真象，就可以制定出對台灣有利的政策。

試開創另一條路

有些朋友不贊成我這樣做。不過現在可能好一點了，因為我跟大家溝通、講啊講的，基本上有個瞭解。從前，有些主張台灣獨立的朋友是不主張我到大陸上去的。當然，台灣為什麼會有人主張獨立？主要是因為二二八事件那個時候，中國政府——國民黨——來佔領台灣以後在台灣剝削台灣人，貪污吃錢、為非作歹，無所不為。在那個時候，台灣人起來反抗，發生了二二八事件。然後國民黨又利

用這個機會把台灣所有的領袖，不管有沒有參加二二八事件，一下子全部殺光，所以台灣人對「中國」這個東西覺得很心寒。說：「我們朝夕夢想的祖國原來是這個樣子的。」因此，產生了「台灣唯一的路只有獨立，不要跟中國連在一起」的念頭出來。所以，「台獨」基本上是為台灣同胞好的，這是應該予以肯定的。但是整個局勢發展到現在，獨立是不是唯一一條台灣人可以走的路，是要檢討的。是不是一定沒有別的路？如果中國一直對台灣惡意，那麼不得已時只有走這條路。但是基本上，現在的情形並不是這樣，以我到大陸上去跟他們談了二十幾天的感覺是，他們只是對台灣不瞭解，而不是不誠意。因為基本上共產黨跟台灣無仇無怨的，他們應該不會要把台灣人犧牲掉才對。所以我想，開創出另外一條路來，試試看。這就台灣人來講，應該是有必要的，在這個想法之下，我就決定在近期內到那邊去，比較長期地居住在那邊跟他們商討這個問題。

「中共怎麼統戰你？」

有人問我「他們是怎麼邀請你？怎麼統戰你？」老實講，都不是。講真話，我要去的時候還被他們拒絕呢，因為他們不知道我是阿貓阿狗，還聽說從前有些台灣人去那邊騙錢啦，做什麼啦，當然不會說台灣人都是好的。讓他們大陸那邊的有關單位

覺得說有些台灣人來實在也是很頭痛。他又不知道我這個人到底是怎麼樣。所以一開始的時候，他們根本就拒絕我去。後來說好說歹的，總算是答應我去了。但是也不是用什麼很隆重的接待來歡迎我。我去是自己買飛機票，從日本，一家六口大概買了五、六十萬日幣的飛機票，另外行李超重，中國民航還要拿我超重費，到北京機場，說得難聽一點，都沒有人理我的，所以，我不是受到統戰，或者受到他們邀請，要替他們講話，都不是。而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覺得這條路是應該走的。如果中國提出來的條件是能讓台灣人滿意的，我覺得統一沒什麼不好，而且是應該的。但是關鍵就在中國提出來的條件一定要讓台灣人滿意，這是很重要的。不能犧牲台灣人。

我到那邊去，老實講，生活也不太習慣。不過還有一點安慰，就是黃順興先生比我早到。我們兩個是不約而同，我也沒跟他說我要去，他也沒跟我說他要去。在日本的時候，我曾經打電話跟他聯絡，我也不敢跟他講我打算去那邊，他也不敢跟我說他打算去那邊，結果後來在大陸上遇到了，才互相說「原來你來這裏了！」我的安慰是，在那邊不會勢單力孤。（中略）如果中國的政策能夠改變成對台灣人比較有利的話，我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人來合作，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是我的希望。我的演講也差不多了，兩小時了，謝謝各位！（聽眾鼓掌！）

答問（摘要）

問：我不覺得張先生的努力與其他很多人的努力有何差別，中國方面絕對知道台灣人的意願的，但就是不願意台灣成為他的兄弟邦與他平起平坐。

答：中國方面的決策人員不是不瞭解台灣人的意願，而是不瞭解台灣的情勢及台灣人的心態。比如說，高雄事件當天，如果黨外有差不多一萬人的軍隊能夠立即空降在高雄，那麼有可能就在那次，整個台灣問題都解決。中國方面不知道台灣人多麼恨國民黨，他們不知道台灣人是有可能在某種情況下群起而攻，把國民黨一下子推翻的。我這次去不只是要去跟他們講台灣人的意願，而是要分析台灣的情況，讓他們知道台灣人是值得他們合作的。

問：我們有何理由相信共產黨只會使用武力而不會使用原子彈？為了台灣人民的利益，我們是否應該促成中共發表聲明放下武力？

答：原子彈的問題，中國早就宣佈絕對對任何一國先使用原子彈。別人不用，他就不用。能夠保證不先用已經是很好了。我難以想像中共會對台灣使用原子彈。如果宣佈完全不使用武力，那麼國民黨就永遠不跟他談判了，總要嚇嚇國民黨啊！

如果要我反應，我會這麼說的：由中國出兵是不切實際的，不如把飛機大砲借給台灣人，由台灣人來打國民黨比較好。

問：我是來自歐洲的台灣人。一九八〇年去過大陸，看到中山陵國民黨黨徽都保留，中國怎麼可能撇開國民黨而與台灣人談呢？

答：中國政策改變不容易，這是我瞭解的。也正因如此，我才要趕快去跟他們談。不是去向他們求情的，而是要分析事實給他們聽，說實際上他們與台灣人民合作才對中國比較有利。我覺得他們上了國民黨的當，國民黨私底下跟他們拋拋眼、談談，目的就在拖時間。暗地裏拼命做核子爐、原子彈。只要這些做成後，中國就對國民黨一點辦法都沒有，就更傷他的「大中國沙文主義」了。

改變是不易。但在台灣情況特殊。國民黨自己製造的省籍矛盾使得改變較有可能。

問：大陸上也有污染、造原子彈，問題是否比台灣嚴重？可能繼續分離、兩黨互相競爭、改進，壞兄弟變成好兄弟，還好些。

答：中國共產黨跟國民黨有一個很大的差別。中共是由極窮困的慘境慢慢掙扎至今的，他有很多缺點，是不可否認的。但他基本上是站在人民的利益立場去做事情的，而國民黨則是壓榨、欺負台灣人，準備不能撈就走的。兩者心態完全不同。現在

台灣需要的是美金，而非良藥。台灣的民主法制觀念發達，基本上能維持一個相當進步的政府。所以我贊成中共與台灣人合作，但分兩制，可以避免很多缺點。中共現在雖然基本上還落後，但是那是他們的家鄉，他們很認真在搞。

洪哲勝：你希望中共能夠接納你的意見，非常明確地向台灣人民保證他的「一國兩制」是非國民黨的，是要台灣人民能夠出頭的。但是，誰能夠給你保證呢？當年中共曾經向西藏人民保證多少年不會進軍，但必要的時候還是照樣進軍。我們認為除了台灣人民自己站起來、有自己的政府、國家、組織、武力、外交經驗，才能真正保證台灣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當主人，才能就自己的利益，來考慮與中共是分、是合。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這股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力量組織起來，在短期內，在可以防止中共干涉的情況下，把國民黨推翻，成立人民的政府。這樣做，台灣人民才真正能夠有保證。我希望你這方面多多考慮。

答：你剛才所說的「台灣人民要站起來」這與我意見一致。我在台灣選舉時常常用錄音帶播音說「有志氣的人團結起來！」之類的話。

如果一個政府真心、誠懇的話，他自己會去尋求一種能夠讓台灣人（包括洪兄在內）相信的保證方式，目前我不能代他向你提出保證。

西藏問題情況不同、方向相反。因為當年的西藏比不上中原、更落後、更悲慘，所有生活環境都落後很多。如果純粹就人民立場來看，中共派兵推翻其封建的統治集團是對西藏人民有利的。但是，台灣民智、教育、思想、經濟，一切都比大陸發達，中國沒有理由在「一國兩制」的保證下派兵攻打、佔領台灣。這個「保證」也就是我要努力的。

再者，台灣海峽的障礙，使中共出兵不易。何況他還要冒名譽上的損失、國際上的難看、軍事、財力的損失與種種，大可不必。

但，正如洪兄所說，台灣人要站起來，大家關心政治、關心國事，共同處理事情。

問：洪兄既是馬列主義者，應知世界上沒有「永達」，而是「辯證」的，沒什麼絕對的保證？「台獨」如果搞成，對台灣人民又有什麼樣的保證？再者，中共可以說：「洪兄，反正我一切的保證，你都不肯信嘛！那我就根本不保證。」那就很難了。

如果中共請張先生提個條件，那麼請問張先生要提個什麼樣的條件，才能保證你的保證一定相信你的保證？

答：我先答覆一點，然後再看洪兄你願意不願意就這個問題再跟他講一下。老實講，關於「保證」的事情，現在在我腦子裏還沒有一個比較確定的構想，而且這也不是我的問題，而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問題。這個保證不是只有我相信就好，要大多數台灣人能夠相信。所以我現在還不能提出一個保證的方法出來。將來也許我們可以尋求一種大家相信的方法。

洪兄是不是願意就這個問題跟他解釋一下，看你的立場如何？

洪答：剛才×××兄用高深的「辯證法」要來跟我討論這個問題，我認為也許太過份。剛才張先生講，一千九百萬人民的前途難道可以放在一個國家的「也許」上嗎？我們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者的變遷，並不是由民主產生，也不是由全國的民主產生，也不是由無產階級的民主產生，而是由看誰抓到誰。如果早幾年張先生去中國大陸，他可能是跟江青講話，江青也可以跟你說她保證什麼什麼。更早以前也許周恩來也可以給你保證什麼什麼。我們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領導人的變遷是一個非常沒有辦法保證的保證。不管他怎麼保證，都是個很大的「也許」、「也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我們台灣人，我們的父親這一輩，根本不要中華民國任何的保證，我們無條件地歡迎他來，我們一片赤子之心期待祖國來，結果呢？二二八，我們看到全世界有這麼多的被統治的人民一個一個地站起來，一個一個地為他們的獨立而奮鬥，而最後成功。記得我在讀中學的時候，非洲只有五、六個獨立國家，現在已有三十幾個。當時如果我們去問

那些黑人，「你們運動有沒有什麼把握？」他們一定也認為沒有什麼把握。他們大概也有一些人想要跟他們的宗主國搞一些什麼關係，然後不明不白地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來個「一國兩制」之類的東西。我們認為那都是沒有把握的，我並不是說他一定會吃你，但是你就把你的希望放在一個「也許」上。我認為一千九百萬人民不可以這樣做。那麼，剛才張先生講得很好，他說：「我們台灣人民對中國人民無冤無仇，我們沒有什麼理由要痛恨中國人民。」我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十幾年，我一直這樣講，我也一直向中國方面的人表面說，我們毫無意思要主動跟你對立。當你得到的一個結論是說：中國現在最好跟台灣人民合作。我認為到某種程度上，我也可以同意。但是，什麼叫做「合作」？怎麼樣的「合作」呢？是對等的合作呢？還是你高我下的合作呢？還是你主我從的合作呢？我認為應該是對等的合作。中國共產黨或中國人民今天如果真正有誠意要跟台灣人民合作的話，只有一條路——支持台灣革命，支持台灣革命的自決主張。如果在台灣人民為了擺脫三百多年的外來統治而奮鬥的過程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向台灣人民用行動表示他們的支援，我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講，這是最好的保證，台灣人民站起來了、台灣人民有自己的政府了，到時候要不要統一？要不要再繼續維持獨立下來？這是那時候人民政府可以考慮的事情。但是，我再強調一次，不是今天，因為今天我們就毫無把握，我們就只能把一千九百萬人民寄望在也許鄧小平給你講的保證上面，而這保證不能算數。

張再答：我對洪先生覺得有一點很遺憾的，就是你為什麼不回到台灣去選舉呢？像你這樣的演講天才，如果在台灣的話，那群眾都會瘋狂的啦！當然洪先生講的是發自他內心的，很真誠的一套理想。但是政治這個東西往往是許多現實因素的結合，不一定是根據個人主觀的願望。如果說我跟洪先生有什麼不同？我想我跟他愛台灣這點精神上，應該都是相同的，但是「如何去做」，可能洪先生比較根據自己的理想去發揮，而我是比較冷靜地觀察客觀形勢，試圖為台灣人找出一條比較容易走、而且比較很快地可以走成功的這種路，希望能夠很快地找到一條大家都可以接受、可以幸福的路。可能差別只有在這裏吧？

34

問：你剛剛講黨外勢力怎麼大、人民恨國民黨恨得怎麼厲害。我是討厭國民黨。但是我不太相信說老百姓真正是恨國民黨恨得那麼厲害，而且不相信台灣是一定要搞革命的，我看老百姓不會贊成。軍隊裏也不是那麼簡單。

答：台灣的群眾是不是真的那麼反對國民黨呢？這需要講明。是那麼反對國民黨，是那麼恨國民黨。

再問：反對的話，是要獨立呢？還是要親中國？這要分清楚。

再答：老實講，在台灣的知識份子比較有去講說應該獨立還是應該要統一這類問題。如果就一般群眾來講，大致上的願望可以用鄧小平的一句話來講，就是說「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耗子的就是好貓。」就是說，不管獨立、不管統一，只要能夠趕快把國民黨趕跑的就好。因為一般群眾很少會去注意到這個問題。到底獨立以後會如何好或如何不好，到底統一以後會如何好，如何不好。因為國民黨雖然一再地宣傳共產黨如何不好，但是群眾因為聽國民黨說說說多了，也不太相信國民黨說的，所以一般人總是覺得說趕快把國民黨弄走，天下間大概很少有像這麼不好的政權。但是群眾是真正地相當表現出有力量。而且恨國民黨。我們可以從每次選舉的情況去看。每次選舉，黨外的那種幾萬人的場面設計沒什麼稀奇。經常是幾萬、而且不只是聽，還熱烈地反應，熱烈地參與。而國民黨的候選人呢？如果有一、兩百個人，那就算很多了。舉個例子來講，國民黨個人的政見發表會如果有像今天在場的這樣多人的話，那麼人不算少了。但是我有史以來，我的政見發表會絕對沒有人像這樣少過的，不可能的。在稍微大一點的地方，動不動就是上萬人、或者幾萬人。而且反應是非常熱烈的。如果你去仔細觀察的話，你就可以知道台灣的那種民氣是已經到這種程度，不是沒有，是絕對地非常反對國民黨。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問：美國國務院及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都指出台灣的民權比大陸好。一般都認為這個準確性比較夠，你現在拼命主張台灣的民主運動，但是在大陸的民主運動，你是怎麼一個看法？你是不是以兩重標準去衡量其他的事情？

答：首先我要說明一件事情，就是說，美國的人權報告是刻意地在掩護國民黨。因為我們在台灣看到很多事情，美國政府的那種講法都是輕輕一筆帶過。大陸上的人權如果說不好的話，比較多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社會原來是那麼落後，整個問題都在如何活下來，至於人權那方面，事實上是還沒有發展得很好，這個是真的。但台灣不一樣，台灣是國民黨刻意地去蹂躪人權，為了他的統治，刻意地違法去做，這與大陸方面形成的原因是不一樣的，至於說到大陸的民主運動的本質，老實講，我還不太清楚，因為大陸那麼大，他的一切消息相當閉鎖，我還沒有得到比較多的資料。另外，我比較無能。我覺得台灣這種現況，這麼不好，我幾乎把全部的、絕大部份的精力都投在台灣問題上面，我都還這麼沒有成就，所以我就沒有多少時間去處理大陸的民主運動的問題。以我個人來講，大陸那麼大，即使鄧小平說：「老兄，你來接吧！」我都不敢保證我搞得比他好，不是不敢保證，我是敢保證我搞得比他不好。所以關於大陸的問題，我必須在這裏承認我自己還是比較不懂、比較無知，基本上我是支持任何地方能夠走向民主化的途徑。但是我個人能力、精神、時間都有限，老實講，我在大陸民主運動的研究跟貢獻都很少、研究是很少，貢獻到現在為止，完全等於零，將來也許多少會有一點貢獻也說不定，到現在為止，這點很抱歉，我必須自己承認這點。

台灣社會

不動員性

之研究

南方朔

（一）社會不動員：台灣民主運動的處境

具有激進內涵的社會或政治運動——包括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革命運動、民主運動，以及資本主義成熟國家的異議運動等，從本世紀五〇年代起，以至八十年代，均普遍面臨「社會不動員」（Social Immobilism）或「政治不行動」（Political Inactivity）的困境。

因此，前法屬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領袖及理論家法農（Frantz Fanon）稱：「歷史清楚的告訴我們，反抗殖民主義的鬥爭並不是沿著民族主義直線前進的。……由於受教育階級的無所準備。他們和大眾缺少實質的聯繫，他們的怠惰，甚至於他們在戰鬥的決定性時刻的怯懦，都使得悲劇因而產生。……民族意識本來應該是全民內心最深處希望的

結晶，本來應該是人民動員的當下而最明顯的結果，實際上却成了一種空虛的殼子，一齣粗糙而脆弱的鬧劇。……這種步調的倒退以及它所造成的軟弱及嚴重危機，乃是民族中產階級未能思索人民行動所造成的歷史性結果，它也是民族中產階級知識怠惰、精神貧乏，以及都會心態的結果。」法國的夏里昂（Gerard Chaliand）認為第三世界的革命運動，「都市中產階級被整合到體制中，工人仍然缺乏階級意識，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都被認為是邊緣人，這造成了政治不動員的持續不變。第三世界的革命潛力已被過份高估，革命意識型態的可能角色被人們太過強調，但該意識型態被移植的社會環境却缺少適當的評估。」不僅第三世界的革命運動遭挫，各國的民主和異議運動亦普遍敗北。美國大學教授白慕德（Amos Perlmutter）指出，在經濟發展已有雛型規模的現代威權主義國家，其

威權主義並不會發展為多元主義。挑戰團體不可能從事有效的社會動員。相反的是，社會動員被現代威權主義國家的國家精英所限制。威權主義國家權力於將本身建制化，用以合法化及維繫它自己。社會動員的能力被國家精英取得，用以摧毀國家體系之外的政治及社會經濟權力中心。

社會不動員和政治不行動，在資本主義成熟國家亦然。米爾斯（C. Wright Mills）認為自由派的中產市民階級已有「猶豫不決崇拜症」。他稱：「自由主義是一組明顯的觀念，它曾是西方入世傳統的主要部份。自由主義也是一種政治高調，它曾是上升的中產階級的意識型態。自由主義亦為一種社會理論，它描繪了中產階級的英雄時代，這幾點是緊密相連的。作為觀念的承載工具，自由主義業已和任何站得住腳的現代社會理論脫節。它已不再是一種能為指引人們未來的有用指標。……自由主義成了一個很好的面具，被那些沒有、以及不能、或者不願實現其理想的人拿來作為藉口。……在這種情況下，職業性的自由派遂經常產生猶豫不決崇拜症」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亦稱：「技術建造了新而更有效、更快樂的社會控制和社會團結，在技術的媒介下，文化、政治、經濟等混合成一個萬能體系，吞噬及排除所有其他選擇。體系的生產力及生產潛能安定了社會，並在支配結構中包含了技術進步，技術理性變成政治理性。舒適、順坦、合理、民主的不自由，在進步的工業文明中蔓延，吞噬了思想獨立的政治抗議權利。」「反抗雖然仍然存在，但它對現狀已不再是否定的，而是實用行為主義的一種儀式，它是無害的否定，被現狀消化為無害的健康食品。」

運動的停滯、無效、或者無力，所顯示的社會不動員，在台灣也似乎同樣的存在著。在台灣，近廿年來，國民黨候選人在選舉中一向恒定的掌握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得票率，而民主運動者的得票率則非但未穩定成長，反而有了倒退的趨向。如果我們提出「票源凝聚力」的量化指標，將其定義為「民主運動者得票率在非國民黨得票率中所佔的比率」，則我們便能發現，最近十二年民主運動的成績單在「高雄事件」後即告負成長，以台北市增額立

委選舉為例，民國六十一年「票源凝聚力」指數為百分之五三點六三，民國六十四年為百分之三六點四四，民國六十九年為百分之八一點二一，民國七十二年為百分之六七點五九。由票源的凝聚力的不穩定及倒退，可見社會不動員的現象確實存在。

除了「票源凝聚力」這個指標之外，由民主運動者最近兩三年來普遍呈現出來的無力感，以及台灣政論雜誌市場始終停滯不進，「意見性」取向始終不彰等參考指標，亦同樣可以參證社會不動員現象的存在。因此，對台灣民主運動所面臨的社會不動員困境，有加以探討的價值。

（二）概念與定義

運動的停滯或挫敗乃是「社會不動員」這個概念的發生源起。運動的停滯或挫敗，使得以往左翼相信不疑的階級運動規律遭到懷疑；也使以往人們普遍相信的威權主義國家將會逐漸解體，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走向民主多元主義的理論受到挑戰。因此，「社會不動員」的概念有著現實主義的傾向。

「社會不動員」乃相對於「社會動員」而產生的。運動之社會動員又有兩個附屬概念，即「獻身的活性化」（Activation of Commitment）和「獻身意願的創造」（Creation of Commitment），前者指將已有獻身意願者凝結並成為運動，後者則指使低度準備的人接受獻身的認識而形成獻身意願。有關社會動員及不動員之理論探討，行為科學者以往強調了集體行為的非理性因素，對運動的過程發展並不能詳細捕捉。晚近以來，行為科學發展發展的結構功能論者如古爾（Ted Robert Gurr）、柯比（Walter Korpi）等則創造了以「心理學」為主幹的諸如「相對剝削模式」（Relative Deprivation Model）、「權力資源的控制模式」（Model of Control of Power Resources）、「功利主義侵略動機論」（Model of Utilitarian Incentive for Aggression）等解釋模式，心理學者相信多元社會之共識可以達成，而消除種種不滿運動，最典型的例子可以古爾提出的「被阻礙的機會之假設」為例，他認為只要社會保持機會之開放

，儘管達成機會的路途崎嶇坎坷，但機會之開放却可給人希望，因而使不滿減少。近代比較政治學者普遍的以此為基調。此種觀點在階級決定論不能解釋社會不動員現象之後出現，以心理論代替階級論，它固然對若干邊際性的運動有解釋力，但對運動的技術性問題似乎仍缺乏解釋的功效。甘姆森（William A. Gamson）在分析近代抗議運動後指出，對於社會抗議的種種多元主義的解釋觀點都有著重大的瑕疵，除了心理論的問題外，既有的權力體對運動的鎮壓和滲透等手段絕不能加以忽視。

有關既有的勢力，動員其黨和國家機構的資源，形成「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以國家機器作為「壓制機器」（Repressive Apparatus）或「意識型態機器」（Ideological Apparatus），用以解釋運動的社會動員性，在歐美六〇年代學生抗議運動挫敗後，隨著阿圖色（Louis Althusser）、波南札斯（Nicos Poulantzas）、格拉姆（Antonio Gramsci）等觀點而開始被人廣泛討論。社會不動員現象，由國家機器支配性的「操縱——說服」（Manipulation Persuasion）霸權，遂獲得另一層次的解釋。國家的壓迫及說服等功能，從而更突顯而出。六〇年代，各類運動在世界各種類型的國家普遍發生，絕大多數的命運均歸於失敗，運動和當權者的衝突與鎮壓，使得運動在後期均面臨了後備動員部隊缺乏的困境，對於運動的失敗，結構功能論者普遍根據「成王敗寇」、「成功的論其成功的原因，失敗的論其失敗的原因」的心態來評析運動失敗的原因，却對國家機器的鎮制等因素略而不論，此種缺陷目前由於對國家機器的本質已有了更多認識，因而獲得改善。

對於運動的社會不動員，在理論的探討上，必須將挑戰團體及既有權力體系雙方的互動關係作對等的看待。挑戰者必須對群眾作「獻身意願的創造」，使群眾對規範價值有新的期待，而後始克促使「獻身的活性化」，使群眾的期待增強、使群眾相信能獲得較高或極高的「利益——成本比」。而既有權力體系則必然發動其一切可利用資源的動員，以物理或心理的力量摧毀挑戰團體的中心，改善其「政績」（Performance）以增強其合法性，使群

眾相信獻身的結果將付出較大的成本和極少的利益。也就是說，挑戰者所為，乃是在創造社會動員；既有權力體系所為，乃是在創造社會不動員。

（三）台灣社會不動員的解釋模式

台灣的社會經濟體制，就其生產力的分配而言，乃「國有主義與資本主義混合型」，但就實際操作而言，則係「國家資本主義支配體制」，重要獨佔事業半皆公營，銀行金融亦由官方佔絕對支配性地位。重要之工商業及金融銀行業，凡非公營者，亦均被納入其支配體系之內，以特權方式特許給外國資本或台灣之民間資本。以一九七九年計，台灣之公營企業及民營一百家大企業，兩者合計即達台灣國民總生產的百分之五十六點八，其支配性格之強勁由此可見。

由台灣社會經濟體質之分析，台灣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主導，將重要之僑外資及台灣民間資本納入支配體系，發展出出口導向的經濟體質。從靜態結構而言，它和日據時期殖民經濟結構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均由少數受國家支配的集團控制了主要的經濟活動，其餘的生產者則告零細化，日據時期為小農的零細化，目前的台灣則是小農及其他工商業的零細化。從靜態結構觀點而論，這樣的結構將有助於社會及政治運動的展開，但實際上却非如此。戰後台灣要求民主的重要民主運動，如雷震時代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如蕭孟能時代的「文星」月刊，如許信良及張俊宏、陳鼓應等人的「大學雜誌」以迄「美麗島」月刊，挑戰的團體或挑戰團體的發動人，幾乎盡皆來自支配結構之內，而非發生於支配結構之外，復以台灣民主運動一再受挫，在在顯示出台灣社會不動員性格之嚴重，而這種不動員的性格是和台灣社會經濟結構條件相違背的。

由民主運動之遲滯不進和不能反映台灣社會經濟的結構，顯示出台灣無論在官方的社會控制或民主運動的本身發展上，必有其特殊的原因。將社會的動員或不動員視為既有勢力和挑戰勢力的推拉關係，比較雙方的推拉力量，將有助於了解台灣社會不動員性格的來源。

台灣的社會經濟體制由國家資本主義為支配中心，這種支配體制乃是政治威權主義之延長。政治威權主義由黨—國家—平行及輔助機構的等邊三角形所組成，三者完整的混合，構成了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完全絕對的「霸權」地位。所謂的平行及輔助機構，包括了憲兵、警察、青年動員機構，以及其他動員性機構，如會社團體等。台灣的威權主義體制，包括了垂直性的及水平性的完全支配，這樣的體制，以它實質上的及潛在性的功能，扮演著極重要的懲罰性角色，對運動初期的「獻身意願的創造」發生了阻止的作用。懲罰或潛在的懲罰可能性，使得心理上屬於「低度獻身意願者」在做獻身後果的考量時，會因「利益—成本」比值的縮小，而減弱其「功利動機」，戰後台灣的中產階級無法扮演民主運動創造者的角色，中產階級普遍與政治隔離，威權主義體制的直接懲罰或懲罰的可能性佔了極重要的地位。

然而，威權主義體制的等邊三角形結構中之平行與輔助機構並不可能作為唯一的工具，懲罰或懲罰的可能性在整個社會控制中，其功能仍然是消極的。史邁塞（Neil J. Smelser）在論及「容納價值導向運動之模式」（Madel for Containing Value-Oriented Movement）時稱：「為了分析價值導向之運動的命運，我們必須創造出一種模式述句。這種運動要怎麼樣才能和平的納入既存體系之中？它的被納入，包括了某些行為選項的選擇性關閉，以及其他行為選項的選擇性開放。在既有行政官署的這一方。它包括了四種行為：①排除未建制化敵意之表現。②消除對政權合法性的直接挑戰。③開放管道，讓規範改變的激情能和平的表達、討論被迫害之團體，則容許一種耐心而徹底的聽取反應。④嘗試將引起價值導向運動的緊張泉源予以減少。」上述四種行為，第一及第二表現的是「政治的有效率」，第三種則是「彈性」，第四種為「有反應力」。台灣權力體系藉著黨—國家—平行及輔助機構，懲罰與獎勵並用，政治的效率擴延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而在彈性方面，又能剛性與柔性並用，根據目的決定手段，高雄事件前對民主

運動予以激怒使其導向偏差的方向，當時在選舉時則以低姿態出現，以對比挑戰團體勢力新興所產生的狂瀾，充份顯示其社會控制的彈性。而在反應方面，既有權力體系已能透過細緻的社會操作，轉換若干的反抗形式。近十年來，台灣的民歌運動及鄉土文學，本質上均有著反抗的形式與內涵，但既有權力體系則能藉懲罰與獎勵，吸收其形式，而消除其內容。

台灣權力體系前述社會操縱的成功，最主要的依據除了它絕對的支配結構外，最主要的乃是戰後被納入美日經濟體系所造成的經濟繁榮和生活水準提高所致。生活水準的漸次提高，使得「政治資源競爭」被轉化為「消費資源競爭」，此其一。哥爾德（Thomas Baron Gold）在論及台灣經濟與民主運動時指出，戰後台灣的政治隔離使民主運動無法成長，而未能產生以外銷工業為基幹的民主呼聲，民主運動和社會經濟體制無對應的關係，復以國家在資本家與勞工間扮演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角色，因此遂能在引進僑外資，協助資本發展的過程中調和利益，未造成社會的解組和國家霸權的轉弱。政治的矛盾和經濟的矛盾未能連接，乃其主因。

哥爾德的現象描述，可堪探討者為政治矛盾和經濟矛盾相互分離之現象。除了政治的懲罰與懲罰的可能性外，台灣的社會經濟體制，對內部而言，有著少數官商資本聯合獨佔之特質，而外部則由六萬家所謂的中小企業進行游擊式的外銷作戰，這些在支配結構外圍的中產階級，由於它的外部競爭而非內部競爭，遂使其比較遠離由於台灣內部經濟資源競爭而產生不滿的可能性。台灣以出口為主的經濟體制，使得參與外部經濟的工商業者，和支配性的官商資本不發生資源競爭之衝突，足以說明台灣未產生以外銷業者為基幹的民主化呼聲。一九七〇年代，台灣的「大學雜誌」知識份子運動，有著代間衝突，政治資源競爭之意義，同時也有著以新興中產階級為主的民主化運動之涵意，但這種運動對官商資本支配完全未曾觸及，亦可印證上述的說法。

台灣的民主運動由於政治運動未曾對應社會經濟的構造，在生活水準的提高之下，既有權力者的

社會控制即更加輕易，挑戰團體的邊際利益成本比亦因下降。尤其在新興的「新技術官僚」(New Intelligentsia)出現後更為明顯。高德勒(Alvin. W. Gouldner)曾論說：「老官僚和新技術官僚，由於文化資本的不同，因而發展出不同的社會控制系統。老官僚的控制機器以命令和禁制為內容，威脅和處罰不服者及反抗者；但新階級則否，新階級的技術官僚精英，他們由於有能力增加物質和勞務的生產，他們的控制形式乃對能和他們齊一者給予獎勵，同時給予更多的物質誘因和教育灌輸。他們以任務為本和以工作為本，對自己的價值和未來有較多的自信，因此他們對自己的階層地位較少焦慮，也不容易非理性的將這種焦慮轉移給他人，基於此，他們比較不會作威作福，也沒有強烈的懲罰傾向。」「由於他們的文化資本生產力能夠增加社會剩餘價值，他們會願意增加社會福利的基金，也可能會在諸如利潤誘因及消費、職業安全等方面接受勞工的參與，但他們不會容忍工人控制，他們也不相信平等之論。」於是，一個不會變成多元主義的「現代威權主義國家」遂告形成。

(五)民主運動的邊際化與消費品化

台灣歷史上的民主運動，源起於日治時期的非武裝抗日運動，然而作為被殖民地的台灣，它不但在經濟體制成為日本之依賴國，它的反抗運動也和先進的日本等有著依賴的關係，反抗的此種依賴性，使得台灣知識份子缺乏了正確估量台灣實情的能力，而一逕奉先進國反抗運動的意識型態為主臬，反抗運動與社會體制失去對應關係，反抗運動形成過度的分化，人民陣線無法形成。這不但使運動分散、瓦解，同時也給予日本殖民政府據而操縱，加速其潰裂之機會。日本殖民政府官文書載：「就破壞文化協會之手段而言，若採取由外施壓之法，反將促其內部鞏固團結，故上上之策乃釀起其內訌，而使自然趨於潰裂」云云。日據時期台灣反抗運動之無力以迄潰裂，固與基本的侷限有關，但意見與行動之混亂與內部抵消，亦為重要原因。

戰後台灣的民主運動，面對既有權力體制的強大支配力，社會不動員之性格日漸加重，值得

注意的為：①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積極角色率皆由支配結構內的知識份子或政客所擔任，區域性之所謂「地方黨外」率皆為地方性之邊際人物或邊際畸零人口的代言人。政治民主化呼聲始終未與社會經濟結構對應。②民主運動之發展無法擺脫日治時期內部自相抵消之困境。八〇年代以來，民主運動的邊際化性格日深，成為「具有觀眾而無群眾」的困境。

台灣民主運動由於經濟矛盾藉著戰後出口貿易的擴張而紓解，新興以外貿為主的中產階級並不和台灣內部的社會經濟支配體制發生利益之衝突，彼等所盼望者不過是行政程序的方便，生活享受的提高等問題，面對強大的政治支配體系，意圖扮演挑戰者將付出絕大的機會成本，基於此，中產階級遂不易發展成民主的主要動力。台灣民主運動遂只能間竭性地由既有支配體系中的不滿知識份子及政客所發起，並結合邊際畸零人口而成，中產階級不能亦不願涉足其中，也正因此，民主運動遂無法在一定範圍內成長。不斷受挫後的激烈化，遂勢所難免，並演變為「排他性宗派團體」(Exclusive Sectarian Association)。郎氏夫婦(Kury Lang & Gladys E. Lang)稱：「結晶化而造成的群體感，組成了一種宗派團體，它是和既存社會秩序切開的團體，它的成員離棄了這個世界，他們據以建立自己小世界的團體精神，所根據的乃是敵意。宗派團體的重要事實是：它是和外在外者對立而產生的。所有的那些沒有被包含在宗派核心的都被排除。」似乎可作說明。

復次，台灣民主運動由於不能映照社會結構，因而在提出批判時就容易成為「武斷的否定性」(Artificial Negativity)，從而將運動推向「壞的無限性」(Bad Infinity)，運動的此種特質，使得民主運動成為大眾消費社會中的一種商品——一種可以滿足人們浪漫的好奇，但卻不會跟隨的商品。廿世紀大眾消費社會對運動的斷喪，探討得最透徹的應為吉特林(Todd Gitlin)，他指出：「在一個水銀燈照耀的社會，一個反抗運動想要在優勢支配文化下定義它自己及其世界觀，想要建立一個自我形成的文化建制上層結構，這已變成極端困難

或難以想像的工作。在業已集中化了的商業文化世界裏，製造意義的過程類似於勞工創造價值的過程。勞工創造貨物時，他們對製造了甚麼？如何製造？如何分配與使用，毫無置喙的餘地。這正如同意義的製造者，他們對大眾傳播媒體如何報導他們的所言所行，以及媒體的整個架構，一樣的無從置喙。」「面對一個急速就能享有盛名的世界所產生的誘惑與壓力，一個運動已失去了它證明及控制自己領袖的能力。成名乃是運動的一種政治資源，也是達到政治目標的一種手段，但它目前則已墜落成一種需要投資、囤積、戰鬥、或者放棄的個人資源。運動的領導者們，一開始就對自己的領導有著雙重感情，他們對自己的權威和義務感到異常難以掌握。追隨者需要領袖的領導，但同時又對領袖們的領導感到不安，他們將這種矛盾而混合的訊息傳給領導者，使得領導者的境遇難以自處。」相當貼切而可以描述台灣民主運動處境的這番陳述，具體而言，乃是：①運動本身已不能為自己創造意義，而係依據外界來賦予意義，所謂「外界」指的乃是它商品化後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導向性格。②成員對運動的了解，不依據本身的實踐參與和了解，而係依據惡性市場性格的好奇，運動的自動機能逐漸喪失，運動的領袖也無從根據自動機能產生，相反的是，真實的領袖也無法抵擋這種趨勢，而被迫在亂局中失去領導性與領導力。③運動的商品化和庸俗化，使它和群眾之間失去信任的鎖鍊，運動成為「群眾之海裏的孤島」，運動的品質趨降，群眾的不行動將更加嚴重。民主運動因而成為一個邊緣人的運動，任何運動所必須揭示的道德性和莊嚴性形象，均因此消失。這乃是運動的虛無化。

台灣民主運動自八〇年代以來，消費品化所造成的虛無化，使它的自然領袖相繼凋萎或處於凋萎狀態之中，支配結構中的不滿知識份子，支配結構外的中產階級與其疏離的程度似乎日增。一個失敗的運動有其悲劇性，而廿世紀的運動在台灣，則似乎只有鬧劇性。

（六）民主運動的轉變契機

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在格局上乃是戰後強大支配結構下的運動，強大的支配結構具有無比的擠壓

力和軟化力量，在這個條件下，民主運動的軟弱無力可謂乃是「結構決定」的，而決定的因素，綜上所述可以歸納為：

(A)既有權力支配結構的懲罰及潛在懲罰威脅，使得「動員意願的創造」和「獻身的活性化」，都會因成本高昂，而使人們基於「功利動機」而拒絕動員。

(B)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支配結構，在此支配結構中容納了少數財閥集團，支配結構之外則有零細化之趨勢，但零細化之中產階級工商業者都在出口導向的經濟下，向外部展開經濟資源的競爭，而非向支配結構競爭，經濟資源的競爭和政治資源的競爭不能合一。

(C)既有權力體制在「黨—國家—平行及輔助機構」的整合下，其支配層面不僅限於政治和經濟而已，乃是一完全支配結構，並藉著細緻的社會操縱，維持其霸權不墜。

(D)社會的操縱以及消費社會的商品化機能，使民主運動商品化和虛無化，運動的領袖，目標均告消失，民主運動邊緣化和虛無化。由於以往的支配結構為完全的威權主義體制，可以說乃是一個「全部或者一無所有的結構」，如果此支配結構繼續持續，在此「範型」(Paradigm)之下，民主運動殆亦不可能突破結構之決定性。不過，由台灣社會經濟體制之可能變化，此一階段的「範型」已有了改變的徵兆。

戰後台灣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的展開，乃是依賴美日中心國而成立的，在此展開的過程中，台灣因為成為半周邊國家而有了驚人的成長及繁榮，而同時在台灣內部則扶植民間資本。在八〇年代之間，整個開展的過程相當順利：①國家資本主義與民間資本能相互配合分工，由於民間資本尚未成長到足以抗衡國家資本之地步，兩者對立面並未突顯，反倒是共生面極為突出。②台灣的經濟體質並未衰老，因此在半周邊國家的競爭中留有良好的競爭能力。

然而，自八〇年代中期之後，上述情況似乎已有了轉變：

(A) 台灣的國家資本體制，由於政治的滲透（亦即官僚權位之分配）等因素之干擾，其效率日減、支配力日減，相對應的是民間資本的發達，已形成挑戰的力量及意願。一九八五年起，台灣大資本家如王永慶、高清愿、殷之浩等要求國營事業開放民營，可以視為原有支配結構內部經濟資源競爭的先兆。

(B) 在半周邊國家之中，中共已有了擠入的意願與助力，使得半周邊國家之競爭轉屬，而於此同時，台灣却已面臨資本累積的瓶頸，由目前的儲蓄太多而資本累積太緩，足見台灣資本升級之陣痛期已告出現，而於此同時，台灣對中國大陸轉口貿易日

增。在長期發展觀點而言，這種趨勢將有著下列可能性：台灣目前半周邊國家的地位已受到挑戰；外貿導向的中產階級有可能被整編入大陸經濟體制之中；如果強硬限制轉口貿易，則台灣中小企業之反噬即可能發生；由於目前台灣資本累積之瓶頸時期又恰為台灣政權移轉的危機時期，既有權力體系，由於體質日衰，台灣民間資本溢出政治支配結構之可能性遂告出現。

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資本家和國家支配結構已有了疏離的趨勢，民主運動自然也有了轉變的契機。民主運動和社會經濟結構不對應的關係，如果能審慎研究策略，當可獲得改善，如何與民間資本家結合，促成台灣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而同時又和中國大陸維持和平友善的共生關係，可能是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台灣民主運動的最大課題。

參考書目

1. Althusser, Louis,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 Carnoy, Martin, 1984,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 Chaliand, Gerard, 1977,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Viking Press.
4. Cheng, Ronald ye-Lin (ed.), 1973, *The Sociology of Revolution*,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5. Gamson, William A: 1975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Homewood, The Dorsey Press.
6. Gitlin, Todd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 Gold, Thomas Baron, 1981, *Development in Taiwan*, Ph.D Thesis of Harvard University.
8. Goldner, Alvin, W.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9. Gurr, Ted Robert, 1974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0. Marcuse, Herbert,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1. Muller, Edward N. 1979, *Aggress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2. Saunders, Peter, 1980, *Urban Politics*, London. Penguin Press.
13. Woddis, Jack, 1972 *New Theories of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4. 周偉康, 1979, 文化協會對策, 「春風」雜誌第一期, 台北。
15. 南民, 1985, 台灣的經濟危機: 國家資本主義的困境, 「九十年代」六月號, 香港。
16. 劉進慶, 1975, 戰後台灣經濟分析,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17. ——, 1985, 台灣的統治資本, 「台灣之將來」討論會論文。

比較台灣與中國 的少數民族政策

王平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少數民族政策可稱為「理想的」少數民族政策。

唯一理想的少數民族政策，即是沒有少數民族的政策。要達到這個理想境界，就是讓國境內所有少數民族，都依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自決、自治的目標。但是，由於現實國際政治的限制，加上國與國之間的紛爭，這種理想境界在目前無法達成。因此少數民族問題也無可避免成為二十世紀政治上的宿疾，間歇發作，不斷困擾著世界各國。

本文即是簡單介紹有關少數民族政策的理論，並進而分析台灣與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比較兩者之得失，庶幾能瞭解此一問題的複雜性。

一、兩種不同型態的少數民族政策

比較世界各國的少數民族政策，我們可大致將之分為兩個對立的類型，是即為「同化」(Assimilation)及「保存」(Conservation)。

「同化」政策

所謂同化，就是掌權的多數民族，經過立法的程序，以教育及傳播工具為媒介，儘量設法使少數民族在語言、文化，及生活方法上，向多數民族學習，使之與多數民族一致。像這種同化政策的例子，最典型的可見於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法國在法屬非洲殖民地及印支半島殖民地所採用的政策。它根據此政策設立法語學校、鼓勵土著改宗天主教，並接受法國式的生活方式及思想。同樣的同化政策，也可見諸於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在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及台灣所推行的「國語政策」(亦稱為皇民化運動)，即是努力促使少數民族在最短的時間內，被吸納、融合到多數民族中。

「保存」政策

與上述同化政策完全相反的，就是所謂「保存」的少數民族政策。保存政策，顧名思義就是儘量不干涉少數民族，使他們能保有自己的語言、文化

、風俗習慣。為了不讓多數民族侵入少數民族住居地，或是避免多數民族的文化侵蝕少數民族文化，因此當權的多數民族通過立法程序，制訂各種保護法、保護區，限制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的接觸。

採用保存政策的國家，可見諸目前美國對印第安土著民族的保留區政策，以及清朝政府在台灣限制漢番接觸，設立三中、紅線，以保護高山族的措施。

兩種政策各有優劣點

上述這兩種同化或保留政策，很難說是孰優孰劣。實際上，我們可說兩者各有優劣之點，就同化政策而言，其優點是可以使少數民族能儘快融合到主流社會（Main Stream Society）之中，讓少數民族成員能充分享受到該國的公民權，並在教育、法律、社會、就業等方面，與該國家的一般公民在平等基礎上競爭。而同化政策的缺點，則在於受同化政策影響下，少數民族會很快喪失固有的文化傳統。

同樣如果我們分析保存政策，也可以看出它所具有的優劣點。在保存政策的照顧下，少數民族得以藉各種保護法、保留地，及保障名額的措施，而享受特殊的待遇，並維持其語言、文化傳統。但這種政策的缺點也至為明顯。在保留區長大的兒童，經過特殊教育課程的訓練後，由於缺少對主流社會的瞭解，因此無法參與主流社會進行公平的競爭。這造成少數民族只能長期依賴特殊法案的保障，或遠居在保留區，如美國今日的印第安土著一般。

上述的這兩種少數民族政策，即同化與保存，代表著兩個極端的類型。在具體的政策上，世界各國大都依實際情況的需要，而揉和上述兩種政策，各取若干部份來塑造其特有的少數民族政策。就此而言，中國與台灣也不例外。中共的少數民族與國府一樣，都可說是介於同化與保存兩者之間。兩者主要差別是中共在具體措施上，偏向保存這一邊，而國府則偏向同化。下面就分別介紹國府及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

二、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

發展自馬列主義

從理論上說，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提出的統一戰線原則所發展出來的。其基本精神是在於爭取、聯合各少數民族，使他們積極參與現階段反抗殖民主義及資本主義的鬥爭，其具體作法，則是在於以提高少數民族政治上的自治權，及文化上的獨特性，來爭取他們參加反殖、反資統一戰線。由於中共、俄國都是按同一理論基礎出發，因此兩國的少數民族政策也大致相同。

從表面上看，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與蘇聯境內的少數民族一樣，充分受到各種保障及優待。在政治上，中共設立自治區、自治州及自治縣三種自治單位，讓少數民族能實行自治。在教育上，中共當局鼓勵少數民族地區推行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保持少數民族語言，並設立各種民族學院，專司培養少數民族知識份子、幹部，及技術人員之責。在文化上，中共當局鼓吹保持、提倡少數民族文化，在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中，派語言學家為其製造文字，並公開批評各種形式的大漢沙文主義，以消除漢人幹部、人民對少數民族的歧視。

矛盾也出自馬列主義本身

這種看似合理的少數民族政策，在理論上却有一基本矛盾，使其在實際推行時，無法達成預定的效果，而造成各種民族衝突。

這個理論上的基本矛盾，出自馬克思主義本身。馬克思在分析人類社會的進化過程時，認為人類社會曾經過原始公社、奴隸制度、封建農奴制等階段。中共理論家在將馬克思理論套到中國時，又加上了一個封建地主統治階段，以解釋中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狀況。既然馬克思將人類社會分成這幾種類別，那在應付少數民族時，中共當局也將這個演化階段套到少數民族頭上。

因此，根據馬克思的層階進步觀，目前中共當局對少數民族加以分類時，就有：一、原始公社制的獨龍族、怒族、景頗族等，為數約六、七十萬人。二、奴隸制社會，主要是四川地區的大、小涼山的彝族，人數約一百餘萬人。三、封建農奴制的藏族、傣族、哈尼族等，共四百餘萬人。四、封建地主制，即壯、回、維吾爾等，已達到漢族水平者，共三、四千萬人。

大漢沙文主義導致矛盾

根據馬克思的這種社會演化階段分類，既然這些屬於原始公社、奴隸制的社會，是屬於未開化、較落後的社會，因此就自然須要接受較先進的漢民族的「領導」。因此，雖然在表面上看中共當局有意要消除民族歧視及大漢沙文主義，並明文立法表示維護尊重少數民族，但民族歧視及大漢沙文主義却借馬克思主義之屍，而還魂到中共少數民族政策中。這種理論上前後矛盾的情形，很容易見諸於中共少數民族政策上。一方面，中共當局信誓旦旦，聲稱少數民族有權決定保持或修改其傳統宗教、風俗、語言文字，但另一方面却一口咬定：「少數民族地區落後的社會制度，嚴重束縛了各少數民族生產力的發展」（見中國少數民族一書 19 頁），在必要時可以用強制手段加以改變。這種情形，在中共當局以武力鎮壓藏族及喇嘛教上，明顯反映出來。因此，中國大陸上的少數民族雖然號稱有自治權，但這種所謂自治，是只有在符合中共當前利益及政策須要時，才能存在。倘使自治的措施與中共的利益或政策相衝突時，中共當局可以馬上打出反封建、反帝國主義、或階級鬥爭的大帽子，來化解自治的實質。

三、台灣的少數民族政策

偏向同化，但也保護

在上述同化與保存這兩種少數民族政策中，國

府在台灣所推行者，偏向於同化這一極端。但這並不是說國府並沒有同時採取一些保護性的措施及立法以維護山地同胞的利益。具體的例子，像是山地保留區，即是防止台灣土著受漢民族侵入而破壞其生活文化傳統的措施。另外，像單方面限制漢人進入保留區，而不限制山胞到平地，都是這種保護的措施。

也是承襲了中國的大漢沙文主義

不過除了這些保護性政策、措施之外，國府的少數民族政策還是以「同化、吸收」為主。就這一點而言，國府是承襲了傳統中國的大漢沙文主義。

為了加速「高山族」向漢文化的同化，國府當局並不鼓勵少數民族對本身固有語言、文化的認同。反之，國府的措施却是明白表示要改變山地風俗習慣，改善其衛生、教育、經濟條件，使得山地的狀況能逐漸達到平地的水平。其最後目的則是完全的同化，使少數民族與平地漢人一樣，具有同樣的社會地位及經濟條件。換言之，從國府的角度看，目前一些特殊的山地政策及保護措施，在本質上是屬於過渡性質，以便完成完全同化的目的。要達成這個目的的手段，則是以教育為主，包括推廣國語教育及國民教育。

實行時的兩個困難

從理論上來說，國府在台灣的少數民族政策也無可厚非。但在實行時，却有兩個難以克服的困難。其一，就是國府當局忽視了少數民族與多數民族的漢人社會之間，在經濟條件及文化水平的差距。由於這些差距，使得台灣所謂山地青年在教育、升學及就業上，無法與漢人競爭，因此只能集中於他人不屑的職業，如海員、礦工、妓女等。國府推行同化政策的第二個困難，則是未瞭解到在推行少數民族同化政策時，不但須要鼓勵少數民族接受主流社會的語言、文化，同時也須要教育主流社會的多數民族，即台灣的漢人，使他們不但不歧視逐漸同化的「異族」，更進一步去接納他們。單單促使少

數民族單向的同化是不夠的。民族同化有如結婚，須要兩邊的心甘情願及互相接納。不幸的是在台灣，由於少數民族在體質特徵上有異於漢人，因此遭受各種歧視，使他們無法完全參與主流社會。

在這兩重不利條件下，台灣的少數民族雖然快速的漢化，但卻無法達到完全同化的結果，而形成一特殊的社會階層。山地保留區的少數民族逐漸走向酗酒、犯罪的自毀型反社會行為。而到平地討生活的青少年土著族，則被圍困於特殊的社會角落中，過著不見天日的生活。

四、結語：

處理少數民族問題，是一吃力不討好的事。除非讓所有少數民族都自決、獨立，否則任何少數民族政策都會招致批評。在比較國府與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時，也可以看出這點傾向。這不表示國府或中共這兩個政權就此問題在本質上有什麼缺陷，或在政策上犯了什麼錯誤。少數民族問題在先天上就是一自我矛盾、自我否定的難題。如果台獨運動的理論家認為他們能避免大漢沙文主義的槽凹，發明出解決少數民族問題的萬靈丹，那就不妨公佈出來，以爭取少數民族對台獨運動的支持。

台灣土著族可能完全漢化

其次，從比較國府與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上，大致可以看出兩地少數民族可能走向的結局。台灣

的土著族由於不斷同化的結果，比較容易走上自然消失的道路。這個過程雖然會對台灣少數民族在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創傷。但由於少數民族已經在多方面嵌合到台灣漢人主流社會中，因此很難以提出分離、自決的要求。俗稱平埔番的台灣土著族，在十八、九世紀已逐漸漢化。同樣，所謂高山族的其他土著族，大概也會在未來幾個世代內完全漢化。

大陸的少數民族易發展出「地方民族主義」

在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雖然也在逐漸漢化，但由於中共當局有意保存少數民族固有語言、文化的措施，再加上自治區在地理上與主流社會分割，因此比較容易保存或發展出反抗性的民族意識，亦即中共官方所抨擊的「地方民族主義」。中共在五〇年代曾以武力壓制了西藏少數民族的自決、自治要求，並成功地在八〇年代化解過在維吾爾自治區的漢、維衝突。但隨著世界各地狂熱的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發展，在中國境內的回教信徒已逐漸形成一具有影響力的宗教民族體。漢、回衝突的升級，大概會逐漸成為中共處理少數民族事務官員的一項主要問題。

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除了都同樣強調「唯物」的社會、人生觀外，也同樣都反對民族主義。盧騷稱民族主義為：「文明社會中的野蠻人」，即最貼切的反映出這種態度。但在民族主義未能從人類社會自然消失之前，各國政權都無可避免地要應付此一問題，並承受對其政策的批評。

我們能為台灣

做什麼？

林景雲

一九七〇年離開台灣，來美求學定居之後，直到去年一九八五年，才有第一個機會回去。不同於許多利用短期回去探親、相親、做生意、或講學、開會的朋友，雖然是第一次，但却有一整年的停留。這一年，在工作之餘，幾位熱心的朋友，帶著我深深地參與了台灣島內正在生根、發芽、茁壯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剛開始，我抱著一種去看看，及必要時指導他們一下的心理參加，因為我一直以為留洋居住美國的人，在各方面一定比居住在台灣的人強。after all, 台灣是那樣的落後的地方，而美國則……。

第一次，我被邀請去一個非正式的家庭聚會，在一個教授的家裏，幾位大學生及社會工作人員，除了那位教授和另一位社工人員以外，其餘七、八個人全部沒有出過國境，但那天晚上他們所探討的問題，其理論層次之精博，對問題之了解，對社會之認識，與所舉一些可以付諸實行，及實行中可能預見的困難，在在都使我驚動得不能參加任何意見。我在美國太習慣與朋友們就理論與理想的層次，用假設的各種環境來思考台灣的問題，僅這一次小小的聚會，我已看出在美國關心台灣問題的朋友所面臨的困局。

台灣回來之後，一直有一副顯明的圖畫在我腦中反覆出現。那是一群被關在鐵籠內的人，正在努力凝聚一股團結的力量，要合力想辦法打開鐵籠。而鐵籠外也有一群熱心的人士，急著要將籠內的人放出來，但因為他們太急了，所以就拿火去燒籠子，想把籠子燒壞救出籠內的人來。

過去一年在台灣，特別是年底那一次省市議員選舉誓死戰的參與，使我深深體會撞破鐵籠一定要講究技術和策略，而不是放一把火把它燒光。選舉尚未開始，我就跟著黨外民主運動的朋友們，由最內部探討如何發揮後援會功能，如何籌募金錢，策劃內部工作，到邀請何人助選，研擬演講內容，一直到真正開火期間，穿著布鞋跑印刷廠，趕文宣，貼海報，發傳單，給候選人打氣，按摩……。我才發現我不再是旁觀者，採訪者或批評者，我在工作，在學習，在了解。

在那麼深入的參與之後，我忽然敢面對一個我一直不敢思考的問題：「我到底愛不愛台灣？」在國外的十五年，我一直在說：「我不是美國人，我是台灣人，我愛台灣，有一天我要回去（等孩子們長大了，可以安頓他們自己的時候。）」可是說老

實話，我有什麼回去的理由呢？每次朋友相聚，口中所談盡是過去在台灣生活、受教育、當兵、做事時所遭受的種種不舒服的窩囊氣。再加上報章雜誌，不斷提起，台灣政治的獨裁，特務的恐怖，經濟的惡化，道德的低落，空氣的污染，交通的混亂，生活水準之污染，化學毒品的散佈，官僚的腐爛，……，越氣越看，對台灣的印象越壞，壞到我有可能真正懷念著想回去生活嗎？

不知別人有沒有我自己特有的對家人的疏遠感？這層疏遠感也很強烈地阻止我回台灣去定居。實際生活和記憶中的家庭生活是沒有什麼親愛的感覺的，事實上父子、母子、兄弟姐妹之間，在我只有食、衣、住的關係。我上飛機的那一剎那，腦中閃過一個想法：「自由了！再也不回來這一塊無望的土地了。也不必每天面對權威似的父親和奴隸似的母親。」兄弟姐妹各過各的，逢年過節互道平安，寄寄卡片，却那裏有什麼不可分離的感情呢？這幾年經濟好些，父母也來美國住住，父親的權威雖已消失，母親的辛勞也不再顯現，但兩代之間不能相親，不能相通的感覺依然存在。那麼我有什麼理由放棄在美國這一片住起來舒適的地方，而回台灣去生活呢？

這一次台灣回來，我肯定了我愛台灣，我要回去定居，而且是現在，不是等兒女大了再回去。是的，台灣是很髒、很亂、很落後，政治非常不民主，特務非常可怕的地方，但這也就是我回去的理由啊！在那裏我有被需要的生命感，我更有一種為理想而奮鬥的真實感。這個奮鬥有那麼直接的生命財產危險的威脅，但也唯其如此，它更激發每一個工作者最大的智慧和能力，如何避免危險而達到目的，也就不會盲目地放一把火以為就能把問題解決了。

這一次回來美國，除了正在為回台定居做各種準備之外，我已經沒有什麼大興趣，在週末或假日，和朋友們聚在一起，放言天下大事。我比較會勸朋友們拿談、罵、批評的時間來做事。做什麼事呢？①培育下一代的社會觀和世界觀。大人沒有社會觀與世界觀則如何教育下一代呢？是不是可以從參與美國本土社會和政治做起。例如如火如荼的反南非隔離政策運動，我們有否關心？少數民族的權益運動，我們如何支援？環境保護的工作要如何進行

？如何支援？在美國長大的孩子們，將來多半不會和我們一樣認同台灣，如果不培育他們的世界觀、人權民主思想，我們這一代的努力，不只有一代嗎？

②用金錢或行動積極地支援現有的海外民主運動團體。但一定要講求策略，要非常了解台灣的情況，才好有所行動。例如省籍的問題就不是一句「外省豬」或「把他們趕走」就可以解決的。三十幾年來，台灣社會中，本省與外省的通婚，已經使得黨外民主運動人士意識到不再替國民黨，製造省籍的鴻溝。「中國結」、「台灣結」的爭辯，很快地被民主自決所取代。自決的時候，可能是獨立，也可能與中共聯合，也或者還有第三個可能出現。總之，現在在台灣黨外的政治運動，是民主與人權的運動，而不是海外一些人搞的獨立或革命的運動。

③如何照顧由台灣新來的留學生，新移民？如何與他們建立共識，為現有的民主運動團體吸收成員？

④最重要的是如何與台灣的民主運動活動配合？而且要注意，海外的力量只是助力，決不能成為主力，更不能成為反作用力。

⑤最後對已經有實際行動力量的，已經在辦雜誌的朋友們提供一個意見。要注意，辦雜誌、寫文章是一個非常迷人而容易自滿，麻醉自己的東西，在台灣我看到有幾個辦雜誌、幾個寫文章的人，連過去我自己也如此，以為辦了雜誌就是在做事了。其實，假若不配合上實際的行動，寫文章辦雜誌所能發揮的功能非常小。而所謂行動，更不要馬上想到革命等大事去著手，要開始的是如何去吸引鼓吹那些對社會政治漠不關心的人士，一個雜誌如果辦了幾年仍然還是幾個好友同志互掏腰包，那就是所謂的機關報，同仁雜誌，它完全只是一種同好之間的麻醉劑而已。

民主運動的參與是每一個人的權利，理論固然是行動的基礎，但現實環境的局限與困難，却是在理論實際前，先必須去突破的。寄語海外同胞，要關心、要參與台灣的民主人權運動，沒有回去台灣親自生活、體驗和了解，或在美國本土有直接行動的生活體驗，坐在書房或客廳用假設的現實，來支持理論的實行，可能會帶給自己及已在運作中的民主活動，許多無謂的反作用力。

淺談龍應台「野火集」 的文學效果

沈鴻

龍應台是台灣異軍突起的專欄作家，他的「野火集」專欄，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登載，短短不及一年，就像野火般席捲整個文化界，造成「龍應台旋風」這種罕見的社會景象。「野火集」以一本社會評論，針砭台灣時政和社會民情，類似的社會評論，甚或更激烈的主張論點，在龍應台前與龍應台同時，並不乏其人，但是沒有造成如此旋風，究其原因：乃在於一般社會評論是用冗長晦澀的分析語言，以層層推理的邏輯性文字，指陳社會時弊；龍應台議論時弊，極富於聯想力、觀察敏銳，外加文才橫溢、詞鋒銳利，以文學的感性方式與充滿意象的語言，談社會問題；分析的成份固然有之，其所以會產生如此震撼的作用，敢說敢講，固然是事實；訴諸感性、激動情緒的表達方式，也是關鍵之一。一個論點不必特別深入鋪陳，不必提供數據、分析數據、引經據典；往往點到為止，就能有排山倒海、雷霆萬鈞之勢。他在說理的過程中，主要是借重各式各樣的文學表達手法、文字技巧、用諷喻、比喻、對比、誇張的手法、甚至蒙太奇效果，以意象訴諸讀者的感性，把讀者平日習而不察的社會現象浮突出來。因此他的社會評論，有骨有肉，絕不枯燥難讀，使年輕學子捶胸頓足，頓然改悟；使高齡高翁喜極淚下，社會中堅人士深思自省。現在我把他在說理過程中，各式各樣的文學表達手法，一一略作介紹：

1 龍應台用了許多煽動情緒的譬句，可以說是純然訴諸感性；例如：「台灣是我生了梅毒的母親」（P.181）；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淡水河是條爛腸子（P.5），也是一條發臭的毒溝（P.177）；又有觀音山是長了膿瘡的病狗（P.77）；台灣是「病重的大地」，固然已經脫胎換骨，却明明白白的有一身病痛（P.180）；台北是他「所見過最庸俗最醜陋的都市」（P.181）；

2 比喻和誇張語的例子，信手拈來也不少：「蒼蠅叮肉似的攤販」（P.75）；「街上的交通……呈爆炸狀態」（P.75）；台灣是「一個只能裝十隻雞的籠子裏塞進一百隻雞」，「你與我」就是這籠子裏掐著脖子，透不過氣來的雞（P.17）；台灣的「社會環境與教育制度，是控制乳酪、製造雞題的實驗家」，台灣的孩子們就是「精神瀕於崩潰的老鼠」（P.174、P.175）台灣是一個「皮膚有病」的人，只要用手一觸就可能引起他全身的癢學（P.Ⅲ）

3 龍應台的反諷，也是一絕：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見慣不怪的事物，他一針見血地把事情的荒謬性指出。比方她批評台北市政府修建又高又大的孔子銅像：「如果建個銅像能解決傳統失落、自信缺乏的雞題，那可好了。我們不是要培養書香社會嗎

？在基隆港口用水泥塑一本比軍艦還大的書怎麼樣？」（P.25）令人拍案叫絕。

4. 龍應台用羅列排比、對比對照的手法，以幫助他的說理。他往往把幾件不相干的事件、現象，羅列在一起，或者是幾句話，或者是幾個段落，使讀者一看之下，豁然瞭解他們的雷同所在。對比、對照的手法，不時有電影蒙太奇的作用。比方說，談台灣保存古蹟有什麼意義的時候，緊接著以優美的散文對照一個德國農村的老人，用眷戀的口吻敘述他身邊周遭發生過的事物、一代一代的興替；這樣不言而喻地就點明了保存台灣古蹟，對台灣土地上生存的個人，有不可抹煞的意義。如此對比對照的手法，「野火集」中不乏其例。

總結而言，龍應台文章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寫的人爽快、讀的人也爽快。龍應台快人快語，雖然他本人也經常犯下他強責於人的詬病——不經過推理分析，即下一句斬釘截鐵的結論、（證諸於上述的文學譬喻和誇張用語等，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爽快的文字，既然激動情緒，又能激發行動，引人深思，並且引起島內一片迴響，就不是人人輕易能做到的人，我以為「龍應台旋風」實在歸功於龍應台以文學家的敏感和文學的語言，評論全島內人人喋若寒蟬望而却步的社會問題和政治時弊所致。

看“人生”這部電影

—張益農—

「人生」是中國大陸陝西西安電影製片廠拍攝的一部愛情故事影片。藉著一個陝西村莊知識青年的愛情故事，對農民的生活和思想作了很深刻的描繪，是部值得一看的電影。

男主角高加林是一個高中畢業的知識青年。原來在村子的學校裏當教員。影片開始時高加林的教師職位被一個幹部的兒子擠了下來。頹喪萬分，回到村子裏當普通農民。他滿心不情願的用鋤頭拚著命在那兒挖土。村子里的老人順德爺過來要他停下，並責怪他幹活不能這樣沒命似的幹。果然一雙

沒有勞動過的手已經在流血。遠處村子裏的姑娘小英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裏。她一直愛著高加林，但是她自己不識字沒有文化，而高却是村子裏的秀才，又作過教師，所以一直不敢表示。現在高被人擠了下來也當普通農民了，小英想找機會對他表示心中的愛慕。

趕集的日子來了。高的母親蒸了饅頭（陝西人叫糝），要高拿到縣城去賣。高到了縣城就碰到他的兩個老同學，一男一女，男的升了官，正要乘車去出差，女的是縣城廣播公司的廣播員，送她的男

朋友上車。高在他們面前，好像矮了人家半截。他拿著那筐饅頭不知如何是好，找了塊地方坐了下來，把饅頭放在馬路邊等人來買。來來往往的人，沒有人注意到他在賣饅頭。而高自己却覺得所有的人都在盯著他這個由教師降為賣饅頭的知識青年，好不自在。沒一會就乾脆不賣了。到茶舖喝茶去了。小英在遠處看著高，好不心疼。高在茶舖裏翻著一本畫報，那畫報上却是一些大城市四化建設的照片，高樓大廈，火車飛機，高的心中很是羨慕，腦中閃過遠走高飛的念頭。

故事細節豐富不再多說。高加林受了小英深情的感動，跟小英談起戀愛來了。這一段日子裏，高也開始適應了作農民的生活。一天村子裏的幹部派高和小英跟著順德爺到城裏去拉糞。（拉糞比起在地裏幹活，算是輕鬆的工作）。拉糞的時候高被城裏的人當作沒有文化的農民加以屈辱。高的心中很是憤恨，認為以他的本事，也應該到城裏來作事。

高的機會來了。他的叔叔自外地調回縣城作勞動部部長。他的部下為了討好上司，就為高在縣城的廣播公司安插了個記者的位置。也正巧是高上次碰到的那位叫亞萍的女同學工作的單位。高告別了小英來到了縣城。其實這縣城離村子也不過幾里路，村子去縣城趕集却是走路或騎腳踏車。但是縣城和農村，不管是表面的外觀的也好，人們每日的生活活動也好，文化水平也好，却存在著那麼大的差異。高到縣城工作後，小英幾次來看他，因為他不在，守門的人不准小英進去。最後一次小英跟著高的後面走進了那座兩層的辦公大樓，兩眼睜得好大，驚嘆不已！！

故事發展下去，高又被他以前的同學亞萍愛上了，她要跟父親調回老家南京去工作了。要高一起去南京，並要她的父親靠關係給高找工作。高經過一番掙扎還是決定要跟亞萍去南京了。他雖然感情上有點捨不得小英，但是光明燦爛的前途對他的吸引太大了，終於別了小英、家人走了。小英被高拋棄了，也只好嫁了村子裏的一個年輕農民。

故事的結局是高的事業被亞萍以前男朋友克南的母親給毀了。她去密報了亞萍的父親給未來女婿靠關係安插工作的事。高加林再一次的返回村子裏當農民了。

「人生」不僅是一部感人的愛情故事，它更藉著一個愛情故事來描繪中國的社會。在中國的農村裏，尤其是陝西這樣交通不便、生產力低的農村裏，農民的生產還完全要靠兩臂兩腿來勞動，而知識份子却只要用想、用講、用寫來勞動。他們不同的生活決定了他們不同的意識。高加林的新愛亞萍曾說：「我喜歡浪漫主義的色彩，它是自由的，不受社會任何的束縛。」而小英却只會說：「你們家的老母豬下了十二隻小豬，死了一隻，就只剩十一隻。」這部電影還告訴我們農民的一切生活活動都離不開土地。土地和他們的生命是結合在一起的。知識份子却不是這樣。高加林決定遠走之後去向父母告辭時，順德爺爺也在，這個純樸的老農人罵高成了沒有根的空茅菜。高回答他們說：「我不願意像你們一樣，死在山溝裏挖一輩子的土。你們有你們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知識份子有翅膀，可以遠走高飛。從鄉村飛到城市，從小城市飛到大城市，還可以越洋飛到美國。我們這些知識份子不都是這樣從台灣飛出來的嗎？亞萍對高說：「大城市就有大發展。」還不要忘記美國有更大的發展。

小英被高拋棄了，嫁給了一個農村青年，這青年對小英說：「俗語說金花配銀花，西葫蘆配南瓜，我們都是沒有文化的人，正好相配。」這句話刻化著「有文化的人」和「沒文化的人」之間的一道深溝。

要認識到中國社會還存在著不同的階級（如名符其實的所謂特權階級、高幹家庭）才有可能消除階級。把知識份子說成是與工作一樣的勞動人民並不能消除他們和工農之間的差異。中國大陸當今的農村政策顯然使得中國農民在兩極分化，城鄉差距是在日益加大。知識份子脫離勞動，回灌城市，很多農村青年又變成只管農務而不學文化。風氣甚者，使得一些人不勞而獲，愈來愈多人公開靠著職權謀取私利。像小英的父親的村裏的幹部說的：「你掌你的權，我發我的財。」

這樣一部電影若是對農民沒有認識和感情，是寫不出來的。據說是一部小說改編的，真慶幸還有這樣上過山下過鄉的知識青年可以寫出這樣的著作。這部電影也及時的提出一些中國今天重要的社會問題及方向，很值得看看！

旁觀者

周 昀

當我們貧窮、動亂和飢餓的時候
你們在遠方觀看
當我們被迫害、拘捕而沉寂的時候
你們在遠方觀看
當我們掙扎、扭曲而臣服的時候
你們在遠方觀看
當繁榮、奢侈及進步終於來到的時候
你們在遠方觀看

可以是快樂的觀看
並以勤勞、溫順和聰明 美好的字眼
解釋我們的屈辱
可以是哀傷的觀看
並以剝削、侵略和歧視 無奈的字眼
解釋我們的絕望
但終於都只是觀看
在遠方，用你們的眼睛

然而，你們狡黠的雙手
在我們女人柔美年輕的血肉裏
在我們男人堅實廉價的肌肉上
在漢堡、可樂、新力牌的快樂文化裏
停止了觀看

你們無聲無息的雙手
因為改變不了我們皮膚的顏色
於是移植了我們的心靈
因為征服不了我們容顏裏的陌生
於是替我們穿上了文明的衣裳
因為毀滅不了我們血淚的歷史
於是改變了我們國土的面貌

同時你們宣稱
不再會有歧視、不平與侵略
因為快樂是公正的
不再會有反抗、革命與異議
因為侵略是公正的

於是我們喪失了勇敢與懦弱的權利
於是我們喪失了順從與憤怒的權利
於是我們也只能觀看
觀看自己的雙手，如何溫順的實現
你們所承諾的

終將快樂的心靈
終將美麗의 衣裳
終將宏偉的國土

不是在遠方
是在家園裏
用自己的眼睛。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六日

52

法國「新小說」

淺談

沈鴻

一九八五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一位法國「新小說」成員，因為法國「新小說」於今日西方文壇，已成為一股不容漠視的流派。今天我想在此簡要的介紹一下法國新小說的信念，以及其最重要的一位女作家——娜塔麗薩侯特的理論與實踐。

女作家薩侯特是法國「新小說」的先驅，早在一九三九年便出版了她第一部以「新小說」方式寫作的小說「向性」。比日後成為新小說主將的霍布格里耶的第一部作品早了將近十五年。法國新小說旗下的作家，真正成員不過六、七人，明為同一個流派，其實各人有各人的特長和表現手法。新小說只是大家共同實驗的一個大方向，意在打破歐洲十九世紀以來寫實主義風尚，為小說奠定的寫作規範。即以故事敘述的手法把真實生活裏發生的事情，透過人物的造型和對話，敘述描繪出來。但是身為二十世紀的哲學家、社會學家、語言學家指出，我們每一個個人，生活在特定的時空坐標上，我們身上無形中反映了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思維也不自覺得受我們的生活觀、我們的語言、我們的社會文化價值所左右。我們對生活周遭事物物的反映，不自覺地都受了一層個人因素、社會因素與文化因素的過濾。真正不帶主觀色彩的寫實是不可得的，而小說世界裏呈現的真實手法，只不過是一個假象而已。法國「新小說」家鑑於此，乃產

生了他們的基本信念，小說裏的真實既不可得，如要創作小說，不如公開地全盤揚棄傳統老套小說的寫法，摒棄寫實意圖，為創作小說而寫小說，把重點放在語言的結構和重組上，以期達到實驗的目的。

薩侯特本人既從事小說創作，也長於小說理論。她有一本專書題名為「懷疑的時代」，一九六一年出版，即反映二十世紀現代新小說作家對傳統老套小說的質疑和棄絕。他的觀點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說：

就人物方面而言，薩侯特指出以十九世紀小說為模式的作品中，人物個個有身世姓名、個性職業、特徵愛好。她認為這種人物清清楚楚的造型，造就了一群懶惰的讀者，讀小說的時候不求甚解；只有把小說人物身上這種習見的標誌祛除後，對讀者讀書才能起振聾啟聵的作用。讀者才可以透過小說得到新經驗、新知識。她以為小說人物真正真實的部份，不是姓名、住址、職業、愛好，而是內在的心理質素，像植物的向光性、向水性一樣，以令人不能察覺的緩慢速度動作。作家的責任即是捕捉這些不易察覺、瞬息即逝的心理質素，用相關的語言描繪出來。因此，薩侯特的小說中，沒有可見的人物造型，却有界劃清楚的許多內在意識，由一組組毫不含混的意象集合界定出來。

①就情節而言，老套約定俗成的敘事方式，本來就不符合現實生活裏的時間長度和順序，自然應該打破、重組，以配合小說整體性在藝術上、語言上的需要，新小說家們對語言的一個共同看法是：語言不是創作的工具，乃是創作本身。在薩侯特的小說中，傳統小說情節的來龍去脈，即為類似華格納的音樂主題所取代，通篇小說就像一個樂章，沒有開始和結尾，只有不同的意象主題，像音樂主題一般，反復出現。

②就人物的行為而言：薩侯特強調心理質素的結果，使他的小說世界由傳統小說中的外在世界，轉換成內在意識的內省世界。這個內心世界裏仍舊充滿了可見可感的意象，其戲劇性的衝突，較傳統小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從批判的觀點來看薩侯特一九七二年的小說——「你聽見他們了嗎？」他的小說理論顯然與他的實踐不符。簡言之，內在意識雖然取代了人物造型，但却有清楚的個別性，可以認同，可以追蹤，因此只不過是一種不同型式的人物造型而已。就情節而言，雖然祛除了時間的推移，但却不可避免有事物的變換，仍留下了時間的痕跡。第三，小說世界雖然內化，事件仍然層出不窮，充滿戲劇性的衝突。綜合以上諸點而言，薩侯特所闡述的新小說理論，證之於她的小說「你聽見他們了嗎？」是有商榷的必要。她的小說一般都認為難讀難懂，但是清楚了新小說的宗旨和信念之後，讀者雖然不盡然能懂某部新小說作品的含意，却很可以嘗試著用新眼光，從一個新角度，像看一幅抽象畫一樣領會欣賞新小說家獨特的藝術精粹。

稿約 — 這 — 是 — 您 — 的 — 刊 — 物 — 稿約

民主大家來，台灣是大家的台灣。「民主台灣」是您的刊物，是所有關心台灣、贊成民主者共同的刊物，而不是作者、編者少數人的。我們最大的目標，不單是在林林總總的海外刊物中增加一份可讀性高，富有知識與資料的刊物而已。我們更希望這份刊物能成爲一個橋樑，溝通不同的意見，增加對台灣的關懷與認識。讓我們知道，有共同理想的人到處都有，而且愈來愈多。讓有心人士不覺孤立無力，在海外或回國能爲我們的故鄉，爲社會正義而努力。

因此我們特別需要您的來稿，或來信討論、批評、或捐款、介紹朋友。我們題材很廣、只要跟台灣有些關係。方式不拘，專文，隨感，漫畫，文藝等等都行。我們力求包容性大，只要不流於謾罵或不實，各種意見立場都歡迎。當然，我們會有開放

而慎重的審稿，以向讀者負責。代表我們意見的，將以本刊，本會與編者按語表達。長度亦不限，但最好在一萬字以下（這是篇幅所限），過長者請先與編者聯絡。

請橫寫。我們有稿紙備索。我們很窮，暫時發不出稿酬，但可以贈送五本給您的朋友（來稿請同時開列名單）。

關心台灣，提倡民主本是光明正大的事。但一些嚴峻的事實，特別陳文成事件的先例，使大家都很小心。我們對來稿來信，都將絕對保密。歡迎筆名聯絡，但請附上通信住址與電話。

來稿與信寄到：「民主台灣」編輯部

O S D M T
P. O. BOX 53551
CHICAGO, ILL. 60653

《經濟發展 与民主政治》

史民

六〇年代末期，台灣開始急速工業化，創造了財富，也產生了一批新興中產階級；到了七〇年代中期，台灣的民主運動蓬勃發展。論者每稱台灣中產階級的興起引發七〇年代台灣民主運動的質變，將之比擬於十八、九世紀西歐工業化與民主化的關係，而預言台灣的中產階級將能帶動台灣全面民主化。

這種經濟發展引發民主政治的理論，在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却不適用。許多中南美國家，以及在亞洲的南韓、菲律賓等等，近一、二十年都有相當的工業化，但却未帶來相應的民主化。為什麼？

本文是針對這個問題，介紹了學術界的探討、值得關心民主運動者的深思。

台灣的民主運動這幾年進入瓶頸的時期，黨外得票率長期徘徊不升，黨外的組織化遭到國民黨及黨外內部派系林立的重重困難，造成這重重困難的原因，是否有與本文所述拉丁美洲國家相通之處？希望讀者看完本文，進一步地分析、討論。

——編按——

長久以來，經濟發展一直被認為是民主政治的一個先決條件。可是，到底這二者之間的關係為何；什麼樣的社會機能聯接了經濟與政治，以及，西方世界的發展型態是否能應用到第三世界？這些問題在學界中仍有爭論。以下的討論，將集中於經濟發展與國家的政治型式的關係上。基本上，本文將區分兩派說法：一、現代化理論，如寇爾蒙（

Coleman）與李普塞（Lipset），認為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政治民主；二、另一派人是拉丁美洲學者，如歐唐納（O'Donnell），杜斯山圖士（Dos Santos）以及克斯（Kurth）等，認為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與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政體是不可分的。因此，這二派的說法正好針鋒相對，以下乃是其不同的理論背景：

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是一體的

與涂爾幹 (Durkheim) 和帕森斯 (Parsons) 的結構功能論相同，現代化理論認為，政治系統在社會中執行的功能，乃是社會整合。每一個歷史或未來的社會，都有一些必要的社會功能，社會整合乃為其一。而唯一能區分古代與現代，進步與傳統的標準，就是社會分化的程度。換句話說，社會分化的程度愈高，社會也就更原子化，也就愈傾向個人主義，社會也就更開放，於是多元的民主政治也就愈可能。從這一角度而言，現代化理論或自由主義學者認為，社會與政治是一體的，國家只是社會的政治展現而已！

寇爾蒙與李普塞的比較研究發現，經濟發展的程度與政治民主之間，有一正面的關連。其解釋是，經濟發展帶來了都市化、工業化、高收入、高的識字率，以及平等的價值觀等。這些質素加起十分有利於民主政治的開展，然而，問題是，寇爾蒙與李普塞所提供的，並非正面的因果解釋，而是一描述性的套套邏輯 (Tautology)。也就是說，他們二人已先認為民主政治是直接性演化的必然結果，因此每一社會都會與西方走同一的道路。有了這一假定與結論之後，他們才去找原因來解釋為什麼！而這一為什麼，又奠基於社會分化。也就是說，所有那些有利於民主的質素，都是社會分化的產物。但是，社會分化如何而來？現代化理論並未提供解答。正如班德 (Binder) 說的，自由主義的現代化理論預設了「一個不斷自我變遷與演化的世界」，因此在這世界裏，沒有終點也沒有起點，只有不斷的社會分化。而且這分化的過程，是全體性的，因此並沒有一個質素會比另一個質素更為重要。

李普塞因此指出，一個分化程度較高的社會，比較容易產生開放的階級體系，以及多元的自由結社。而這些結社，乃是避免社會變成集權政體的最佳保障。換句話說，經濟發展會帶來財富，使人民生活更有保障。而這一經濟安全感，會大大的降低下層階級接受激烈的意識型態的可能性。同時，社

會財富的增加，也將把原來金字塔型的階級結構，改變成一個鑽石型的。這中間廣大的中產階級，乃是社會的安全瓣，因為他們會獎勵溫和的社群，而處罰那些激進的群體。第三世界的問題，乃是經濟發展不夠，社會分化程度不夠高，所以他們也較易於接受下層階級的威權主義，如阿根廷的培農主義 (Peronism)。要讓第三世界有經濟發展和社會分化，就必須像西方一樣，讓個人的利益儘量展現。故此的話，社會就會被帶動起來，民主政治也就可能了。也就是說，第三世界必須實行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是一體的！

二、拉丁美洲學者的反駁：

經濟發展帶來了官僚威權政體

現代化理論對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之間關係的解釋，遭到拉丁美洲學者激烈的抨擊，正如歐唐納說的，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並沒帶來民主政治，而是帶來了官僚威權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政體 (或軍事政權)。以阿根廷和巴西為例，其官僚威權政體的崛起是對應該其進口取代工業化的失敗而來的。這一進口取代工業化的源起是在一九三〇年代，當西方世界忙於經濟蕭條，而無暇他顧時，拉丁美洲的那些新萌芽的民族資本家，乃聯合中下階級把地主壟斷的寡頭政體拉下來，實行民粹政治 (Populism)。然而問題是，這一進口取代工業化是橫的而非縱的，所以必須進口中間的生產材。而進口生產材，就必須要外匯。但由於缺乏國內市場，進口取代工業化乃面臨困難，於是外匯短缺，貿易赤字過大，通貨膨脹，以及失業率增高。簡言之，這一橫的工業化產生了巨大的經濟與社會危機！

官僚威權政體的崛起，是為了解決工業化的困難，以及社會經濟的危機。因為進口取代工業化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無法製造生產材。所以，現階段的政策，必須要讓工業生根，創造出一個整合的工業體系。而要深化工業結構，國家 (the

State) 因此必須與跨國公司合作，以便解決資金與技術的問題。同時，為了說服跨國公司，國家必須加強內部控制，以示其有能力保證一穩定的社會秩序，這樣跨國公司才能信服其投資是有利可圖的。第三世界國家與跨國公司的兩邊聯合，因此塑造了官僚威權政體，所謂官僚在此是指第三世界的技術官僚而言。因為與跨國公司合作，第三世界國家需要一批懂得外面世界，又對資本主義運作方式很熟悉的技術官僚。在此情況下，芝加哥大學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在拉丁美洲國家乃大行其道。他們與軍事執政團合作無間，在巴西與阿根廷創造了經濟成長。但經濟成長的附帶品不是民主，而是政治壓迫、工會解散、工資降低等；歐唐納同時指出，由於國家仍必須代表民族，所以其與跨國公司的合作，終究必須擴及民族資本家，而成為伊凡斯(Evans)稱的三邊聯合的。在這三邊關係中，國家成為民族資本家的導師，它以各種獎勵投資條例等條件輔導民族資本家站起來，而後者亦依靠國家之力，壓低工資以便得利！二者是休戚與共的，他們共同得利於威權主義政體。

威權主義政體乃帝國主義所促成

杜斯山圖士認為，資本主義與國家之型式的關係，必須與帝國主義的擴張一起來看。例如，跨國公司之進入拉丁美洲的年代，正是民族主義與反美運動高漲的時候(如古巴革命)，美國帝國主義因此運用其政治與軍事勢力，與拉丁美洲國家合作，以壓榨中下階層，伸張其所謂市場經濟。所以，杜氏認為，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是透過帝國主義促成的，而跟隨而來的就是威權主義政體。

克斯亦認為，威權主義政體與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只是他把這一關聯放在生產領域上。與葛申可龍(Gerschen Kron)類似的是，克斯認為一國工業化的時機(Timing)決定了其國家的政治型式。葛申可龍的著名論點是，社會愈落後，其工業化的步調也愈容易由國家來帶領。例如，歐洲工業化的歷史顯示，其產品的進展是由消費材，到生產材，而到持久性(Durable)消費材，而相對應於這類生產的是不同的政治型式。

克斯指出，最早工業化的社會，如英、法，是由建立消費材(如紡織)崛起，而這一工業化乃培育出一群新的資本家，與舊有的地主勢力對抗，建立起自由貿易的民主政治。這一工業化的成功更因此支援生產材工業(如鋼鐵工業)的發展。帝國主義的擴張，更把鋼鐵工業延伸至造船、鐵路建造等。而另一方面，稍晚的工業國，如德、義，起步於消費材市場已達飽和之時，因此它們之要躋身工業世界，只能從生產材製造開始。但是生產材的製造，需要相當大的投資。在此條件下，威權主義政體要比自由民主政治來得有利，因為，威權政體能「摧毀工會，降低工資，以及不管人民的要求。如此乃能從工人階級榨出資本，以便投資於生產材製造部門」。而拉丁美洲國家之工業化，不同於英法與德義，因為生產材與消費材的製造，已不再可能使後期工業化(the late Industrializers)國家躋身世界市場，唯一的可能性只有持久性消費材(如汽車工業)。但是，要建立汽車工業，例如巴西，就必需依靠跨國公司的資金與技術。其結果乃是，威權主義政體最適合這一後期工業化國家。因為，第一，跨國公司不喜社會運動和社會不安。第二，為了消費掉其產品，就需要有一國內市場，而在缺乏一群能購買其產品的人口的情況下，只有威權主義政體有能力重新分配國內收入結構，而製造出一群有能力消費的人口。巴西的汽車工業的發展，正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歐唐納·杜斯山圖士，與克斯等拉丁美洲學者的結論，正好完全不同於現代化理論。要如何解釋這一不同？什麼理論原因，造成這二派人有如此不同看法。

三、結論

歷史證明了現代化理論的謬誤

現代化理論與拉丁美洲學者，對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之間關係的不同解釋，基於兩點不同的看法。第一，現代化理論預設了一直線性的演化過程。因此它預涵了西方經驗乃是第三世界經驗的縮影，可以被推廣到「低度開發」的社會。但對拉丁美洲

學者而言，這一問題必須與資本主義史，和第三世界之資本主義發展如何的不同於西方世界這一層面來看。第二，現代化理論認為，中產階級（或歐唐納等人認為的民族資本家）乃建立民主政治的力量源泉。然而，拉丁美洲學者指出，民族資本家的產生是透過三邊聯合而來。在此情況下，民族資產階級乃是國家輔育而成的。它與國家、跨國公司之間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與西方資產階級不同的是，後者的崛起是商品交換的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而為了資本累積，這一階級會起來與地主壟斷的國家對抗，而建立起資產階級民主。但第三世界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國家的兒子」，所以只要能累積資本，它與國家，外資是密切的夥伴。三者全得利於威權主義式的政治。

因此，對拉丁美洲學者而言，現代化理論不只是西方中心主義，且是非歷史的。因為歷史證明，資本主義在第三世界的發展全然不同於西方世界。更甚的是，第三世界的資本家乃國家的應聲蟲。國家幫忙民族資產階級壓迫工會、降低工資、不理工

人要求等。但有一歷史因素，可促使第三世界之民族資產階級成為進步的力量。那就是，當經濟情況不再有利可圖，而這一階級怪罪於國家時。也就是說，第三世界之民族資產階級之可能爭取政治民主的時機，只有在社會面臨經濟危機時，歐唐納將這一論點發揮到極致而指出，民主政治在第三世界的發展並非跟隨著經濟發展而來，而相反的是跟隨著經濟危機而來。因為官僚威權政體的建立，其唯一的合法基礎乃在創造經濟奇蹟。因此，只要經濟一直起飛，民族資產階級不斷得利，一般人民生活有改善，則恐怖政治還可被容忍。可是一旦經濟衰退，民族資本家不再得利，人民怨言四起，社會騷動，則此時民族資本家可能結合人民的力量，把不合法的威權政體扯下來，而建立起民主政治，歐唐納的解釋，於是完全與現代化理論顛倒。但歷史證明了現代化理論的謬誤。馬可士下台，拉丁美洲國家的民主化（先不論是那一種民主），不就證明了歐唐納的歷史解釋。

References :

- Binder, Leonard. 1986. 「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velopmental theor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istory and Society*, 28 : 1 (Jan) 3-33.
- Coleman, James. 1960. 「Conclusion :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in Gabriel Almond and James Coleman, eds,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P.
- Dos Santos, Theotonio. 1977. 「Socialism and Fascism in Latin America Today.」 *Insurgent Sociologist*, 7:4 (fall) 15-24.
- Evans, Peter. 1979. *Dependent Development :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U.P.
- Kurth, James. 1979. 「Industr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Change : An European Perspective.」 Pp. 319-362. in David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U.P.
- Lipset, Seymour. 1963. *Political Man*. N.Y. Doubleday.
- O'Donnell, Guillermo. 1973.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C. Berkeley.
- 1978. 「Reflection on the Patterns of the Change in the B-A State.」 *Latin America Research Review*, 17:2, 3-40.
- 1979. 「Tensions in the B-A State and the Question of Democracy.」 Pp. 285-318. in David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U.P.
- Petrus, James. 1976.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Latin America*. N.Y. Monthly Review.

沙米·阿敏小傳及其重要著作 (上)

……一位阿拉伯
經濟學人的心路歷程

熊三

編者按：

上期本刊刊出「介紹阿敏之世界範圍之資本積累」及「中心與邊陲經濟發展模式說」一文，其中提出的問題顯而易見是當今第三世界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一些課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界此台灣海峽兩岸經濟發展皆面臨瓶頸與轉型期之際，沙米阿敏的理論形成及其與經驗世界的驗證過程實為當今研究社會之動態規律及經濟發展者不可忽視之作。

然，沙米·阿敏 (Samir Amin) 何許人物也，海峽兩岸學界恐知之甚少，而其主要著作之華文譯本更尚缺如。故本期特請熊三先生譯介一篇關於沙米·阿敏的小傳及其主要著作介紹。原文取材自阿敏最近一本小書，當今阿拉伯之經濟 (Arab Economy Today) 由福斯特·卡特 (Foster-Carter) 先生所寫的一篇阿敏介紹。(註1) 全文分上下兩期刊完，本期以介紹其四十歲前以實證調查研究非洲諸國經濟發展之作品為主。

一、導言：

在七〇年代以前，沙米·阿敏（Samir Amin）的著作在英語學界顯為人知。其後，他的幾部重要理論著作（最重要的兩本為「世界範圍之資本積累」及「不平衡發展」（註15，1）陸續被翻譯成英文，但並不全面，致使英語學界很多對阿敏的理解及批評，偏頗而不能令人滿意。在此篇文章中我們將附上其有英文譯本之著作選。至於中文方面就筆者所知，則此位埃及學者的著作則尚未有任何譯本，誠可悲之事。

沙米·阿敏於一九三一年出生於埃及開羅，在法國巴黎受大學教育，獲有三個學位。一九五四年得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之政治學位，一九五五年得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之統計學博士學位。而於一九五七年獲頒得獎之經濟學博士學位。他這種三位一體，橫跨三個領域的教育背景，奠定了他以後，綜合創造工作的基礎。

總的來說，沙米·阿敏在各個領域貢獻的總合，在於為世界範圍之所謂「低開發問題」提出了其獨特的見解。不論是從「經濟發展」這個問題本身為角度，還是從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都是如此。毫無疑問的，不是所有人都會同意此說，但至少在讀了本文後，他們對不同意些什麼，會有一更全面的知識。

到今天，阿敏已寫了廿餘本書，並編寫及與其他作者合寫了起碼又是一打書，而論文更是成百篇。雖然他主要是被認為是一個「理論家」（這一點當然是很恰當的）但阿敏之成名作却是一系列關於非洲經濟的半打個案研究，主要用的是統計，收集經驗數據的調查研究方法。但只有二篇有英語翻譯本（註2，3）。這一點是對阿敏作全面評價需要注意處。

大致說來，就出現順序及作品性質來看，阿敏的著作可分為四個時期與類型，第一期我們不妨稱為長成期，相當於五〇年代末期，以其二篇博士論文及一些政論性短文為代表。第二期，經驗驗證期，指六〇年代的十年，以其對非洲一些國家之經濟個案研究為代表。第三期七〇年代的十年，不妨稱為理論成熟期，二巨著世界範圍之資本積累及不平衡之發展皆為此時期之著作。第四期：理論與實際之再結合，以下各節將分述各期之主要著作：

二、第一期：長成期

此時期之作品約可分為二類：

第一類是其二篇博士論文，第一篇完成於一九五六年；論文之題目為「關於埃及一九三八～一九五二年間之儲蓄形成與利用之統計分析」。第二篇為其經濟學博士論文得獎之作。

此是一非比尋常之難得佳作，其標題值得全盤引述：

「The Structural eff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Precapitalist economies : a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mechanism which has engendered the so called 『under-developed』」

試譯為：

「對前資本主義經濟納入國際經濟體系過程中之結構變化效應：對所謂『落後經濟』機制之理論研究」

這個題目以廿五年後的今天學術界眼光來看，也許不覺得怎樣，但在一九五七年的當時，却是聞所未聞的。（譯者按：這一點在歐美學界也許可以如是說，但在台灣海峽兩岸的華文學界，也許即使是今天也令兩岸學子耳目一新。這當然是因為基於膚淺的「政治」原因，學界對馬克思關於社會的學說在廿世紀西方學術界的發展一無所知故。而其實我們可打個比方來說，在歐美讀文、法者如不懂馬克思就如同讀理工者不懂微積分一般。）

顯然的，阿敏的一些基本看法，對學院派經濟學的批判及別樹一新型理論的嘗試在其廿六歲的當時已略具規模。（譯者按：大思想家之思想在廿歲後期成型是不乏先例的，牛頓、馬克斯威爾、愛因斯坦、馬克思及量子英雄們皆如此），而在其隨後的十年，是將其已具雛型的理論去與一個個實證個案相驗證。此驗證的歷程我們將於下節再詳細介紹。而驗證的結果就阿敏看來，是肯定了他原先的基本看法。

至此，我們介紹了以經濟學家面目出現的阿敏，但在此同一時期，阿敏也寫了一系列的政論性文章，最早的一篇題為「埃及往何處去」（是以「Said Si Masry」的筆名發表在 *Democratique Nouvelle*（一九五五）上。（註4）用筆名發表的用意當然在於避免引起埃及情治警察的注意。這一系列政論性文章的內容是些什麼呢？是對於當時埃及政治經濟各方面的一些批評。毫無疑問的這是在長成期的阿敏對於當時很多人寄以厚望的「非資本主義」發展模式（號稱為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做為「另一種道路」之不足提出的批評——納瑟的埃及。阿敏之所以能提出其深入而有預見的看法，當然與他畢業後的頭兩個職位有關。

一九五七年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後，他的第一個職位是在開羅埃及政府中之經濟發展部（*Economic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中任資深經濟研究員（一九五七～一九六〇）。接著的三年是在剛獨立的馬利（*Mali*）政府中任經濟計劃技術顧問。獨立後的馬利是在非洲大陸當時唯一號稱為走馬克思主義道路的政權。我們必須要理解到那是尼赫魯高喊著，先求得政治獨立再建設經濟王國的樂觀時代。很多人的頭腦是發脹的，而阿敏當時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對一些號稱為社會主義但却不切實際的經濟發展道路提出批評是難能可貴之事。好笑的是十幾年後，還有一些膚淺的「批評家」想把「民族資產階級」及「國家資本主義」等「意識型態辯護士」的帽子戴在阿敏的頭上。（註5）

61

三、調查研究驗證期：

阿敏最早的一本書是以阿拉伯文寫的「關於埃及之財政金融」的分析於一九五九年出版，然後是一九六一年出版之馬利之一九五九年度歲入表。在做二任政府中之經濟學家職位後，阿敏回到了學術界，先後在坡特（*Poiters*），巴黎及達卡（*Daker*）之幾所大學中任經濟學教授。在這一段期間，他以平均一年一本書的多產速率，寫了一系列的關於非洲諸國經濟之個案研究。是這些著作使他被較廣泛的學術圈注意到。（但主要仍是在法文圈）

馬利、幾內亞及加納 三個非洲國家的發展經驗

第一本關於埃及經濟的實證研究是以「*Hassar Riad's*」為筆名發表之 *L'Egypte Nasserienne*（一九六四）法文著作。然後是以研究馬利（*Mali*）幾內亞（*Guinea*）及加納（*Ghana*）等三個新獨立號稱要定「社會主義」道路的非洲三國之經濟發展為對象之一本法文著作，題為三個非洲國家之發展經驗（*Three African Development*）於一九六五年出版。書中滿是統計資料，從廿一到五十八頁幾乎每頁都是圖表。他對三國經濟發展之方向有深刻之批評。主要的論點是，這些國家儘管在政治口號上說要與現狀脫離，但在經濟發展上却未能與既存的樣式絕裂。阿敏成功的以數據說明這三國在未有充分資金的情形下如何想以赤字預算的方式來進行經濟發展。如此，則結果將不會是預期的社會主義而是通貨膨脹。經濟的實值成長已是少的可憐了，更不用提社會福利的增進或是所得再分配。農業大部維持原樣，工業仍以傳統方式進行之。此三國中之三政權，未能維持下去，這點阿敏當然是不會驚奇的。

阿敏對此種「通貨膨脹式」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批判，正好與拉丁美洲之進步經濟學家對其以「進口取代」的方式來發展經濟之批判（註6）並行。二者之情形很相似。新獨立的國家，皆有與其殖民地的過去採不同經濟發展道路的主觀願望，但皆因與舊有之經濟模式絕裂的不夠徹底而失敗。這些失敗經驗在學術界之結果乃是在其廢墟上建立起之所謂依賴理論學派（Dependency School）對第三世界之經濟發展模式採更激進的批判態度。在拉丁美洲、法蘭克首先提出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一詞（註8）。

馬格里布（Maghreb）之經濟發展研究

一年後二巨冊關於馬格里布（Maghreb）經濟發展之研究於一九六六年出版，是阿敏此段時期實證研究中最具份量的作品，它對摩納哥（Morocco），阿爾及利亞（Algeria）及突尼西亞（Tunisia）三國之經濟作了詳盡的分析，第一冊是關於其過去殖民地時期及最近非殖民化的情形，第二冊則是探討他們未來的發展潛力。一九七〇年該書以簡縮版形式再版並是第一本翻譯成英文的著作，題為現代之馬格里布（The Maghreb in the modern World 註2）。此書與前面相比不但是一較深入的研究，並且與馬利，幾內亞，加納極不同處是，摩納哥，阿爾及利亞及突尼西亞三國不論在地理上及歷史經驗上言皆具有全區一致性。因此在阿敏的第一冊中可就全區之整體觀點出發在天然資源，人口分佈，社會結構，經濟轉型，及政治史各方面做全面之研討。事實上，從好幾方面說來，此書強調的是此區域之統一性。儘管三國當政者號稱的經濟發展策略很不一樣——阿爾及利亞號稱走社會主義道路，摩納哥則是君主專政，而突尼西亞則界於二者之間。阿敏強調三國的一致性，不但是既存的經濟及社會結構三者非常相似，經濟發展的結果及前景也是如此。第二冊比較三國的發展計劃及各自的

發展潛力。而其結論則是三國皆需從傳統型態做更徹底之轉型，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則是「區際整合」。這裏我們看到阿敏富啓示性的一個論調：反對在殖民地化過程中形成之「經濟巴爾幹」（Colonial Balkanization）化之支離破碎的情形，而強調需要一較大的「經濟生存空間」來促進真正的經濟發展與成長。

象牙海岸——一國資本主義道路

阿敏的下一部重要著作象牙海岸之資本主義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he Ivory Coast 註8）於一九六七年出版，要探討的是一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發展之模式。象牙海岸在當時被西方吹捧為「經濟奇蹟」的典型：國民生產毛額年成長率9%，出口產值在一九五〇～一九六〇年間翻了四倍。阿敏並沒有否認這些「成長數據」的成就，及其相應之經濟與社會結構改變。但他更關注的是對發展之「方向」之評價。他指出下列各點：外資繼續佔統治地位，本地儲蓄缺乏，區域間發展不平衡，高失業率與大量外來勞工並存之荒謬現象及從一九六五年以降之經濟一般不景氣現象。他的結論如下：

象牙海岸為「無發展的成長」（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個例：這指的是成長是由外在的因素所創造與維持，與其相應的並沒有一內在結構的改變能使人預見到下一階段可導致出一以自身為中心，由內在的動態因素為主導的內向式民族經濟發展模式。

此處我們可以看到阿敏的一個主要論點——這裏很可能是首次提出這個論點，至少是較前更清晰明確的提出此論點，以「自我為中心」（auto-centric）的發展模式與「外向式，以外貿為主導」（extraverted）的發展模式之對比是辨別經濟是否真正有發展的試金石。

賽內加爾 (Senegalese) 的商人階級

下面要介紹的是阿敏較不尋常的一本書，它的對象不是一國或一地區之經濟研究而是對一整個階段之歷史社會性質作全面的描述，賽內加爾的商人階級 (Senegalese Businessmen) 法文版，於一九六九年出版 (註 9) 該書雖無英文譯本，但却有日文譯本。阿敏號稱訪問了賽內加爾之商人階級成員的「每一個人」雖然阿敏的語調與阿爾及利亞革命領袖房龍 (Fanon 註 10) 對消亡中之「民族資產階級」之輕視態度不同，但其實證調查研究後所得之結論却與房龍的先驗判斷相距不遠。塞內加爾的商人階級有其起伏，但他們從不是獨立演員而僅是充當「代理人」的角色。在十九世紀，法國人利用他們滲入內陸為其後正式殖民鋪路。到了廿世紀，此殖民主義反過來對他們不利，用「Petits blancs」及黎巴嫩人的競爭導致一些對非洲土著商人的歧視措施。從一九五八以降，他們的際遇稍稍好轉一些，因為大大小小的外資從某些利潤較低的部門撤出。但是他們基本上是虛弱的；信用仍然稀少，他們依賴國家提供其市場。他們很少能夠跨越從商業到製造業的鴻溝。無可避免的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實在看不出這個階級可以扮演傳統「民族資產階級」該扮演的角色——工業化及資本積累。

「實證調查研究期」

在做為本段結束介紹阿敏在此「實證調查研究期」之最後一本巨著西非洲發展之停滯：殖民主義政治經濟史一八八〇~一九七〇 (註 3) 前，需要提一下他在此期間還寫了範圍很廣一系列介於經驗數據與理論研究之間的較短之文章，或為論文，或為書前之導言。可惜大部份是法文，我們在此只能

將其題旨稍做介紹，一九七六年有一論文集以帝國主義與非洲之低開發 (Imperi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註 11) 出版，可惜此論文集本身並未翻譯成英文，雖然大部份單篇可能有英譯。一九六七有一關於非洲內部貿易的研究。有一關於人口問題的論文，其結論是非洲人口不但不過剩而是不足。他同時討論到綠色革命，糧食危機，法朗區，等論題，另外四篇較突出之長文，二篇是總結非洲資本主義之發展經驗，其在歷史上及現代之所以低發展及「依賴」之原因。(註 12) 另外二篇重要的文章是他對皮爾遜報告 (Pearson Report) 關於一九五〇~一九七〇非洲廿年「經濟發展」的批判。(註 13, 14) 此處他顯現出其能掌握浩瀚的數據而總結出其在理論上及政治上意義的能力，清楚的說明，外向式以外貿為主導的經濟成長模式之徹底破產而需代之以「內向式以自我為中心」的發展方向。

西非洲殖民政治經濟史

做為本文上半段之結束最後要介紹的一本書是阿敏在此「實證調查研究期」最後集大成之作，並由此向其下一階段之「理論工作」過渡。此書法文原名為，L'Afrique de L'Quest blocquee : L'economie Politique de La colonization，應該翻譯為：非洲被阻擋的經濟發展：殖民主義政治經濟史；但不幸英譯本書名是西非洲的新殖民主義 (Neo-Colonialism in West Africa) (註 3) 。其對象包括前面提到過的加納，幾內亞，馬利，象牙海岸更推廣及其他前法屬非洲，賽內加爾，毛利塔里亞 (Mauritania) ，上伏塔 (Upper Volta) ，尼日爾 (Niger) ，達荷美 (Dahomey) 及多哥 (Togo) 。此書分二部份，分別從二個角度來檢視上述各國之經濟發展。第一部份將各國區分為四種形態之「外向式經濟發展」類別。而第二部份則以各國主觀上想採用之經濟政策來重新分類。

第一種分類之四類型：

第一型可稱作「全園經濟型」(Plantation economy)包括，加納到一九五〇年止及一九五〇年後之象牙海岸。都有一段「奇蹟」式的發展期，在其間有一段以出口為主導的成長期，但是皆未能轉變為內向式以「自我」為中心的發展。如此遲早失去發展的動力。賽內加爾似乎也屬於此類，但早從一八三〇年起就踏上此條道路；因此也就較早的達到其發展之極限。加納現在已達其極限，而象牙海岸則尚有發展之餘地。

第二型可稱為「礦州型經濟」(enclave mining economy)其主要代表為幾內亞及毛利塔利亞。與第一型同樣的，儘管常常會有一段高速的生成期(像最近毛利塔利亞之經濟年成長率高達13%)。但因其經濟發展的基礎是在其礦材出口。儘管其出品產值是足夠的高而不致發生國際收支逆差的問題；但是這樣的發展型態實在不具任何可能轉化為「內向發展」的前景。相反的，其採礦業有如沙漠中的非洲，孤立於經濟的其他部份，而在極端的情形下，經濟結構是完全環節脫落式的(disarticulated)。

第三類國家，其經濟發展完全被殖民主義者摧毀或阻擋。其主要代表為達荷美。做為一個獨立王國，其在十九世紀中業已經能夠出口與一九六〇時代同樣多的棕櫚油。法國殖民者，摧毀了該國原有的社會結構，而將棕櫚油貿易的盈餘據為己有。結果是，經濟停滯，長期的財政危機及政治動盪。多哥亦屬於此類，稍不同的是其「停滯性」的發展是由殖民主義者本身開始的。在德國的「模範殖民」下，該國一九一四年的所得已達到一九六〇年的水平。

第四類可稱做「未開發類」：與第三類殖民主義者採「積極的」政策來干涉，阻撓經濟發展不同

的是，此第四類是「未開發的」被殖民主義者做為一種「儲備保留區」而存在。主要是非洲內陸諸國。在鐵、銅礦發現前之馬利塔里亞。尼日耳、馬利及上伏塔等屬之。但諸國提供了強大的「產業後備軍」。如上伏塔已有幾一億勞工輸出到象牙海岸，而馬利及馬利塔里亞仍然有幾萬勞工在法國本土工作。

在西非之新殖民經濟一書的第二部份，阿敏討論試探要改變經濟現況的各種「政策」。他將採「自由路線」(自由『Liberal』是指其在財政術語上的意義)者分為二類。第一類(包括達荷美，尼日耳，多哥，上伏塔屬之)在現制度下長期陷於國際收支逆差及國家預算赤字的動盪影響下，而另一類(如象牙海岸及馬利塔里亞)則由於出口產值尚豐的原因暫時尚不會有國際收支逆差的問題，但有賽內加耳可作前車之鑑，一旦曇花一現的繁榮過後會是一個什麼景象。

在「自由路線」之外，唯一另尋出路的嘗試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阿敏叫做「通貨膨脹」路線，以加納、幾內亞及馬利為代表；阿敏指出他們如何在缺乏資金的情形下想以赤字預算來發展經濟，如料想中，除了通貨膨脹外，其他當然乏善可陳。

在此書阿敏的結論與前相同，只是可能敘述的更直接了當：

這些國家在其表面顯示的不同類型之背後，是他們更基本的共同點——外向式發展及依賴；對此並沒有一純屬一國的解決方案。以自我為中心內向式的計劃經濟只有在較大的整合經濟空間才成為可能。在這樣的前提下，並且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西非洲的前景是樂觀的；例如：幾內亞的鋁土礦及馬利塔里亞的鐵礦正可做為賽內加爾工業化的基礎。

由本期之介紹我們可以看出，在走向上介紹之理論巨著「世界範圍之資本積累」(註15)及「不平衡之發展」(註16)前，阿敏是花了極大之心血與精力在實證調查研究上以與其博士論文之初步理論相驗證。下期我們將繼續介紹阿敏在發展經濟理論-歷史唯物觀尤其是社會史分期上之新貢獻及最近理論與實踐再結合之嘗試。

1. Amin, Samir (1982) *The Arab Economic Today,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plete Bibliography* by Foster—Carter, Zed Press, London.
2. Amin, Samir (1970) *The Maghreb in the Modern World*. Harmondsworth, Penguin
3. Amin, Samir (1973) *Neocolonialism in West Africa*,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onthly Review, New York.
4. [Said El Masry] Amin, Samir (1955) 'Ou va l' Egypte' *Democratie Nouvelle*.
5. Olivier Jean—Pierre, *Afrique : qui exploite qui ? (A Propos de Samir Amin et des Bourgeoises d'Etat africaines)* *Les Temps Modernes* No. 346. (May 1975) pp 1506 ~ 51 and No 347 (June 1975) pp 1744 ~ 75.
6. Dos Santos, Teotonio, [*The Crisis of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Dependence in Latin America*] in Berrstein, Henry (ed) *Under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7. Frank, Andre Gurider,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New York)
8. Amin, Samir (1967, 1971) *Le development du Capitalisme en cote d'Ivoire* ed de Minit.
9. Amin, Samir (1967) *Le Monde des affaires Senegalais* Paris Ed de Minit (Also in Japanese translation)
10. Fanon, Frantz (1967)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房龍為阿爾及利亞革命領袖。
11. Amin, Samir : (1976) *Imperialisme et Sous—development en Afrique*, Paris Anthropol.
12. Amin, Samir : (1972) 'Under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e in Black Africa' :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0 No. 4 (1972) pp 503 ~ 524
13. Amin, Samir (1970)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Change : The African experience 1950 ~ 1970*.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4 No. 2 pp 203 ~ 225
14. Amin, Samir (1976) Collected in *The 'Widening Gap, Development in the 1970's'* Ed' Barbara Ward, Leonove d'Aujou and JD Runnal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5. Samir Amin : (1974)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Translated by Brian Pearce (Two Volumes in one)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6. Samir Amin : (1976) *Unequal Development —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回鄉見聞

惠群

一九八四年初至今，我曾有兩次回台探親的機會。八四年初的台灣之行，距我一九七五年的離開台灣，已有九年。在這九年中，有關台灣的經濟奇蹟及發展，聽到不少。因之，回台時看到台北的變化，林立的高樓大廈，美國水準的高速公路，印象固然頗為深刻，却不是那麼意外。事實上，感到意外的，倒是在台北以外地區所見的一些的現象。

來自台灣，對於台灣近一、二十年的經濟發展奇蹟很引以為傲的人，很喜歡以此來貶社會主義的中國，把今日中國大陸的落後情形，與二、三十年前的台灣相比。鄰居告訴我，他認識一個台灣來的老太太，在一、兩年前曾隨她在美國得意的兒子返回中國，去看望她在大陸的親戚。「啊，大陸真是落後，比二十年前的台灣鄉下還不如。」她說。我沒去過中國大陸，不敢說她的觀察不正確。但是我想，在台灣居住在都市的外省籍人士，只聽聽國民黨的宣傳，對於二十年前台灣鄉下的生活水平，就抱那樣的信心與驕傲，恐怕太天真了。沒有實際住在台灣鄉下務農的人，對台灣鄉下的生活情況，究竟有什麼了解，是很叫人懷疑的。我家原來出自農家，父親雖然在中學時代就離開老家，我們也沒有在鄉間長大，但是鄉下老家尚有祖父母及留下來種田的三伯父一家，逢年過節，我們經常回鄉。對二十多年前的台灣鄉下，或許要比這個老太太的了解，真切一些。小時候回鄉下老家，最擔心的就是上

廁所的問題，茅房遠在戶外，而且看起來非常危險，小時候尚可用尿桶，長大以後回老家，就儘量不在老家過夜，把逗留的時間儘量減短。八四年初的台灣之行，曾和父、母、弟弟回鄉探望親戚。原來住有四、五十人的老屋，只剩下兩戶，大部份親戚都到都市謀生去了，留在鄉下的，也陸續在自耕地上建造新式的樓房。我的三伯父二十多年前因病去世，留下三伯母及堂弟妹，他們是留在老屋的兩戶之一。老屋依然沒有廁所，弟弟內急時，三伯母連忙指示他到已蓋樓房的親戚家中使用廁所。那次台灣之行回來後，三伯母一家尚住在沒有廁所設備的老屋一事，一直困擾著我。直到去年底再回去時，聽說三伯母也終於用了她所有的積蓄，在自耕地上建了兩棟樓房給兩個兒子，幾個月前才搬入新居。經濟奇蹟，也終於發生在台灣農村了嗎？

這回返鄉之行和堂弟的聊天中，我才知道兩個留在鄉下的堂弟，事實上已不種田了。地，還是自耕地，只是不自耕了。自己耕田不划算，因為要買機械農具來耕幾分田，絕對虧本，現在已有一些人，買了農具，專門承租別人的田來種。把田租給人種，收益其實也不多，幾分地的租金，好像一個月才一千多塊台幣。可是田地一年不種，土質變硬，將來再要種田就難了。堂弟們都在附近的工廠工作，月薪數千台幣（正確數字不記得了，留待下次回台考證）。這樣的收入是不夠維持生活的，幸虧太

太們都加入了工廠做工的行列，孩子由老母親看顧，鄉下生活費低，房子是現成的，只要不生病，沒有額外支出，生活是過得去的。我想，這就是今日台灣農村的情形。一個勞工每月數千元的收入，與台北中產階級的收入差距相當大，若不是靠著中國人傳統勤儉積蓄的美德以及身體好，不生病，台灣農村生活的苦境，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我在這次返鄉中所看到的農村情形，其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目睹了他們居住情形的改善，但是在另一方面，農民已不能靠種自己的土地來維

持生活。近年來，常聽到的台灣農村破產，大約就是這樣的情形，散佈在台灣各地的工廠，吸收了不少無法以耕種維生的農村勞力，解決了部份失業的問題。然而我想，有著祖先留下來的土地及房子的親戚，或許還是屬於幸運的一群，因為在別處，還有許多農村流出來的勞力，在失業的邊緣上掙扎。

※台灣的農地不能輕易改成建築用地，但是自耕農可以用耕地的八分之一來建自住的農舍。

民主台灣訂閱單

訂閱「民主台灣」____份共____期
(每份每六期10元)請寄下址：

1. 自____期至____期
姓名：_____
住址：_____

3. 自____期至____期
姓名：_____
住址：_____

2. 自____期至____期
姓名：_____
住址：_____

贈閱一期給
姓名：_____
住址：_____

以上共訂費美金_____元。
我願捐款美金_____元。

支票寄：OSDMT Treasurer
P.O.Box 2112
Bridgeport, CT 06608

Organiz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in Taiwan
(OSDMT)
P.O.Box 2112
Bridgeport, CT 06608

Nonprofit Org.
U. S. Postage
PAID
Bridgeport, CT
Permit No. 790

541
NAPERVILLE IL 60540